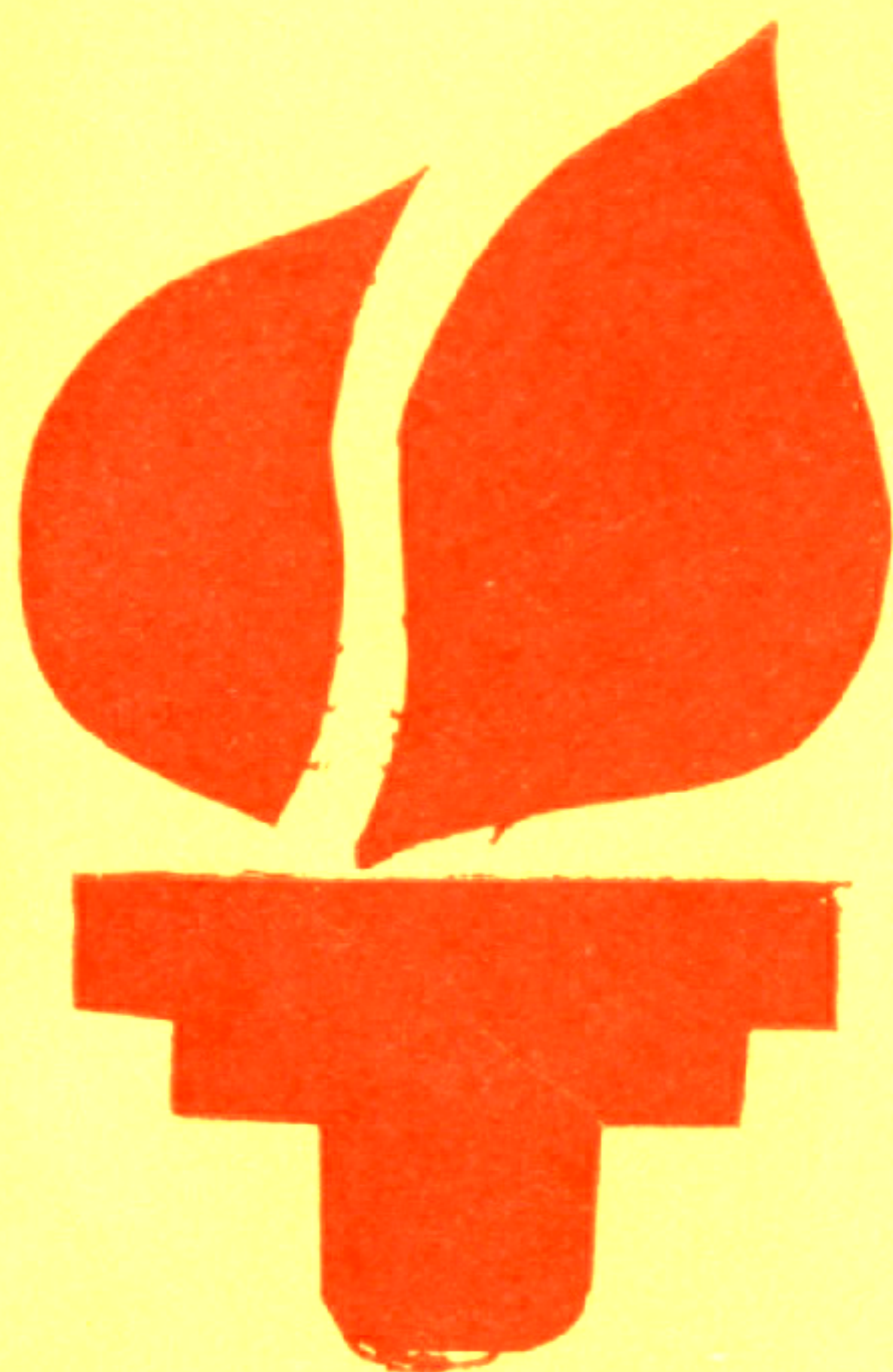


中国革命史

孙少华 主 编

苏国霞 副主编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中国革命史

孙少华 主编 苏国霞 副主编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阐述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祖国的独立和解放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是阐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为完成中国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英勇斗争的历史，是阐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以及社会主义在中国建立与发展的历史。

全书共八章20万字左右，内容简明扼要，突出问题。其特点是突出社会主义时期，全书一半的内容是阐述社会主义时期，写至1989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五中全会召开。每章均有思考题和阅读书目，本书非常适合作为理工医农大专学生用的政治课教材。

中 国 革 命 史

孙少华 主编 苏国霞 副主编

米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怀柔燕东印刷厂印刷

米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241千字

1990年7月第一版 1990年7月第一次印刷

ISBN7—81013—362-4/D·6

印数：1—6000册

定价：3.90元

中 国 革 命 史

孙少华主编 苏国霞副主编

王寿珠 张乃俭 苏国霞

孙少华 俞清天 丁冶矿

编

前 言

中国革命史是阐述中国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祖国的独立和解放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是阐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为完成中国的民主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英勇斗争的历史，是阐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以及社会主义在中国建立与发展的历史。

一百多年来，中国从一个古老的封建社会逐步地演变为一个受到众多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但是中国人民展开了长期的英勇的反抗斗争。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站立了起来。又进行了40多年的奋斗，将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了一个独立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国的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中国革命史有着丰富的内容，是对广大青年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爱国主义思想教育、革命传统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的好教材。

在最近几年的中国革命史教学工作中，我们感到根据目前高校学生的特点，有必要编一本简明扼要，突出问题，特别是突出社会主义时期问题的教材。所以本书共20万字，其一半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内容。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有：第一章由汪寿珠编写，第二、三章由张乃俭编写，第四、五章由苏国霞编写，第六章由孙少华编写，第七章由俞清天编写，

第八章由丁冶矿编写。本书民主革命部分由孙少华统稿，社会主义部分由俞清天统稿，苏国霞审看了民主革命的部分稿件并负责组稿和出版。全书最后由孙少华统编并定稿。

本书编写中始终得到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学陈明显副教授的关心和大力帮助，并阅审了全书，在此深表感谢。

我们参考过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的多种专著，吸收了许多同志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缺点和错误，敬请同行与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90年1月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

第一节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1
一. 鸦片战争——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	1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和世界.....	1
罪恶的鸦片贸易与正义的禁烟斗争.....	1
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	3
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4
二.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加深.....	6
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	6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后果.....	7
三. 边疆危机和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初步形成.....	8
列强对中国边疆的蚕食.....	8
中日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签订.....	9
四.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完全形成.....	10
帝国主义联合发动侵华战争.....	10
《辛丑条约》的签订.....	11
五.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	13
第二节 农民阶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14
一.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	14
太平天国革命的兴起和发展.....	14
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	16

太平天国的内部危机及其失败·····	17
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和历史意义·····	19
二.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19
义和团运动的历史背景·····	19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发展和抗击八国联军的斗争·····	20
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	21
三. 农民阶级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23
第三节 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	24
一. 洋务运动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出现·····	24
洋务运动·····	24
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	26
二. 戊戌变法·····	28
维新变法思潮的兴起·····	28
维新派同顽固派的论战·····	28
“百日维新”及其失败·····	29
戊戌维新失败的原因·····	30
戊戌维新的历史意义·····	31
三. 辛亥革命·····	32
辛亥革命前的国内形势·····	32
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与发展·····	34
辛亥革命的胜利和袁世凯篡权·····	38
反对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斗争·····	42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	45
四. 民族资产阶级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47
第二章 五四运动和国民革命	
第一节 五四运动和共产党的成立·····	50
一.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50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50

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	51
新文化运动·····	52
二、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54
五四运动·····	54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56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党的纲领的制定·····	58
上海和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	58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60
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制定·····	61
第二节 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	62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62
国共合作方针的确立·····	62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63
革命形势的发展·····	65
二、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涨·····	67
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67
五卅运动·····	68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	69
北方革命运动的高涨·····	70
三、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	71
反对国民党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	71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提出·····	73
第二节 北伐战争·····	74
一、北伐战争的准备·····	74
北伐前夕的时局·····	74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形成·····	75
二、北伐的胜利进军·····	77
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和胜利进军·····	77

北伐战争胜利的原因·····	78
三、国民党右派集团叛变革命 国民革命失败·····	78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78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80
国民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其教训·····	80
第三章 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救亡运动	
第一节 国民党全国政权的建立及其黑暗的统治 ·····	82
一、国民党全国政权的建立·····	82
二、新军阀混战·····	84
新军阀的混战·····	84
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特点·····	85
三、国民党政府的内政和外交·····	86
对外投降外交·····	86
国民党政府的军事独裁统治·····	87
第二节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道路的开辟 ·····	89
一、党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89
革命转入低潮·····	89
“八七”会议·····	90
八一南昌起义·····	91
秋收起义·····	92
广州起义·····	93
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94
二、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	95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立·····	95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	96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意义·····	98
三、反“围剿”斗争和长征的胜利·····	99
红军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和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的建立	99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 红军第五次反	
“围剿”的失败	100
遵义会议	102
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	104
红军长征胜利的意义	106
第三节 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107
一、民族危机加深 全国抗日运动高涨	107
“九一八”事变	107
“一二九”运动	108
二、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方针的确定	109
瓦窑堡会议	109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111
三、西安事变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112
西安事变	112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113
第四章 全民族的抗日战争	
第一节 全民族抗战的兴起	116
一、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国内形势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116
抗日战争的爆发和全民族抗战的实现	116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117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	117
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118
全国抗战部署及其抗战纲领	118
抗战初期正面抗敌	119
敌后战场的开辟	120
三、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抗战方针	122
“亡国论”、“速胜论”的出现	122

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122
四. 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	124
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及其危害	124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反对王明新投降主义的斗争	125
第二节 坚持全民族的团结抗战	126
一. 相持阶段中坚持抗战反对分裂的斗争	126
日本侵华方针的调整	126
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	127
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	128
二. 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129
国民党在政治上的进攻	129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内容	130
三.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	131
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策略方针的制定	131
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	133
第三节 克服困难 坚持抗战	135
一. 解放区的严重困难和党为克服困难而采取的措施	135
解放区的严重困难	135
克服困难的各项政策	135
二. 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	136
整风运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36
整风运动的内容与方针	137
整风运动的意义	138
第四节 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39
一. 解放区的恢复和发展 国统区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涨	139
1943年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139
解放区的恢复和发展	139
国民党统治的腐败	140

国统区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涨	141
二、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42
七大的主要内容和贡献	142
七大的历史意义	143
三、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及其意义	144
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44
抗日战争胜利的重大意义	145
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经验	145

第五章 全国解放战争

第一节 党领导人民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

一、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	148
抗战胜利后国际形势的特点	148
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的特点和各党派的政治主张	149
中国共产党的方针	150
二、争取和平民主的重大斗争	151
重庆谈判	151
政治协商会议	152
停战协定	153
三、解放区军民加紧自卫战争的准备	154
用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对解放区的进攻	154
“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	154
解放区的练兵、减租和生产运动	155

第二节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一、全面内战的爆发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	155
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	155
中国共产党的方针	156
二、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	157
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	157

粉碎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	158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	159
三. 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	160
国民党统治的全面危机	160
国统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	161
民主党派的觉醒	162
四. 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十二月会议	164
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	164
十二月会议	166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167
一. 战略决战	167
决战时机的成熟	167
辽沈战役	168
淮海战役	169
平津战役	169
二. 国民党和平阴谋的破产 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	170
国民党和平阴谋的破产	170
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	171
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	173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173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发表	17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74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175
四.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和历史经验	176
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	176
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经验	177
第六章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	
第一节 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恢复	179

一、建国初期的形势和党的七届三中全会	179
建国初期的形势和党的任务	179
全国大陆的統一和地方各级政权的建立	180
没收官僚资本	180
稳定物价	181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	182
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其它社会改革运动	183
抗美援朝	183
土地改革运动	184
镇压反革命运动	184
“三反”、“五反”运动	185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旧有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改革	186
三、经济恢复任务的完成	188
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	188
恢复时期的历史经验	188
第二节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188
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	188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及其历史必然性	188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	190
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高饶反党联盟	
阴谋的被粉碎	191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的制定	191
高岗、饶漱石反党篡权阴谋被粉碎	192
三、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193
个体农业改造的完成	193
个体手工业改造的实现	196
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	198

三大改造胜利的伟大意义	200
三大改造的基本经验	201
第三节 探索我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	202
一. 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	202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召开	202
《论十大关系》	204
二. 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207
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207
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历史功绩	207
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大意义	209
三. 反对经济工作中的冒进倾向和第一个五年计划 的巨大成就	209
反对经济工作中的冒进倾向	209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成就	210
第七章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始和“文化大革命” 的结束	
第一节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第一个五年计 划的超额完成	213
一.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	213
历史背景	213
基本内容和历史意义	214
二.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215
整风运动	215
反右派斗争	216
三.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	217
坚持了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	217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	218
第二节 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失误和纠正“左”倾错	

误中的曲折	219
一.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	219
急于求成思想的发展	219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	221
二. “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222
大跃进运动	222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224
三. 党开始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倾错误	225
开始觉察到工作中的失误	225
第一次郑州会议和党的八届六中全会	226
第二次郑州会议和党的八届七中全会	228
四. 党的庐山会议, 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	230
党的庐山会议	230
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	232
第三节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制定和执	
行,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234
一.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方针的制定和贯彻	234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提出	234
继续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	235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	235
二.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	236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236
西楼会议和五月中央工作会议	239
国民经济全面调整, 经济形势明显好转	241
三.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244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	244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246

四. 调整国民经济的胜利完成	248
调整国民经济的胜利完成	248
国民经济的新景象	249
取得了可贵的经验	250
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及其结束	252
一.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全国大动乱	252
“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252
“文化大革命”的准备	254
党的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	254
上海“一月风暴”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二	
月抗争	256
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258
二. 林彪反革命集团武装政变阴谋被粉碎	260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 林彪集团抢班夺权的阴谋被揭露	260
林彪集团反革命武装政变被粉碎	261
周恩来主持日常工作 各方面工作的转机	263
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264
三. 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阴谋被粉碎, “文化大革命”	
结束	265
“批林批孔”运动, “四人帮”组阁阴谋被挫	265
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形势明显好转	266
“天安门事件”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268
“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270
第八章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第一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伟大的历史转折	273
一. 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	273
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	273
社会主义建设决策的失误	274

对两个“凡是”的批判	275
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276
二.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工作重点 的转移	277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277
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278
国民经济的调整	279
纠正“左”倾错误 平反冤假错案	280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	282
三.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和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 任务的完成	283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	283
“决议”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评价	284
“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	285
第二节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纲领	286
一.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286
党的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286
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	287
开展整党 加强党的建设	288
二. 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289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289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291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292
农村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296
三. 对外开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国策	297
对外开放的总原则	297
扩大对外贸易	297
建立经济特区	298

利用外资 发展技术合作	298
四. 新时期的统一战线与“一国两制”	299
新时期统一战线的范围	299
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方针	300
一个中国两种制度	301
第三节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302
一. “七五”计划的制定及基本任务	302
“六五”计划超额完成	302
“七五”计划的原则、方针和任务	303
二.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305
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305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	306
党的基本路线	307
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开始	308
三. 治理经济环境 整顿经济秩序 全面深化改革	310
治理整顿的必要性	310
治理整顿的目标和措施	312
四.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313
两者对立由来已久	313
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	316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	318
对建国40年来历史经验的总结	320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召开	321

第一章 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

第一节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一、鸦片战争——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和世界〕 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资本主义萌芽还非常微弱，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当时，中国已处于封建社会末期，清朝统治日趋没落，政治腐败，军备废弛，财政困难；土地兼并严重，社会贫富悬殊；广大农民受到残酷的剥削与掠夺，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农民起义连绵不断。清朝统治已经腐败不堪，危机四伏。

正当清朝国势日衰的时候，世界资本主义正处在上升阶段。英、法、美等国相继完成工业革命，社会生产力出现前所未有的大飞跃。其中英国最强盛、最发达。为了寻求新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这些国家积极对外扩张，争夺殖民地。到19世纪40年代，世界上除远东外，大部分地区已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为了进一步扩张掠夺，资本主义各国把侵略锋芒指向古老的东方。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政治、经济十分落后的中国，自然成了资本主义列强进行侵略扩张的重要对象。英国充当了侵略中国的急先锋。

〔罪恶的鸦片贸易与正义的禁烟斗争〕 18世纪后期，中

国在中英正常商品贸易中始终处于出超地位。英国资本家为扭转贸易逆差，牟取暴利，竟无耻地把鸦片偷运到中国，数量从最初的每年200多箱猛增到1838年的4万多箱。

鸦片的大量输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1）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出现入超，白银大量外流，造成清政府财政上的严重困难。（2）白银大量外流，引起银贵钱贱，扰乱了中国的货币流通，直接损害了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利益。（3）毒害和摧残了中国人的精神和体质，许多贵族、官僚以及士兵吸食鸦片，使政治更加腐败，军队战斗力更为削弱。

中国人民深受鸦片的危害，为了维护民族利益，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人民强烈要求禁烟。清政府内部对鸦片的输入，主要有两派意见：一派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和直隶总督琦善为代表，主张弛禁，准许鸦片公开买卖，照药材纳税，以增加税收，缓解财政困难。另一派以湖广总督林则徐为代表，主张严禁。1838年10月，林则徐上书道光皇帝，指出鸦片危害极大，若不认真查禁，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道光皇帝惊于兵弱银涸的危机，决定采纳严禁派的主张。1838年12月，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雷厉风行地开展禁烟运动。他采取果断措施，勒令中外烟贩，全部交出现存鸦片，并要求外商写出不再偷运鸦片的保证书，如再偷运，“货尽没官，人即正法”。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唆使英商拒绝交出鸦片和写保证书。林则徐针锋相对，派兵封锁英国人居住的商馆，并下令停止中英贸易，终于迫使英美商人交出鸦片

2万多箱，共约230多万斤。1839年6月3日，林则徐下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经过20多天，到6月25日全部销完。虎门销烟，沉重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气焰，是中国禁烟运动的一个重大胜利。它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反抗外国侵略的爱国精神和英雄气概。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虎门销烟的壮观场面，铭刻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 鸦片贸易既是英国资产阶级侵略中国的重要手段，又是英国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当中国禁烟的消息传到英国，英国资产阶级立即叫嚷：中国禁烟“给了我们一个战争的机会”，这种机会“是不能轻易放过的”，要求对中国采取“强有力的行动”。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甚至狂叫，对待中国“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1840年4月，英国国会正式通过了发动对华战争的决议案。马克思曾经指出：鸦片战争是英国资产阶级“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和进行的对华战争”。

1840年4月，英国组成一支庞大的远征舰队，同年6月驶抵我国广东海面，鸦片战争正式爆发。英军在广州遇到林则徐领导的爱国官兵和广东人民的坚决抵抗。6月31日，英军转攻福建厦门，又遇到闽浙总督邓廷桢所部的抗击。英军乃北上，侵犯浙江舟山群岛，并于8月11日将舰队驶入大沽口，直接威胁天津。清政府动摇妥协，同英国侵略军议和，将林则徐、邓廷桢撤职查办。1841年2月25日，英军攻占虎门炮台，提督关天培英勇殉国。5月，广州三元里等地民众奋起抗英，迫使英军退回军舰。1842年6月，英军攻占吴淞，提督陈化成血战牺牲。英舰闯进长江，直逼南京，迫使

清政府于1842年8月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至此结束。

中英《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马克思曾尖锐地指出：这个条约“是在炮口的威逼下订立的”。通过《南京条约》及其补充条约，英国侵略者攫取了如下的侵略权益：（1）强占香港。香港扼广东门户，英国在香港建立殖民统治后，可以从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控制广东以及我国东南沿海，使香港成为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据点；（2）五口通商。条约规定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从此，我国东南沿海的门户洞开，外国侵略者更加疯狂地在我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并利用机会在各通商口岸霸占土地，设立“租界”，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内的“国中之国”；（3）勒索巨额赔款。中国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相当当时清政府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4）协定关税。对于英国进出口货物的纳税，中国不得自己修订税率。中国从此丧失关税主权，海关成了有利于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工具，失去了保护本国工农业生产的作用；（5）领事裁判权。英国人在通商口岸犯罪，中国无权过问，开了外国人在中国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先例，中国的司法主权受到严重破坏；（6）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条约规定中国将来“如有新恩施及各国，应准英人一体均沾”。

美国和法国也趁火打劫，于1844年先后胁迫清政府签订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获取了英国在《南京条约》里除割地、赔款外的全部特权。

〔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鸦片战争的失败和第一

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政治上：战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战后，中国被迫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国家主权遭到破坏，开始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陷入遭受外国侵略势力控制与干涉的悲惨境地。

在经济上：战前，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战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日益解体，逐渐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同时，也促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因素增长。

在思想上：战前，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占统治地位；战后，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民主主义思想等传入中国。一些先进思想家和爱国志士，认识到闭关锁国的危害，开始重新思索和探求中国富国强兵之路，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提倡学习西方，富强中国，对中国近代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样，中国社会矛盾也发生了变化。战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战后，这个主要矛盾依然存在，又增加另外一个主要矛盾，就是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随着外国侵略的深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封建主义结合，共同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统治。从此，中国人民肩负的再也不单纯是反封建的任务，而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任务。从反帝反封建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革命也由此变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总之，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中国

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都由此发生根本变化。这次战争是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也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起点，因而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加深

〔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继续迅速发展，扩大市场的要求更加迫切。他们不满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所攫取的权益，1854年和1856年两次要挟清政府修改条约，并答应出兵帮助镇压太平天国，诱使清政府接受其无理要求。清政府害怕“天朝尊严”更加丧失，拒绝全面修约。英、法两国在沙俄和美国的支持下联合发动了一场侵华战争。由于这次战争发生的原因和性质与第一次鸦片战争一样，故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10月，英国制造“亚罗号事件”，挑起战端。次年，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与美国联合侵华。1856年12月，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尔后乘军舰北犯。1858年5月攻陷大沽，并直扑天津。清政府急忙派遣全权大臣赴天津议和。6月清政府被迫与英、法、俄、美四国签订《天津条约》。主要内容是：（1）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2）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十处为通商口岸；（3）外国人可入中国内地游历、通商、传教；（4）外国商船可在长江自由航行；（5）承认鸦片贸易合

法化；（6）海关对进出口货物按时价值百抽五征税，外货运销内地只准征收2.5%的子口税；（7）分别向英、法赔款白银400万两、200万两。

侵略者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英、法两国远不满足于已经攫取的权益，说什么“条约中有关商务条款不能令人满意”。1859年6月，英、法公使借换约之机，率领一支舰队来到大沽口外，蓄意挑衅，重启战端。1860年10月，英、法侵略军攻进北京，烧杀淫掠，无所不为。他们在西郊圆明园大肆抢劫，把园内大量珍贵文物、稀世典籍、金银珍宝洗劫一空，并将园内建筑付之一炬，使之变成一片焦土。侵略者的野蛮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切齿痛恨和英勇抵抗。但在侵略者武力逼迫下，清政府屈服了。10月下旬，清政府同英、法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主要内容是：（1）承认《天津条约》继续有效；（2）增开天津为商埠；（3）割让九龙司归于英属香港界内；（4）赔偿英、法军费各增至白银800万两。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通过武力威胁和外交讹诈，先后逼迫清政府签订中俄《璦琿条约》、《北京条约》和《勘分西北界约记》，侵吞我国东北、西北共1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面积相当于6个英国、11个捷克。这在国际关系史上是一次骇人听闻的无耻掠夺。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后果〕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中国造成的恶果是十分严重的。（1）加速了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演变。由于外国公使进驻北京，便于外国侵略势力干预中国政治；由于大批新口岸的开辟，使外国侵略势力从东南沿海深入到长江中游地区；由于改订关税，中国经济处于无法与外国抗争的地位；由于准许自由传教，外国传教士得以

胡作非为。总之，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迫使清政府作出全面让步，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加强对中国的控制，中国社会更迅速地沿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轨道发展。（2）中外反动势力加紧勾结，相互利用。清朝统治者从两次挨打的经历中发现，外国列强要的是在中国的特权，并不反对他们当儿皇帝，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必须借助洋人的支持；外国侵略者也感到，要巩固和扩大在中国的侵略权益，必须扶植象清政府这样软弱无能的政权，作为他们实行殖民统治的工具。于是，这两股反动势力，便加紧勾结，相互利用，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三、边疆危机和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初步形成

〔列强对中国边疆的蚕食〕 19世纪70年代起，世界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争夺殖民地和瓜分世界领土的斗争更趋尖锐。亚洲广大地区是他们争夺、扩张的重要目标。随着我国邻近国家的殖民地化，我国边疆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危机。

在西北，沙俄入侵新疆，1881年逼迫清政府签订《伊犁条约》和几个勘界议定书，夺去我西北边疆大片领土。与此同时，英国侵略势力也不断进入新疆，妄图攫取通商、驻使和设立领事等特权。

在东北，日本积极向朝鲜扩张，在帮助朝鲜“独立”、“自主”的名目下，不断攫取政治上、经济上的权益。美、英、俄等国也相继而来，朝鲜政局日益混乱，直接威胁了我国东北边疆的安全。

在东南，1874年到1879年，日本寻找借口侵入台湾，吞并琉球，并把琉球改为冲绳县，作为侵略我国的跳板。

在西南，英国侵略势力伸入云南、西藏，并图谋打通印藏通道。法国在越南扩大战火，处心积虑想併吞整个越南，并进而向云南、广西等省扩张。1883年12月，法军进攻驻扎在越南山西的清军，中法战争爆发。尔后战争分别在越南北部和中国沿海地区不断进行。中国爱国军民英勇抵抗，冯子材在谅山大败法军，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也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昏庸腐败的清政府却下令前线退兵，妥协议和。1885年6月，同法国签订屈辱和约，法国势力从此渗入我国西南地区。中国战败为胜，法国战败为胜，使资本主义列强认为中国确实已经成为一个腐败的国家，于是更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十年后，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又对中国发动了一场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中日甲午战争是1894年日本政府在美、英支持下发动的一次侵略中国的战争。早在“明治维新”时代，日本就制定了先征服朝鲜和台湾，进而征服整个中国以至世界的狂妄“大陆政策”。1894年1月，朝鲜国内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武装起义。朝鲜国王要求清政府派兵帮助镇压。日本认为这是入侵朝鲜和中国的大好机会，一面极力劝诱清政府出兵朝鲜，一面设立大本营，秘密下动员令，准备挑起战争。1894年7月，侵占朝鲜的日军不宣而战，对中国海陆军发动突然袭击。8月1日双方正式宣战。9月，中国军队在平壤战役和黄海战役中战败。10月，日军分两路入侵我国东北。1895年2月，日军攻陷威海卫军港，洋务派官僚苦心经

营多年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清政府赶忙委派李鸿章向日本侵略者乞和，4月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主要内容是：（1）承认日本侵略朝鲜的权益；（2）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辽东半岛后因俄、法、德三国干涉，清政府以白银3000万两“赎回”）；（3）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4）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5）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

《马关条约》是日本侵略者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一副沉重枷锁，它给近代中国带来了极严重的恶果：（1）承认日本侵略朝鲜的权益便于日本把朝鲜变成它的殖民地，并作为向我国东北侵略扩张的跳板；（2）大片领土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进一步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直接助长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领土的野心，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3）巨额的赔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增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力，使日本更野心勃勃地走上加紧侵略中国和亚洲的道路；（4）允许日本在中国投资设厂，适应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需要，从此，列强争先在中国办工厂、修铁路、开矿山、设银行，它不仅严重地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使帝国主义进一步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垄断中国市场，使中国的社会经济更加半殖民地化。

总之，《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加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初步形成。

四、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国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的完全形成

〔帝国主义联合发动侵华战争〕19世纪末叶，世界各资本

主义国家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发动侵略战争，疯狂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直接助长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甲午战争后的几年间，列强纷纷强占中国沿海港湾，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与此同时，列强还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控制中国经济命脉，进行更加残酷的剥削和压榨。随着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侵略的深入，外国传教士的活动也越来越猖狂，利用宗教侵略中国。所有这一切，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恨与反抗。1900年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

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英、俄、日、法、德、美、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联军，进行了侵略中国的战争。1900年6月，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率领联军从大沽经天津向北京进犯，在落堡、廊坊一带受到义和团的英勇狙击。7月14日，联军攻占天津。8月4日，联军由天津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犯。8月14日，慈禧太后带领光绪皇帝逃往西安。当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9月，联军攻占东至山海关、西至娘子关、南至保定、北至张家口的广大地区。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以后，抢劫财物，杀人放火，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北京的珍奇国宝，图书文物，遭到洗劫。侵略者的种种暴行，充分表现了帝国主义的凶残本质。

〔《辛丑条约》的签订〕1901年9月，清政府在帝国主义列强的胁迫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主要内容有：（1）清政府必须严厉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条约规定：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参加“与诸国为仇”的各种组织，“违者皆斩”；各地方官对辖区内发生“排外事件”，

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这些规定使清政府各级官吏完全变成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帮凶；(2)北京设立使馆区，外国有权在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驻军。条约规定：在北京东交民巷一带划出使馆区，界内不准中国人居住；拆毁大沽炮台和北京至大沽沿途各炮台；使馆区以及北京到山海关沿线12个重要据点由外国军队驻守。这使帝国主义可以随时施加政治、军事压力，干涉中国内政，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3)中国支付巨额赔款。条约规定：中国向各国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付清，年息4厘，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担保。从此，清政府除田赋外，几乎所有重要税收都被帝国主义控制。为了弥补财政亏欠，清政府一面举借外债，一面另立新税，加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搜括，中国社会经济更加凋蔽；(4)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条约规定：清政府必须把原来的对外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位在清朝中央的六部之上，由皇族亲贵主管。帝国主义提高外务部的地位，是为了使它更得力地推行媚外卖国政策；(5)修订新的商约。条约规定：清政府允许按照外国的意愿修改“通商行船各条约”，“以期妥善简易”。这便于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并攫取新的特权。

帝国主义通过《辛丑条约》，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大大加强了对中国的统治，使中国的主权丧失殆尽。由于条约保存了清政府的权位，慈禧太后对帝国主义感激涕零，表示今后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总之，《辛丑条约》的签订，表明清政府彻底变成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五、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

毛泽东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中国这种独立发展的历史进程被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打断了。

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结果，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刺激和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某些发展，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有如下特点：

(1)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是被破坏了；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存在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

(2)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活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弱小的，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3)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被推翻后，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

(4)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的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

(5)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

下，由于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不统一状态，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

(6)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以至大批破产。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在世界上是少见的。

由此可见，帝国主义已成为中国封建势力赖以存在的靠山；封建势力则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基础，两者互相勾结，共同宰割中国人民。这就是中国贫穷落后，中华民族受凌辱、受奴役的总根源。因此，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就成了中国民主革命两大基本任务。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就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第二节 农民阶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一、太平天国农民革命

〔太平天国革命的兴起和发展〕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是在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促使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结果。鸦片战争后，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加紧侵略中国，外国工业品大量向中国倾销，使东南沿海大批手工业者和农民失业破产。清政府为了支付巨额赔款，增加名目繁多的捐税，人民负担比战前增加一倍以上。加上战后许多地方连年天灾，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广大农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只

得铤而走险，奋起反抗。鸦片战争后十年间，全国发生过一百多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领导者洪秀全，广东花县人，出身中农家庭，在本地做过多年塾师。数次赴广州应试，名落孙山。既痛于前途茫茫，更感到国运日衰，逐渐萌发振兴中华、救民水火的思想。1843年他与冯云山、洪仁玕等人创立以宗教为外衣的革命组织“拜上帝会”。1845年至1847年，他撰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著作，把基督教义与中国儒家思想结合起来，提出要创造一个“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社会，奠定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理论基础。为了宣传革命，组织群众，洪秀全与冯云山长期深入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在贫苦农民和烧炭工人中进行活动。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人先后入会，形成“拜上帝会”的领导中心。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举行武装起义，建号“太平天国”。不久，洪秀全称“天王”。1851年9月，太平军攻克永安，在这里整顿军队，颁布历法，制订各项制度，并分封诸王：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规定西王以下各王都受东王节制。太平天国政权组织初具规模。

1852年4月，太平军从永安突破清军包围。攻桂林未下，遂北上金州，出湖南，占郴州，克益阳，渡洞庭，过岳州，攻湖北。进军途中，活动在两湖的天地会会众纷纷加入太平军，壮大了革命力量。1852年12月，太平军攻克武昌。1853年2月，洪秀全统率号称50万之众的水陆两路大军沿长江东

下，连克九江、安庆等重镇，不到一个月，进军1200里。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克南京，并在此定都，改名天京。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封建地主政权相对峙的农民政权。

〔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于1853年冬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农民革命的纲领。其基本内容是：（1）提出了太平天国想要建立的理想社会的目标：“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2）规定了改革土地制度的原则。把土地分为三级九等，好坏搭配，不论男女，按人分田，人多多分，人少少分，不满16岁减半。考虑到各地区人口多寡不同，年成有荒有丰，所以又提出：“此处不足，则迁彼处”，“此处荒则移彼丰处”；（3）规定了产品分配的办法。要使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凡当收成时，除留足“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苧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各家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4）规定了社会结构的形式。全国按军事体制组织起来，县以下设立各级乡官。每25家作为社会的基层组织，称为“两”，管理的乡官称为“两司马”。乡官由地方保举产生，负责管理地方民政、经济和文化生活。

《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十分鲜明的农民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也是太平天国建设新社会的蓝图。它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历代农民在革命斗争中提出过的“均贫富”、“等贵贱”、“均田免赋”的思想，集中反映了农民迫切要求摆脱剥削和压迫，要求获得土地和追求平等的愿望，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性质，成为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斗争的最光辉的纲领性文

件，对动员和鼓舞农民群众去冲击封建势力起过巨大作用。但是，《天朝田亩制度》要求在个体劳动、小农生产的基础上，采取绝对平均主义的办法，废除私有财产，取消商品流通，这只能是一种空想，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它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只能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营的水平上。《天朝田亩制度》不可能为农民群众指出一条真正获得解放的道路，在实际生活中它没有也不可能得到贯彻执行。

〔太平天国的内部危机及其失败〕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为巩固和发展革命的胜利，制定了北伐和西征的军事计划，对清朝统治区实行大规模的主动出击。北伐军从扬州出发，经安徽、河南、山西进入河北，直至天津外围，但由于孤军深入，后援无继，转战两年零一个月，终为清军所败。北伐虽然失败了，但西征却取得了重大胜利。从1853年到1856年，经过三年多的激烈斗争，长江中下游地区，西起武汉，东到镇江，包括湖北东部，江西、安徽大部，以及江苏部分地区均为革命政权所掌握，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

不幸的是，太平天国领导人没有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贪图享乐，脱离群众，领导人之间也“彼此睽隔，猜忌日生”，矛盾日益激化，终于酿成了兵刀相见的流血内讧。1856年8月，杨秀清居功争权思想膨胀，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韦昌辉在洪秀全授意下带兵赶回天京，杀死杨秀清，并擅杀东王部属2万余人。石达开闻讯赶回天京，责备韦昌辉杀人太多，韦昌辉又要杀石达开。石达开匆忙逃走，幸免于难，但全家遇害。洪秀全在天京军民强烈要求下处死

韦昌辉，并令石达开返回天京主持政务。由于洪秀全心怀疑忌，有意牵制石达开。1857年6月，石达开负气出走，带去太平军精兵良将20余万，转战于中南、西南，最后在大渡河边柴打地（今安顺场）、老鸦漩（今四川石棉县）全军覆没，石达开受抚后在成都遇害。天京内讧与石达开出走，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力量严重削弱。从此，太平天国由盛变衰，太平军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

天京内讧后，为挽救危局，洪秀全提拔年轻将领陈玉成、李秀成等人主持军事，重建领导核心，一度扭转了战场上的被动局面。1859年洪仁玕从香港辗转来到天京，洪秀全封其为干王，总理朝政。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编》，主张革新政治，厉行法制，振兴经济，学习西方新技术等。这些主张在当时来说无疑是非常先进的，但它没有提到农民迫切要求的土地问题，又因当时军事斗争形势紧张，这些建议并未付诸实施，天国事业难以再振。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太平军英勇抗击了中外反革命联合武装的进攻，表现出了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在苏浙战场上，以美国流氓华尔为首的“洋枪队”，在太平军刀锋之下，一败再败，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然而，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也使太平天国的处境更加险恶。天京外围据点渐次丧失，李秀成劝洪秀全“让城别走”，但洪秀全执意死守天京，使太平天国失去了最后一次挽救的机会。1864年6月，洪秀全病逝。7月19日，天京陷落。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被封建地主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联合绞杀了。

〔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和历史意义〕 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他们与落后的小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正确的理论作指导，提不出正确的革命纲领，无法克服其自身所固有的弱点，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则是太平天国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太平天国所面临的敌人，不仅有国内积两千多年统治经验的封建地主阶级，而且还有凶恶的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中外反动势力互相勾结，用残酷的手段和先进的武器，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使这次农民革命战争最后失败。

太平天国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1）太平天国革命沉重地打击和动摇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这场革命前后坚持14年，纵横18省，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达11年之久的农民革命政权，猛烈地冲击了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2）太平天国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他们否认外国侵略者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否认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特权，并在战场上与外国强盗进行了武装较量，使外国侵略者强烈地感到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打破了西方资产阶级迅速使中国殖民地化的企图；（3）太平天国革命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太平天国革命是我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前驱，对后来民族民主革命的高涨，一直起着启蒙、激励和借鉴作用。

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义和团运动的历史背景〕 义和团运动是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产物。其发生的原因是：（1）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准备瓜分中国，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2）帝国主义在中国开设工厂，倾销洋货，严重威胁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活。清政府为了支付赔款，大借外债，增加捐税，大大加重人民负担；（3）随着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侵略的深入，外国传教士以不平等条约为护身符，配合本国政府进行经济、文化侵略。他们还勾结土豪劣绅，鱼肉乡民。清朝官府遇到民教纠纷时，总是压制百姓，袒护教会和教徒。中国人民不断进行反对教会的斗争。德国强占胶州湾后，瓜分危机日益严重，各地反教会斗争更加汹涌澎湃。1899年，终于酿成了大规模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发展和抗击八国联军的斗争〕义和团原名义和拳，很久以来就是山东、河南、直隶一带的民间秘密组织。其主要成员是贫苦农民，还有手工业者、运输工人和城市贫民等。义和拳的基本单位是“坛”。各坛自成系统，没有固定的组织联系。活动形式是设立神坛拳厂，传授拳棒，练习武艺，散布揭帖等。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义和拳的斗争矛头指向帝国主义，改称义和团，由秘密转为公开，提出“扶清灭洋”口号。1899年山东平原县义和团在首领朱红灯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多次打败清军的镇压，力量迅速发展。在帝国主义威逼下，清政府派袁世凯为山东巡抚，疯狂屠杀义和团，义和团转向直隶和京津地区发展。1900年春，义和团已遍及直隶各州县，烧教堂，逐教士，形成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高潮。

1900年6月，是义和团运动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这以前，清政府对义和团一直采取剿抚兼施的政策。由于义

和团发展迅速，声势浩大，慈禧太后深知用兵剿杀不是良策，加之帝国主义各国坚持派兵入京保护使馆，京津形势紧张，战争一触即发。于是她决定采取安抚政策，承认义和团的合法存在，企图利用义和团以自保，又利用洋人的力量消灭义和团。6月16日，慈禧发布上谕，招抚局面正式形成，义和团大规模地进入京津地区。“外州县各村义和团，不分昼夜，鱼贯而来”。北京义和团达到高峰时，“其众不下十数万”。义和团取得合法地位，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作用。其积极作用是，推动义和团组织的大发展，迅速地把运动推向高潮；其消极作用则是，进入京津地区的义和团，其活动从此被纳入慈禧一伙的轨道。

随着义和团运动的蓬勃发展，帝国主义看到清政府已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便决定直接出兵镇压。1900年6月，英、俄、日、法、德、美、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联军，武装侵犯中国。义和团英勇地站到了抗击八国联军侵略的最前线。侵略军从大沽经天津向北京进犯过程中，义和团沿途狙击侵略军。在天津，义和团联合清军，进行天津保卫战，猛攻火车站和租界区。在北京，从6月中旬开始，义和团包围使馆区长达56天，还包围西什库教堂。在义和团的强大攻势下，侵略者龟缩在使馆和教堂里，惶惶不可终日。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仓惶西逃，并把责任推到义和团身上，公开挥舞屠刀剿杀义和团。9月7日，清政府发布上谕：“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威震中外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悲壮地失败了。

〔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义和团运动虽然

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但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是50年后中国人民取得反帝反封建革命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1）义和团运动粉碎了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迷梦。义和团运动前，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说甚嚣尘上。义和团的英勇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使帝国主义分子认识到瓜分中国是难以办到的事。就连当时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也不得不承认：“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2）义和团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反动统治。义和团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反封建口号，但它是在冲破清朝封建统治者的重重压制后发展壮大起来的。它藐视清政府的禁令，抗击清军的镇压，在华北等地造成了巨大声势，一度几乎控制了清朝统治的心脏地区。义和团的斗争，使封建秩序和封建权威受到巨大冲击，清王朝的统治进一步衰弱了；（3）义和团运动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义和团的斗争使清政府黑暗腐朽、卖身投靠帝国主义的面目彻底暴露，使越来越多的人丢掉了对清政府的幻想，认识到要挽救中国的危亡，非推翻这个反动政府不可。义和团运动后，人们普遍同情和支持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武力推翻清政府的主张和活动。

义和团运动失败的原因：（1）义和团运动是一个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以贫苦农民为主体的自发的群众反帝运动。农民的小生产地位，使他们的眼光不够远大，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在进行“灭洋”时，具有笼统的排外性，不加区别地反对所有洋人、洋货，给反帝运动带来了不利影响。在进行“扶清”时，对封建统治者的阴谋手段丧失警

惕，以致在一定程度上被其欺骗利用，最后又被其出卖，吃了大亏；（2）义和团的组织很分散，始终没有统一的组织和集中的领导，总是各自为政，不能形成强大的阶级力量；（3）义和团神秘色彩太浓，不能用科学的斗争方法打击敌人，给自己造成了许多无谓的牺牲。这些缺点和错误，是义和团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也是义和团为后人留下的深刻的经验教训。

三、农民阶级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近代的中國，農民在全國總人口中大約占百分之八十。農民階級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它是勞動者，受地主階級殘酷的壓迫、剝削。鴉片戰爭後，隨着外國資本主義政治、經濟侵略的加深，廣大農民也深受其害。因而，農民階級具有反帝反封建的積極性，是一個革命的階級。在太平天國革命和義和團運動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農民階級單獨挑起了反帝反封建兩副重擔，顯示了農民階級巨大的革命力量和積極的作用，說明農民階級是中國革命隊伍的主力軍。

另一方面，農民又是小私有者，落后的小生產者，不是新的生產方式的代表，具有狹隘性、保守性、自私性和分散性，無法克服其自身所固有的弱點。從太平天國革命和義和團運動的鬥爭實踐中，可以看出：（1）在思想上的，他們沒有科學的世界觀和科學的理論作指導，無法擺脫宗教迷信和封建思想的束縛；（2）在政治上，他們提不出正確的革命綱領，不能制定出正確的政治路線和鬥爭策略，無法建立先進的政權組織；（3）在組織上，他們無法克服宗派主義傾向，不能形成堅強的領導核心，沒有統一的組織和集中的領導，

不能长期保持内部团结。正是这些弱点，招致了斗争的失败。

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的历史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无穷无尽的力量，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同时又证明，没有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单靠农民的奋战，是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的。

第三节 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

一、洋务运动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出现

〔**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清王朝内部一批买办官僚掀起的自救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封建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在勾结外国侵略者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实践中，亲身体验到洋枪洋炮的厉害，主张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本领，兴办军事工业和其它企业，仿照西方的办法编练陆海军。这些人就是所谓洋务派。其代表人物，在中央有总理衙门大臣奕訢，在地方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运动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以兴办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陆海军为主，即所谓“求强”；后期在“求强”的同时，又兴办近代民用企业，即所谓“求富”。

在兴办军事工业方面，从60年代到70年代初，洋务派先后创办了安庆军械所（1861年）、江南制造总局（1865年）、福州船政局（1866年）、天津机器局（1867年）等，其中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最大的洋务军用工业。

在编练新式陆海军方面，自1862年起，先后在天津、上

海、福州、广州、武昌等地聘用外国教官，购买洋枪洋炮，培训新式陆军。从7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建立福建、南洋、北洋三支海军。福建海军有军舰11艘。南洋海军有军舰17艘。李鸿章掌握的北洋海军势力最大，到1888年有军舰22艘。

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陆海军的过程中，遇到许多棘手问题，最突出的是经费来源、原料和燃料的供应，以及交通运输等方面的严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洋务派提出了“寓强于富”、“必先富而后能强”的口号。于是从70年代开始，由单纯的创办军事工业，发展为同时创办民用企业。到90年代，洋务派兴办的民用企业约有20多个。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上海轮船招商局（1872年）、开平矿务局（1877年）、天津电报局（188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1882年）、汉阳炼铁厂（1890年）、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1908年）等。

洋务运动实质上是封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它有两个突出的特点：（1）具有浓厚的封建性。洋务派引进西方技术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为了巩固封建体制。洋务派创办的许多军事工业，都是由政府拨款，不计成本，包产包用，满足军需。它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而是封建官府的垄断企业。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产品拿到市场销售，生产的目的是为了盈利，基本上具备了资本主义企业的性质。但它的经营管理权，掌握在清政府和官僚买办手中，因而仍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洋务企业的这种封建垄断性，阻碍和压抑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2）具有浓厚的买办性。洋务派缺乏独立自主思想，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过于迷信，事事依赖洋人的扶植与支持。所需

机器、原料、燃料均从外国购买，生产技术也多为外人所垄断，而且部分经营管理权也落入外人之手。洋务派所创办的军事工业，实际上只不过是外国军火工厂的附庸。

洋务运动推行了30多年，中国既没有“强”起来，也没有“富”起来，反而在半殖民地的泥潭中愈陷愈深。90年代中期，中国在甲午战争中遭到惨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是：（1）外国资本主义并不愿意中国富强起来，不断采取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的手段进行干扰，而洋务派对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压力，往往是妥协退让的；（2）封建顽固势力害怕他们的根基和权势遭到破坏，在政治上、经济上、舆论上多方进行钳制和阻难，而洋务派对于这种压迫，往往是斗争不力的；（3）洋务派本身的封建性窒息着洋务运动的生机，诸如企业衙门化、贪污中饱、挥霍浪费、任用私人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洋务派既是新式企业的创建者，又是这些企业的摧残者。洋务运动的失败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果不推翻封建制度，不坚持独立自主，一切依赖外国，希望通过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使中国由弱变强、由穷变富，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是，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也起过一些积极作用。尽管洋务派不是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但它引进了西方国家一些近代生产技术，为中国社会增加了一批机器工业和近代产业工人。对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新式企业，产生了一定的刺激作用，在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出现。

〔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

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开始零星地出现，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投资于近代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到90年代上半期，先后创办了近300个企业，其中数目最多的是机器修造、轮船航运、缫丝、印刷等四个行业。

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中国人民普遍要求奋发图强。各地一些有爱国心的地主士绅及其知识分子，把发展资本主义当作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甲午战争后的几年间，中国出现了一个兴办资本主义工业的小浪潮。从1895年至1900年，新创办的私人工矿企业100余家，投资总额为战前20年的2.3倍。

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是在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开始就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压迫的革命要求。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就存在着一定的依赖关系。因此，它又有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相妥协的一面。

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是一个软弱的阶级，却是资本主义这种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体现者。这个新的阶级的出现，使中国人民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统治的斗争，有了崭新的内容。在一定时期里，民族资产阶级是代表民族前进方向的阶级。

二、戊戌变法

〔维新变法思潮的兴起〕甲午战争后，随着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出现了一股变法图强的思潮。康有为便是这股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康有为，广东南海县人，出身官僚地主家庭，幼年受过儒家思想教育，青年时代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影响，逐渐萌发变法维新的思想。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梁启超等联合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1300多人，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重局势，要求“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公车上书”。此后，他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组织强学会，继续宣传维新变法主张。全国各地维新派也纷纷成立学会，出版报刊。上海的《时务报》和天津的《国闻报》，居南北舆论界的领导地位。谭嗣同等在长沙主持的时务学堂十分活跃。维新派通过这些活动，造成了广泛的社会舆论，集结了一定的阶级力量。为维新变法的实施，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维新派同顽固派的论战〕在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不断加剧的过程中，清朝统治阶级内部逐渐形成以光绪皇帝为一方，以慈禧太后为另一方的两大政治派别，即所谓“帝党”和“后党”。在对待维新变法的态度上，两派截然不同。光绪皇帝想利用维新变法，从慈禧太后的控制下摆脱出来，所以支持维新派的主张。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顽固维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状，反对任何改革。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论战的中心集中在三个问题上：（1）法可

不可以变。顽固派声称，“祖宗之法不可变”，“宁可亡国，不可变法”；维新派认为，“变者，古今之公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2）君权与民权问题。顽固派叫嚷：“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维新派认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只有实行君主立宪，才能“无敌于天下”；（3）新学与旧学问题。顽固派坚持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反对西学，认为“中学所以为教，人皆知之，无待别求门径也”；维新派认为科举制度是愚民政策，只有创办新式学校，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社会学说，造就人才，才能使国家富强。这次论战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与地主阶级守旧思想的一次正面交锋。维新派的主张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促成了光绪皇帝维新变法的决心。

〔“百日维新”及其失败〕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12月俄国派军舰占领大连港。全国人民面对民族危机，反帝爱国热情更加高涨。改良派抓住这个时机，把变法维新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皇帝，痛陈国难深重，应从速变法图强。光绪皇帝深受震动，表示“不甘作亡国之君”，下令康有为等筹划变法。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诏书，宣布变法，并先后任用康有为、谭嗣同等参与变法事宜。这一年是戊戌年，史称“戊戌变法”。从光绪皇帝6月11日宣布变法到9月21日变法失败，前后共103天，因此又称“百日维新”。

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颁布诏令约百余件。主要内容有：（1）政治方面：淘汰冗员，整顿吏治，取消旗人特权，准许士民上书言事；（2）经济方面：设立农工商局，鼓

励私人兴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改革财政制度，编制国家预算；（3）军事方面：裁减绿营，训练新军，扩充海军实力；（4）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设学堂，派遣留学生，设立译书局，开办报馆、禁止缠足，等等。这些推行新政的诏令，全面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挽救危亡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对于宫廷的政治积弊、官府的陈规旧俗、传统的典章制度等都有所触动。

正因为维新变法的实行触犯了清统治集团中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利益，遭到他们的竭力反对。地方一些封建官僚，也千方百计抵制新政。经过密谋策划，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幽禁光绪帝，再度临朝听政。这就是近代史上的“戊戌政变”。接着，慈禧太后又宣布废除变法法令，下令逮捕维新派志士。康有为逃往香港，梁启超逃往日本。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秀深、康广仁 6 人被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轰动一时的戊戌变法运动在封建顽固派的反扑下失败了。

〔戊戌维新失败的原因〕戊戌维新的失败，有其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薄弱，阶级力量弱小，而当时的封建势力十分强大，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不仅直接掌握军队，而且控制着从朝廷到地方的全部官僚机构。

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则是造成这次运动失败的主观原因。（1）维新派不敢从根本上否定封建制度。幻想在不改变封建制度的基础上，用“和平”和“合法”的手段，依靠封建皇帝，进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发展资本主义；（2）维新派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他们大声疾呼反对

列强瓜分中国，号召人们起来救亡图存，但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却非常幼稚，他们的爱国思想远未发展为反帝思想。看不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醉心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把帝国主义分子当成先生，甚至幻想英、美、日列强支持其维新变法事业；（3）维新派害怕群众，仇视革命。他们的变法运动不但不和当时的群众的斗争相联系，而且与之相对立，害怕群众运动比害怕反动势力还要厉害。因此，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当封建顽固势力疯狂扑来时，便势孤力单，一触即溃。

〔戊戌维新的历史意义〕维新变法这场社会改革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1）戊戌维新是一次爱国和进步的政治运动。在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日益加深、瓜分危机迫在眉睫的关头，维新派提出救亡图存、变法图强，要求发展资本主义，这在当时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主张；（2）戊戌维新又是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解放运动。他们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以此为武器，同封建思想展开了激烈的对抗，掀起了一次思想解放的高潮。这一次思想解放虽然是不彻底的，但唤起了越来越多的人去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3）戊戌维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推行新政期间，颁布了有关发展民族工业和科学文化的诏令，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士的地位有所提高，投资的合法权益得到某些保护，这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有一定程度的刺激作用；（4）戊戌维新的失败表明改良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改变落后与贫困的现状，必须拿起

武器，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武装斗争，打垮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结成的联盟，才能使中国走向独立与富强。

总之，戊戌维新运动是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初次走上政治舞台为特征，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前奏，它为更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准备了条件。

三、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前的国内形势〕 1911年在我国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这一年是农历辛亥年，所以叫“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在中华民族的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更加激化，人民群众反压迫反侵略斗争蓬勃发展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广泛传播的情势下发生的。

《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的侵华方针，由大规模武装进攻转而实行“保全主义”。就是“保全”清王朝，形式上维持中国的独立，通过清政府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渗透。在政治上，派遣顾问，直接控制清政府经济、外交、军事等要害部门，左右清政府的重大决策。在经济上，疯狂争夺铁路修筑权、矿山开采权，积极兴办银行，进一步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在文化上，通过设教堂，开医院，办学校等培养崇洋人才，灌输奴化思想。在军事上，为扩大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相互之间还进行了武力争夺。1904年，沙俄和日本为争夺我国东北，竟在我国土地上进行了一年多的战争。清政府置国家主权于不顾，竟划出辽河以东作为日俄战场，使我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的损失。由于清政府进一步实行

卖国投降政策，使中华民族的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更加激化。中国人民要摆脱帝国主义奴役的命运，就不能不进行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斗争。

在民族灾难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广大工农群众自发的反压迫、反侵略斗争蓬勃发展。反抗清政府横征暴敛的抗捐抗税斗争，反对外国教会压迫的斗争，会党起义等，在全国各省不断发生。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工人罢工斗争，以及为反对美国疯狂排华而在全中国掀起的抵制美货运动。上述这些斗争，具有明显的反帝反封建性质，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迅速向前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许多进步人士，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以及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他们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库里，借用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学说，作为进行革命斗争的武器。从1901年起，革命的知识分子出版了大量书刊，宣传革命思想。上海和东京成为宣传革命的中心。上海的《苏报》和东京的《游学译编》等杂志最著名。章炳麟、邹容、陈天华等是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代表人物。随着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国内出现了许多革命团体。除孙中山组织的兴中会外，长沙有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成立的华兴会；上海有章炳麟、蔡元培、陶成章等成立的光复会；武汉有刘静庵、张难先成立的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等等。这些革命团体，尽管在政治主张和纲领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有的甚至是原则的差异，但拯救祖国、振兴中华是他们之间的共同思想基础。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和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纷纷建立，表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

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与发展〕 鉴于清王朝的腐朽卖国和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高涨，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大多数开始摆脱改良主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出现了资产阶级民主派，兴起了民主革命运动。

(1) 孙中山早期革命活动。毛泽东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出身贫苦农民家庭。青少年时到檀香山读书，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中法战后，他对清朝卖国投降政策十分不满，想“仿行西方，以筹自强”。他与同时代的爱国志士一样，也有过改良主义的幻想。1894年曾上书李鸿章，集中阐述了他数年来仿效西方资本主义以求“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的改良主张，遭到拒绝。这时甲午战争爆发，亡国灭种的阴云笼罩神州大地。上书的失败与民族危机的刺激，使孙中山“慨然长叹，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从此立志走上革命道路。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我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次年2月，又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在兴中会的誓词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并先后组织了1895年的广州起义和1900年的惠州起义。但是，这两次起义都失败了，孙中山成为被通缉的“要犯”，流亡海外，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从此，孙中山作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中国资产阶级伟大革命家而驰名中外。

(2) 同盟会的建立和三民主义的提出。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革命政党。1905

年7月，在孙中山的积极推动下，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组织的代表70多人在东京开会，决定合并为同盟会。同年8月，在东京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孙中山当选为总理，黄兴主持总部日常工作。大会通过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政治纲领。并创刊《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十六字纲领进一步阐发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即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是要求推翻满洲贵族当权的政府，重建汉族当权的国家。孙中山进一步指出：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的人便要排斥他”，“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这样，孙中山就将他的民族主义与民族复仇主义区别开来了，而将民族革命的目标集中在少数当权者身上，赋予民族主义以民主主义的内容。

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建立民国”。就是要求永远根绝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实行政治革命。孙中山指出：民族和民权是一个事情的两方面，“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就是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为解除“千年专制之毒”，必须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体系的核心，是孙中山政治思想的重大成就。列宁曾高度赞扬说：“它到处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

民生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平均地权”。孙中山看到资本

主义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正如他所说，“文明越发达，社会问题越着紧”。他说的“文明”是指资本主义的发展，他说的“社会问题”是指贫富不均的两极分化。他主张吸取欧美的“善果”，避免欧美的“恶果”。试图防资本主义的祸患于未然，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孙中山指出“平均地权”的办法是：“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平均地权的主张实际上是想用把地租即土地所有权收归国家的办法，打击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制，使之更适合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这反映了孙中山认识到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和他对农民的同情，具有进步意义。但他企图以平均地权来扫除封建势力的根基，解决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的尖锐矛盾，其中包括贫富不均现象，只是一种不能实现的空想。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纲领。这个纲领，对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起了巨大的号召和推动作用，是孙中山对中国革命作出的重大贡献。但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它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封建主义的口号，没有将“平均地权”和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问题联系起来，他反对农民起来“夺富人田为己有”，也就是反对农民起来摧毁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因而无法动员广大农民投身革命。这些缺点，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尽管有着上述缺点，但其主流是进步的，革命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同盟会的成立及其政治纲领的形

成，标志着资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和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3）革命派同保皇派的论战。同盟会成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民报》为主要阵地，宣传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大造革命舆论。当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已经堕落成为反动的保皇派，鼓吹“标明保皇，力辟革命”。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论战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第一，要不要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保皇派污蔑革命是“暴民”、“盗贼”作乱，说革命必将引起“内乱”，以至“亡国灭种”，主张“改造现政府，而不欲动摇国家之根本”；革命派指出清政府就是亡国灭种的根源，早已是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已绝无可望”，必先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才能挽救民族危亡。第二，要不要实行民主政治。保皇派认为中国人“学识幼稚”，“民智未开”，只能实行君主立宪；革命派认为“民权”的兴起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可吸收西方文化，“合中西为一炉共锤之”。第三，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保皇派认为土地私有“天经地义”，平均地权将“危及国本”，咒骂主张土地国有者是“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革命派认为，“土地者，一国之共有也，一国之地当散之一国之民”，实行土地国有才能防止富人“徒手坐食”，促进社会生产发展。在这场论战中，由于革命派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民主革命思想，顺乎潮流，合乎民心，理直气壮；而康、梁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反动腐朽思想，不合潮流，违背民心，因而陷入了完全孤立的地位。经过论战，革命派在思想上击败了改

良主义，加速和扩大了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为辛亥革命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4）同盟会领导和影响下的武装起义。革命派在同保皇派展开论战的同时，积极发展革命组织，联络会党和新军，不断发动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到辛亥革命前，仅孙中山直接发动的武装起义就有10次之多。其中最著名的是1911年的广州起义。这次起义，同盟会组织了800人的敢死队，布下了30多处秘密据点，拟制了分10路进攻广州的计划。4月27日，起义爆发。总指挥黄兴亲率革命志士200人攻入总督衙门，原拟活捉两广总督张鸣岐，但张已破墙逃走，计划落空。起义队伍焚烧总督衙门，与清军展开激烈的巷战，许多革命志士在与清军搏斗中壮烈牺牲，有的被俘后坚贞不屈，英勇就义。事后，广州人民收殮死难者遗体72具，合葬于城外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势力，烈士们英勇战斗、视死如归的高度献身精神，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

在革命党人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的同时，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也急剧高涨，其中以四川保路运动最为突出。四川保路运动后来发展成为遍及全川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保路同志军武装大起义，猛烈冲击了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直接促成了武昌起义的爆发。

〔辛亥革命的胜利和袁世凯篡权〕在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的情况下，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达到高潮。但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革命很快就失败了。帝国主义走狗袁世凯篡夺了革命胜利果实。

(1) 武昌起义与全国各地的响应。1911年的广州起义和四川保路风潮，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争信心。革命党人认为与清王朝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决定在革命力量比较雄厚的武汉地区首先发动，其他各省同时响应，一举倾覆清廷。领导武昌起义的是与同盟会有联系的文学社和共进会。他们在湖北新军中进行了长期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培养了骨干力量，为武昌起义打下了群众基础。1911年9月，两个团体在同盟会推动下，成立起义总指挥部，由蒋翊武任总指挥，孙武任参谋长，原定10月11日起义。不料10月9日因制造炸弹失事，起义计划泄露，情势危急，起义被迫提前。10月10日晚，驻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在熊秉坤等率领下首先发难，占领楚望台军械库。次日，全力攻克湖广总督衙门，占领武昌，两天内光复汉阳和汉口。并成立革命政权——湖北军政府，发表《军政府宣言》，宣布废除清“宣统”年号，改号为“中华民国”。

武昌起义反映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意志，它是数十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继续和发展的必然结果。起义的胜利在全国范围产生了重大影响，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迅速高涨。到11月下旬，全国24个省区中，已有14个省区宣布与清政府脱离关系，归顺革命，其他省区也出现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腐败不堪的清王朝在全国革命洪流的冲击下土崩瓦解。

(2)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以便集中力量摧毁清王朝。1911年11月，黎元洪致电各独立省，请派代表到武昌商讨组织临时中央政府问题，获得响应。11月30日，独立各省都督府会议在汉口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

府组织大纲》，但由于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玩弄停战议和圈套，许多代表为他所迷惑，所以没有立即根据这个大纲选举临时大总统，而是决定“虚临时大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会议期间，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会议遂迁往南京继续举行。革命党人与旧官僚，立宪派之间展开了一场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这时孙中山从海外归来，由于他在当时威望很高，与会各省代表选举他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决定是年为民国元年，改用公历。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政权。虽然政府的组成包括了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三部分人，但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临时政府中占主导地位。在它存在的短短三个月内，颁布了一批民主改革的法令：在政治方面，宣布人民有选举、参政、言论、出版、集会、信教等权利。在经济方面，颁布了保护工商业的规章，废除清代苛税，振兴农垦业，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在文教方面，提倡男女同校，不读“四书”、“五经”，废除行礼跪拜，新编教科书必须合乎“共和国民宗旨”。所有这一切充分说明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共和国政权的诞生，宣判了清朝反动统治的死刑。

但南京临时政府从建立的时候起，就面临着严重困难。首先，是立宪派和旧官僚不予合作，并压迫革命派向反动势力妥协。其次，革命派急剧分化。领导这次革命的同盟会，早已处于涣散状态，许多革命党人与立宪派、旧官僚纠合在一起，卷入争权夺利的斗争。再次，临时政府废除了清代许多苛税，而海关税收仍为帝国主义把持，独立各省不但不上缴税款，反而纷纷向中央政府索饷，导致临时政府财政上的

极端困难，更增加了临时政府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妥协性。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面前，南京政府不得不步步退却，以致最后被袁世凯所窃夺。

（3）帝国主义破坏辛亥革命和袁世凯窃取革命政权。武昌起义爆发时，各帝国主义国家正忙于准备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可能用更多兵力来干涉中国革命，于是打出了“中立”的幌子，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胁迫革命政府向反动势力妥协。在政治上，孤立革命势力，拒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在经济上，扣留海关税款，给南京临时政府制造财政困难。在军事上，增调军舰驶往武汉江面，英国还从印度调兵驻扎香港待命，施加军事压力。

帝国主义还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寻找新走狗，来代替清王朝。他们很快选中袁世凯，支持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成果。1911年11月，清政府被迫起用袁世凯，任命袁为内阁总理大臣，掌握了清政府的军事政治实权。此后，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玩弄反革命两手阴谋。一方面对革命党人施加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又以革命党人胁迫清政府。同年12月，在英国公使帮助策划下，南北和谈在上海举行。孙中山本来是反对妥协的，表示“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可言”。临时政府内部的立宪派、旧官僚兴风作浪，逼孙中山向袁让权，包括黄兴在内的大多数革命党人也主张妥协。在一片妥协声浪中，孙中山于1912年1月发表声明，只要袁世凯使清帝退位，赞成共和，就立即辞职，推袁为大总统。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2月14日，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呈，并推荐袁世凯继任。15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为防范袁世凯独裁野心，孙中山在辞职时提出了三项条件，即

奠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并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企图使袁脱离北方的老巢，到南方受制于革命势力。袁又玩弄阴谋手段，密令其亲信在北京哗变，制造混乱，借以证明非由他坐镇北京不足以稳定北方局势。革命派被返再次迁就。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宣布解除临时大总统职。5日，参议院决定迁往北京。至此，仅存在3个月的南京临时政府，就为反革命的北京政府所取代，革命果实被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袁世凯篡夺。轰动一时的辛亥革命宣告失败。

〔反对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斗争〕袁世凯篡夺革命胜利果实后，建立起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实行专制独裁，镇压革命。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继续开展了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斗争。

(1) 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和复辟帝制的斗争。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同盟会中多数人认为可以通过合法斗争，取得议会多数，组织责任内阁，以此来限制袁世凯的野心。为此，1912年8月，宋教仁等将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几个小党派联合，改组成国民党。1913年初，国民党在正式国会选举中获胜，袁世凯大为恐慌。于是派人在上海火车站刺杀宋教仁，造成震惊全国的政治谋杀案。孙中山认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号召进行“二次革命”，武装讨袁。袁世凯先发制人，1913年7月，北洋军向南方几省发动进攻，国民党被迫应战。由于此时国民党内部组织涣散，步调不一致，“二次革命”最终失败。孙中山、黄兴等被迫重新流亡海外。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建立起赤裸裸的独裁统治。

他用金钱收买和武力威胁等手段，强迫国会选他当了正式大总统。1914年，他又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炮制了一部“字字皆袁氏手定”的《中华民国约法》，把总统权力扩大到和封建帝王一样。接着，袁世凯又修改《总统选举法》，为建立袁氏家族世袭统治制造根据。袁世凯还寻求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他复辟帝制，帝国主义也正希望通过袁世凯来加强对中国的控制。1915年，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为了称帝，卖国也在所不惜，公然全部接受，激起全国人民强烈反对。1915年10月，袁世凯操纵“国民代表大会”投票拥护君主制，并上书劝袁当皇帝。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推戴书”，决定称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准备元旦登基。袁世凯的复辟罪行，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孙中山再次举起革命旗帜，发表《讨袁檄文》，在各地组织起义，武力讨袁。蔡锷等人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宣布独立，向四川、贵州等省进军。接着，其他各省纷纷响应。袁世凯见众叛亲离，大势已去，不得不于1916年3月取消帝制。6月，在全国一片咒骂声中忧惧而死，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2）反对军阀割据与张勋复辟的斗争。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集团四分五裂。帝国主义各自扶植自己的走狗，各派军阀也纷纷寻找靠山。于是，中国形成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的局面。当时较大的军阀有：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受日本支持；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受英、美支持；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亦受日本支持。各派军阀在各自帝国主义主子支持下，争夺不已。1917年，日本指使段祺瑞政府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企图借此加强对中国

的控制。美国则指使直系军阀进行抵制。同年5月，大总统黎元洪在直系军阀支持下，将段祺瑞免职。段祺瑞则唆使皖系、奉系军阀宣布独立，准备进攻北京。这时，清朝封建余孽张勋，利用黎元洪的困境，以调解为名，率“辫子军”进京，解散国会，逼走黎元洪。7月1日，伙同康有为等宣布恢复清王朝，把宣统皇帝溥仪重新扶上统治的宝座。消息传出，全国愤怒。段祺瑞借助全国人民反复辟声威，举兵讨张。这次张勋复辟的丑剧，只上演12天就结束了。

（3）反对段祺瑞卖国独裁的斗争。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以“再造民国”的“功臣”复任总理。1917年8月，段祺瑞下令对德宣战，向日本借款5亿多日元，名为训练参战军，实为扩充自己的实力。为了取得借款，与日本订立《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使日本取得在中国驻兵及战时指挥中国军队之权，大批日军以“共同防敌”为名开入我国东北及内蒙一带。1918年，日本提出继续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的无理要求，段祺瑞竟表示“欣然同意”，造成了严重的民族危机。段祺瑞的卖国罪行遭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留日学生和北京、天津、上海、福州等地学生奋起要求废约，反对日本侵略和段祺瑞卖国。

段祺瑞重新上台后，为了实行独裁，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1917年7月，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成立护法“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出兵北伐，开始护法战争。由于南北军阀都想利用这一机会扩充自己的势力，护法军政府内部的西南军阀和直系军阀迅速妥协，准备南北议和，孙中山又遭排挤。1918年5月，孙中山愤然辞去大元帅职务，并通电揭露西南

军阀破坏护法运动的罪行，向国人痛切宣告：“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北如一丘之貉”。护法运动的失败表明，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陷入绝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本身软弱而又不敢发动工农，已经无力担当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一次更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1）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此，打破了一切反动势力企图在中国复辟帝制的迷梦，任何敢于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都先后成为历史上短命的小丑。无论是“洪宪”称帝或张勋复辟，都象肥皂泡一样，在民主共和历史潮流的冲击下，很快就消失了。（2）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清政府相结合，阻挠着中国的进步，威胁着中国人民的生存。辛亥革命的矛头指向清王朝，革了它的命，也就打击了站在它背后的外国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利用清政府奴役中国人民的美梦破产了，它们在中国的半殖民地统治秩序不能象辛亥革命前那样稳定了。（3）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清王朝被推翻，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法令，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辛亥革命以后短短几年中有了显著的增长。（4）促进了被帝国主义奴役的亚洲人民的解放斗争。在辛亥革命的鼓舞下，越南、印尼、菲律宾等国人民都掀起了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有力地冲击了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殖民体系，标志着亚洲人民的觉醒。

辛亥革命以其胜利果实被帝国主义走狗北洋军阀所篡夺而告失败。辛亥革命的失败，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革命的对象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军事实力、政治经验和社会基础等方面，都大大超过革命派，这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领导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这是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也是根本原因，民族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没有一个统一的坚强的领导核心。领导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从成立的那天起，思想上缺乏统一信仰，组织上也不够巩固。武昌起义后不久，有人便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错误口号，内部分崩离析，日趋涣散和瓦解。孙中山后来在总结这一历史经验时说，革命党人之所以不能取胜，是由于“未能获一有组织、有纪律、能了解本身之职任与目的之政党故也”。（2）没有一个明确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幻想西方资产阶级会赞助革命，因而不仅不能制定一个彻底的反帝纲领，而且在革命过程中谋求与帝国主义妥协，直至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侵略权益。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封建主义的理解不够明确，他们许多人把笼统的“反满”当作革命的主要目标，不了解单纯的“反满”不能消灭中国的封建势力。清帝退位后，革命派就以为大功告成了。这说明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封建的不彻底性。（3）没有触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基础，不能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封建土地制度是地主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彻底摧毁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辛亥革命过程中，始终没有找到解决土

地问题的措施和途径，没有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有发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毛泽东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4）没有建立一支强大的革命武装。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坚持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但他们发动的一系列武装起义，都是少数人的军事投机和军事冒险。他们注意争取和利用清军士兵和中下级军官，并收到一定成效，但军队指挥权基本上掌握在旧官僚军阀手中。由于没有自己的革命武装，其革命任务无法完成，革命目标也就化为泡影了。

辛亥革命的失败，给中国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最主要的有两条：（1）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历史已经判定，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2）在帝国主义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能走西方的老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救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毛泽东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四、民族资产阶级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19世纪6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开始零星地出现。洋务运动客观上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甲午战争后，

中国出现了一个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短暂浪潮。到20世纪初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已经开始成长为一个具有自我生长能力、并能推动社会经济前进的全国性的独立经济成分。在中国工人阶级尚未成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御侮强国的道路。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的阶级力量，担当起领导革命的责任，推动历史前进。中国革命由太平天国、义和团这类旧式农民运动，开始让位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这在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历程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它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存在着一种历史的联系。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人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完成孙中山未竟的事业”。

但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夹缝里发生和发展的。由于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束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但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存在种种联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异常软弱。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推翻封建势力。”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证明：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在一定时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一定胜利，但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这是时代和他们阶级的局限性所决定的。领导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1919年爆发了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

动，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不久又成立了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就进入了新的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

思考题

- 1、怎样评价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变化的历史作用？
- 2、资产阶级为什么不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 3、 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为什么在中国走不通？

阅读书目

毛泽东：《纪念孙中山》
《新民主主义论》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
邹 容：《革命军》

第二章 五四运动和国民革命

第一节 五四运动和共产党的成立

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新兴文化运动的兴起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在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下，其发展是缓慢的。辛亥革命冲击了封建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因此，中国的民族工业，尤其是轻工业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纺织业和面粉业进展最为显著。纺织业，1913年以前，全国只有31家，资本总额为3.254万元，到1920年增长为475家，资本为8.275万元。面粉业，1913年至1921年的9年间，全国设立了123家面粉厂。其他如火柴业，1914年至1920年，增加了66家。此外，还有造纸、卷烟、罐头、皮革、肥皂等轻工业亦有相当的发展。

在轻工业发展的同时，重工业在这一时期也有所增长。采煤业，机器采煤量由1912年的80万吨到1919年增加到330万吨。钢铁冶炼业，1914年兴建了大冶铁厂等六家钢铁厂，1917年成立上海和兴钢铁公司，1918年在北京兴建石景山钢铁厂，1919年建立了龙美铁矿公司等。电力、运输和金融

业也得到了发展。1914年至1918年，电力工业增加了51家。轮船运输，1913年为133·323吨，1919年增加到287·590吨。金融业，银行由1913年的15家增加到1919年57家。

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加快了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使拥有巨额资本的大企业有所增多。1919年，资本在百万元以上的大企业由1912年的25家增加到43家。同时还出现了拥有千万元以上的大企业。如茂福、福新、申新总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中国民族工业虽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有限的，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仍然很小，由于它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征。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力量有所增长，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加深，革命性有所加强，但是其软弱性和妥协性并没有改变。所以，中国民族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呈现的繁荣景象只不过是昙花一现。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帝国主义卷土重来，这种繁荣景象迅速消失。它说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不是按照一般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发展的，而是视帝国主义压力的轻重为转移。因此，不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不摆脱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依赖，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是根本不可能得到正常发展的。

〔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中国的工人阶级是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兴办了一批近代企业，产生了中国第一批产业工人。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期间，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中国的产业工人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到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已发展到200万人左右。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它和全世界工人阶级一样，由于和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而具有远大的前途；由于在近代工业里使用机器生产而富有组织性；由于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而富有革命性。此外，还有它自己特有的优点：第一，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其严重程度和残酷性在世界各民族中是少见的，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加上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改良主义经济基础，除了极少数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第二，特别集中。按地区来说，大多数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岛、武汉、广州、香港、大连等沿海城市，仅上海一地就集中了80万产业工人；按企业类别来说，大多数集中于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等少数行业中。由于这种集中，便于使工人团结和组织起来，从而形成一支强大的战斗力量；第三，和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中国工人阶级大多出身于破产的农民，了解农民的疾苦和要求，在革命中易于与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中国工人阶级虽然也存在着受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的思想影响，以及人数较少、年龄较轻和文化水平较低等弱点，但它所处的阶级地位和具有的特性，决定了只有它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

〔新文化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新的知识分子队伍也在迅速成长。

他们痛心于辛亥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统治中国的黑暗和混乱，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要求中国进步和改革。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为《新青年》），掀起了一场代表中国人民新觉醒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等人，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猛烈抨击中国封建社会的旧文化思想。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

第一，提倡民主，反对专制，反对旧礼教、旧道德。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文章历数了中国社会的黑暗，率先揭起了民主与科学的两面大旗。针对当时出现的尊孔复古逆流，陈独秀、李大钊、吴虞等人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两千年来的专制政治、宗法家族制度和吃人礼教的思想基础——孔孟学说发出了猛烈的抨击；

第二，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反对偶像崇拜，反对宗教。当时《新青年》杂志登载了许多文章，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自然科学，宣传唯物论和无神论。鲁迅在《随感录三十三》一文中还主张用“科学”这一味药来诊治中国人民在思想上迷信鬼神的病。《新青年》的宣传和介绍，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转变。

第三，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开展文学革命。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主张推倒封建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建设民主主义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把文学革新与政治革新联系起来，把反封建内容

和反文言文形式结合起来。在新文学运动中，胡适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口号，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着重于文体上的改革。在这期间，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成功地将文学革命的内容和形式结合起来，奠定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基础，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先驱。

“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启蒙运动。它从政治思想上对封建主义进行了一次空前的打击，以其革命精神和战斗勇气，震动了中国的思想界，启发了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唤醒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新文化运动又是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打破了封建思想的桎梏，在客观上为各种新思想的传播扫清了道路，为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奠定了基础。

二、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运动〕在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高潮的影响下，1919年5月4日，中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五四运动爆发的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加紧侵略和北洋军阀政府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残酷镇压所造成的严重的民族危机。五四运动的导火线是1919年1月“巴黎和会”中国在外交上的失败。“巴黎和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22个战胜国在巴黎的凡尔赛宫召开的“和平会议”，实际上是由美、英、法三国操纵的帝国主义分赃会议。中国也以战胜国的资格，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但是，“和会”不仅完全否绝了中国的合理要求，而且在“凡尔赛和约”中规定由日本接管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莫大侮辱，也是中国政府外交的失败。对如此丧权辱国的所谓

“和平条约”，北洋军阀政府的代表竟然准备签字承认。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随即爆发了空前规模的爱国民主运动。

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取消二十一条”、“还我山东”等口号。强烈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当游行队伍进至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时，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竟派军警阻拦。但愤怒的群众不顾一切来到了赵家楼，痛打了章宗祥，火烧了曹汝霖住宅。反动政府对学生的爱国运动进行镇压，当天逮捕爱国学生30多人。5月5日，北京各大专学校学生实行总罢课。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成立学生联合会，发出通电，强烈要求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接着，全国各地学生纷纷起来响应。

从6月3日起，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逮捕爱国学生1000余人，更加激起了全国各界人民的愤怒。中国工人阶级挺身而出，英勇地投入了战斗。从此，五四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6月5日至11日，上海有6万多工人举行罢工。接着，唐山、长辛店、长沙、武汉、天津、济南、杭州、九江等地工人相继罢工。五四运动由开始的学生群众为主力发展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斗争的强大威力下，迫使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下令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获得了重大胜利。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显示了巨大的政治威力和领导力量，使具有初步共

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积极投身到工人中去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和组织工作。

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它是中国人民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民主运动；它开辟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历史的新时期，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它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转变为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心的新的思想运动。一大批宣传新思想、宣传社会主义的进步刊物和社团，在全国各地涌现出来，而《新青年》则成为传播新思想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他们发挥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桥梁作用。

1919年5月，李大钊负责主编了《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在这一期上，他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在中国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继这篇文章之后，他又发表了《阶级竞争与互助》、《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一系列文章，进一步介绍马克思主义。1919年7月，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以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贩卖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时，李大钊立即发表了

《再论问题与主义》予以批驳。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翻译马列主义著作。陈独秀也在五四时期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1920年下半年，他写了《谈政治》、《社会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学说》等文章，肯定了改造中国必须采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陈独秀还同李大钊、李达等一起，批判了研究系张东荪、梁启超否认中国社会主义前途的谬论，还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观点。

许多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积极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湖南，毛泽东创办了《湘江评论》，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宣传十月革命的经验，并提出改造中国的根本办法就是实现民众大联合。在天津，周恩来组织了“觉悟社”，出版《觉悟》杂志，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思想的讨论，推动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此外，上海的《星期评论》、武汉的《社会新声》、四川的《星期日》等等，不仅宣传民主与科学，而且都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队伍的不断扩大，灌输马克思主义到工人群众中的步伐也加快了。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秘密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同年5月1日，我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自己的节日。全国有七、八个城市总计五、六万人举行了纪念活动，喊出了“五一万岁”、“劳工万岁”等口号。我国最早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参加了这个纪念活动的组织工作。

《新青年》出版“劳动纪念节”专号。北京大学的教工和学生500多人召开了纪念大会。邓中夏等还到长辛店对工人讲演。1920年4月，陈独秀和上海的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联

合上海工业会等7个团体，发起纪念“五一”的大会。大会虽遭军警镇压，仍有1000多人坚持。这些情况证明，五四运动正在促进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党的纲领的制定

〔上海和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同工人运动结合的过程中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必须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

1920年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相约分别在北京和上海进行建党活动。同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为后来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作了准备。不久，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来华，在北京同李大钊讨论了建党问题。经李大钊介绍，维金斯基又到上海同陈独秀会谈，进一步讨论建党问题。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当时称共产党。成员有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杨明斋、沈玄庐、施存统，以及随后加入的邵力子、沈雁冰、李启汉、沈泽民等人。小组推选陈独秀为书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之后，推动了各地的建党工作。上海组通过各种方式发动各地建党。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主要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等。11月，小组改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推选李大钊为书记。同年，毛泽东在长沙成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在武汉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王

恽美、邓恩铭在山东成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春，谭平山、陈公博成立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施存统在日本，周恩来、赵世炎在法国也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之后，通过各种方式，有组织、有系统地在工人阶级中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首先，出版通俗刊物，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真理。如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劳动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劳动音》；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劳动者》等。这些刊物，用通俗的语言，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教育，以生动的事例，启发工人的觉悟，深受工人欢迎。其次，开办夜校。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在夜校中，边教文化，边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北京有邓中夏组织的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在上海有李启汉组织的沪西小沙渡劳动补习学校。通过开办补习学校，不仅提高了工人的素质，在工人群众中培养了骨干力量，而且密切了知识分子同工人的联系。第三，建立工会和俱乐部。如上海的机器工人联合会和印刷工会；北京的铁路工人“救国会”等等。

由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努力，工人阶级的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各地的工人运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罢工次数比以前大大增加。1920年，全国罢工46次，1921年，罢工49次。较大的罢工有：1920年5月1日，上海5000多工人为纪念国际劳动节，对军阀的阻挠进行的坚决斗争。6月，上海杨树浦日本纱厂4000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的罢工。12月，粤汉铁路南段工程部工人的罢工。

上述情况表明，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已经密切地结合

起来，在全国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时机已经成熟。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经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积极准备，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推选出12名代表出席大会，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烬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包惠僧作为陈独秀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出席了会议。最后一天，由于租界巡捕的搜查，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进行。

大会的主要内容是：（1）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差别，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纲领明确了党的性质和党的建设方向，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纪律。（2）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确定了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工人阶级，开展工人运动。（3）选举党中央领导机关——中央局，推选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列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毛泽东说：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其表现主要有：第一，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领导力量。中国革命不再由资产阶级领导，而是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了。第二，有了新的革命纲领。中国革命不再象过去那样在

黑暗中摸索，而是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第三，有了发动人民群众的新方法。中国革命不再象辛亥革命那样，不敢发动群众、领导群众，而是有了在党的领导下联合一切革命人民的战略和策略。第四，有了新的前途。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前途，不再是建立资本主义，而是建立社会主义。

〔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制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面临着政治形势的新变化。在国际上，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帝国主义国家召开“华盛顿会议”，在“机会均等”的口号下，进一步瓜分中国。在国内，由于帝国主义的操纵，军阀混战连绵不断，使中国人民陷入了极端痛苦的深渊。这种现实，再一次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出路问题，要求党作出明确的回答。

1920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共产国际和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革命纲领的依据。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内容是：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制定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即最低纲领。党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党的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民主的联合

战线”的决议案》、《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等九项议决案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大会选举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等为中央委员，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二大”的重大意义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迈出了第一步，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但“二大”没有明确指出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

第二节 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国共合作方针的确立**〕党的二大以后，为了实现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尽快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共产国际代表曾多次同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问题。1922年8月，根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提议，决定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西湖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它是我党推行国共党内合作方针的开始。但是，由于大多数人只赞成同国民党建立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对于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十分怀疑，因此，西湖会议后，只有很少几个共产党人参加了国民党。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专门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强调了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必

要性，号召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共进一步认识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从而加快了国共合作的步伐。

为了统一全党的认识，进一步解决国共合作的问题，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大会正确分析了建立国共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其必要性在于：中国革命面临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中共刚刚成立不久，其力量是弱小的。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当时中国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并且国民党在南方有政权、有武装。而且它不限制中共发动工农运动。所以，建立国共合作是必要的。其可能性是：国民党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可以容纳不同的革命力量，可以把它改造成成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成。孙中山虽几经挫折，但他始终坚持民主主义立场，欢迎苏俄对中国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人对他的帮助。

会议最后作出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

党的三大的意义：它将马列主义的策略原则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在批判了来自“左”和右的错误观点后，正确地确定了实行国共党内合作的方针。这对促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加速中国革命的步伐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大会对国民党的力量估计过高，而对工人阶级的力量认识不足。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党的“三大”后，为实现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在党内进行革命统一战线的教

育，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192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三届一中全会，再次强调了国民运动的重要性，号召全党努力从事国民运动，扩大国民党组织，促使国民运动的胜利发展。同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又发出通告，要求全体党员积极帮助国民党改组。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为推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也做了大量工作。1923年10月，鲍罗廷到广州，同在广州的中国共产党人讨论改组国民党问题。同时李大钊应孙中山之邀赴广州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组成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改组事宜。11月，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

在共产国际与中共的推动和帮助下，孙中山于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员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谭平山、王烬美、于树德、李维汉、李立三、夏曦等出席了大会。鲍罗廷参加并指导了大会的工作。李大钊担任了主席团委员并参加了大会的两个主要文件——宣言和党章的审定工作。

这次大会的主要内容：

(1)在政治上通过了新的革命纲领。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接受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把原来仅适应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发展成为具有反帝反封建内容的新三民主义。新的民族主义增加了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主张民族平等的新内容，新的民权主义规定“民主权利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

数人所得而私”；新的民生主义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后来孙中山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新三民主义和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最低纲领，在基本原则上是是一致的，因此，它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成为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2)在组织上通过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选举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国民党一大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广泛发动工农群众，组建革命政府和革命武装，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各族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成为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起点。

〔革命形势的发展〕国共合作的形成，加快了革命的步伐，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起点。

国共合作后，摆在中国革命面前的一个主要任务，是迅速建立一支革命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推动下，在苏联的帮助下，1924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正式建立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军校建立时，苏联政府提供办学经费，运来了军械，派来了军事干部担任军事教官。孙中山兼任军校的总理，派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周恩来于1924年8月从法国回到广州，11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还先后委派恽代英、肖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在军校担任政治和军事教员，从全国各地选派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军校学习。在周恩来的组织领导下，军校建立了“革命青年军人联合会”，出版了会刊《中国军人》，并建立了一套政治工

作制度。军校培养的大批军事、政治工作干部，是当时革命武装的骨干力量。他们在建立国民革命军、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北伐战争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国共合作的建立，为恢复和发展工农运动创造了条件。在国民党政府的管辖地区，工农运动取得了合法地位，大批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深入工农群众中去开展工作。1924年5月，广州工人举行代表大会，统一了广州的工人运动。随后，党领导了广州沙面工人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大罢工，坚持了一个多月，取得了胜利，成为工人运动由低潮转入高潮的起点。与此同时，党还在全国各地逐步恢复被封闭的工会组织，使工人运动得到了发展。

农民运动也在发展。党通过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派遣特派员公开到广东各地开展农运，使一度遭到陈炯明镇压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并开始组织农民自卫军。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在广州举办了六期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全国各地培养了大批农运骨干。

随着工农运动的发展。党还领导了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将领冯玉祥突然在前线倒戈，回师北京发动政变，推翻曹锟、吴佩孚的北京政权，并将自己的军队改称国民军，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4日，孙中山北上，并发表“北上宣言”。中共中央也发表了《第四次对时局的主张》，支持孙中山北上，并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但北京临时执政府段祺瑞却以召开“善后会议”相对抗。为抵制“善后会议”，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于1925年3月1日，在北京召开了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国民会议运动很快

在全国范围展开。不幸的是在会议期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临终前，他留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再次表达了他对三大政策的信念。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他的逝世是中国革命事业的巨大损失。

二、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涨

〔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把革命运动推向新高潮，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了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如何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加强领导。大会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着重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大会提出：“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取得胜利。”大会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成份，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者。大会对国民党各派也进行了分析，并制定了对策。指出，国民党自改组以来，正形成左、中、右三派。党的政策是：积极扩大代表工农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左派；批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派的动摇；坚决反对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右派。大会制定了开展群众运动的计划，并决定在全国建立和加强党的组织，以适应革命大发展的需要。

大会最后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

党的四大为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作了重要准备。大会明确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是前几次党的

代表大会没有正式提出过的。它标志着党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是有贡献的，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大会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仍然缺乏明确认识。对农民土地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也没有讨论。

〔**五卅运动**〕1925年5月14日，在上海的日本纱厂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中国工人而举行罢工。15日，日本资本家竟开枪打死与厂方交涉的工人代表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10余人。这一暴行激起了上海各界人民的无比愤怒。此次事件成为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线。28日，党中央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决定30日在租界举行反帝大示威。5月30日下午，万名群众游行示威，遭到英帝国主义巡捕的射击，当场打死13人，造成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

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更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当晚，党中央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斗争扩展到各阶层中去，发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向帝国主义反击。6月1日，在中共领导下成立了上海总工会，宣布实行总同盟罢工。6月1日，上海20万工人首先举行大罢工，学生、商人纷纷罢课、罢市，形成“三罢”高潮。6月7日，总工会发起成立了反帝运动的最高指挥机关——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在11日召开的20万人参加的大会上，提出了同帝国主义交涉的十七项条件。上海各界人民的联合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为了镇压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采用了武力镇压和政治分化的反革命两手。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下，单独停止了罢市，破坏了“三罢”运动。随后，

帝国主义指使反动军阀封闭了工商学联合会和上海总工会。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决定停止总同盟罢工。

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次空前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它揭开了全国大革命的序幕。从上海掀起的这场反帝斗争，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唤醒了全国各阶层人士，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巨大力量，标志着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第二，五卅运动再一次证明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民族资产阶级是具有软弱性和动摇性的阶级。中国革命的敌人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

第三，直接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五卅运动锻炼了工人阶级，壮大了工人组织，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从事工人运动的骨干分子。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1925年2月，在全国革命形势向前发展和广东工农运动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广东政府为了统一根据地，消灭由英帝国主义支持的盘踞在广东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举行了第一次东征。在共产党人的英勇奋战下，东征军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驻广州的军阀刘震寰、杨希闵乘机武装叛乱，广州形势急剧恶化，东征军被迫回师广州，在工人、农民的帮助下，粉碎了企图颠覆广东政府的刘、杨叛乱。此时，革命内部趋于统一，国民党中央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改组广东的大元帅府，成立国民政府。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任政府主席，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长，胡汉民为外交部长，国民政府将广东的各系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为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国民革命于10月举行第二次东征，蒋介石任总指挥，周恩来任总政治部主任。在东江人民的支援下，东征军全歼陈炯明残部。后乘胜南征，击溃了邓本殷部。至此，广东境内的军阀势力全部肃清，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统一和巩固。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和工农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北方革命运动的高涨**〕在全国革命形势的推动下，北方也掀起了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斗争。在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京、津、冀、豫和内蒙古等北方地区的革命运动迅速发展。1925年6月，北京人民先后举行声援上海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大示威，特别是1925年底到1926年初，曾连续多次发动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声讨张作霖、吴佩孚的国大示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引起了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政府的极端仇恨。1926年3月，日军军舰进攻大沽口，炮击冯玉祥的国民军，并纠合英、美、法等八国公使，联合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帝国主义的蛮横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3月18日，李大钊等人领导北京各界10万人，在天安门集会，强烈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谴责段祺瑞政府的卖国罪行。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段祺瑞政府竟下令开枪，对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打死40多人，打伤200多人，造成了“三·一八”惨案。惨案发生后，党中央发表了《告全国民众书》，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罪恶，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反动势力，并进一步掀起了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

三、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

〔反对国民党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国共合作建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起来。国民党右派反对革命由来已久，早在国民党改组时就反对国共合作，由于孙中山立场坚定，他们的阴谋才未得逞。孙中山逝世后，他们暗杀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并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了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反对三大政策，形成一个公开的反革命集团——“西山会议派”。

在国民党右派加紧进行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时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戴季陶于1925年6、7月间先后发表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两本小册子，公开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为国民党右派篡夺领导权提供思想武器，成为新右派的“理论家”。

针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反动，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首先在思想上回击新老右派的进攻。1925年12月，党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推动国民党各级党部通电痛斥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与此同时，在《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上发表大量文章，批判新老右派的反动本质；其次在组织上，推动国民党中央于1925年底，在广州召开一届四中全会，斥责西山会议派，并决定召开国民党二次处理西山会议派。1926年1月在广州国民党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由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大会重申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处分了“西山会议派”分子。但是，在大会的

选举中，由于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妥协退让，在36名中执委中，共产党员只占7名。戴季陶等右派仍被选为中执委员。在12名中监察委员中，共产党员只占1名，造成了右派势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为国民党右派篡夺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创造了条件。

国民党二大后，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利用窃取的权力，加紧了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活动。首先，为了排除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力量，篡夺军权，蒋介石一手策划了“中山舰事件”，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传令给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要他派中山舰等到黄埔候用。当中山舰开抵黄埔后，蒋介石却矢口否认曾有调令，诬蔑共产党搞阴谋暴动，要推翻国民政府。于是派兵占领中山舰，逮捕了李芝龙，扣押了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并强迫退出第一军。事件发生后，由于陈独秀等人的退让。使蒋介石轻易地达到了打击、排斥共产党，控制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目的。

此后，蒋介石的野心更大。1926年5月15日，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又制造了打击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的《整理党务案》。这个提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交国民党中央；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和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的指示，均须先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通过才能发出等。对此陈独秀等继续实行退让政策，并派张国焘、彭述之为大会党团负责人，接受了这一议案。选举结果，张静江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蒋介石

任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不久，蒋介石又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又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从此国民党的党、政、军、财大权被蒋介石控制。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化，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给以正确的回答。1925年5月，邓中夏发表《劳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要在革命斗争中同资产阶级争夺政权的思想。6月，周恩来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一文中，强调党要重视武装工作和组织军队工作。12月，李大钊在《土地与农民》一文中，考察了中国的农民问题，强调广大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1926年1月，瞿秋白在《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一文中，论述了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联合农民等许多重要问题。恽代英、蔡和森等也都发表文章探讨这些问题。

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首次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这篇文章中，他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以及对革命的态度，辨明了中国革命的敌、我、友，从而集中了当时党内关于民主革命问题的正确主张，初步提出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第一，明确认识到中国革命处于新的历史时代，即俄国十月革命开辟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国革命已不再属于旧民主主义范畴。

第二，论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指出，中国工业无

产阶级人数虽然不多，却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由于它具有集中和经济地位低下等特点，决定了它是特别能战斗的阶级。肯定了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第三，论述了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思想。分析了农民的各阶层，指出农民是一支伟大的力量，尤其是贫雇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

第四，明确区分了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界限，指出买办阶级是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同盟者。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翼的特点。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时代、领导力量、同盟军、革命对象和革命前途的分析，进一步发展了党的“四大”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

第三节 北伐战争

一. 北伐战争的准备

〔北伐前夕的时局〕广东革命根据地虽然得到了巩固与统一，但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仍在以北洋军阀为中心的军阀统治之下。直系军阀吴佩孚占据着湖南、湖北、河南及河北南部，控制着京汉铁路，拥兵20万。奉系军阀张作霖占据东三省和京、津及河北、山东的一部分，控制津浦路北段，兵力35万。从直系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拥兵20万，占据

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五省，扼守长江中下游，控制津浦路南段。1926年6月，在帝国主义指使下，直、奉两军在北京会谈，拟定了联合进攻革命势力的计划。在北方，直奉联合，以奉系为主，进攻国民军；在南方，以直系为主，联合孙传芳及各地军阀围攻广东。此时，广东政府处在北洋军阀联合进攻之下。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势在必行。

为了推翻封建军阀统治，将革命推向全国，1926年2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特别会议。会议决定党在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从各方面准备北伐，并在北伐中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扩大革命统一战线。会议强调大力加强群众工作，取得工农的支援是北伐胜利的基本条件。会后党的各级组织投入了动员工农群众支援北伐的工作。此时，工农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全国工会、农会组织及会员都有了明显的增加。1926年5月1日，党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和广东省农民第二次代表大会。与会代表积极要求广东政府迅速进行北伐，号召全国工农群众为北伐创造条件。会后，工农群众很快地投入到斗争中去，开始了抗粮抗税和反军阀的斗争，为北伐战争准备了条件。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形 成**〕农村大革命的迅猛发展，引起了一切反动派的仇视和恐惧。围绕农民问题，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也更加尖锐起来。地主豪绅、国民党右派和北伐军中的反动军官纷纷联合起来，大肆破坏农民运动。他们一方面散布各种谣言，诬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叫嚣农民运动“糟得很”，另一方面组织地主武装，残杀农民领袖和农民群众。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也表现了极大

的动摇。摆在党面前的是如何对待农民运动问题。担任党中央领导职务的陈独秀不是支持已经发展起来的农民运动，而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一边，采取了抛弃农民的政策。

1926年7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了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在陈独秀起草的决议案中提出了限制农民运动的要求：不能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农民协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农民武装不能超出自卫范围，不能有常备组织等等。这次会议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但是，当时农民运动正走向高潮，限制农民运动的主张受到党内许多同志的抵制，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全面执行。

会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又有了进一步发展。1926年12月，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在决议中，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错误地认为当前主要的危险是民众运动勃起并日益向左，蒋介石因恐惧民众运动而日益向右。这种左右倾是破裂统一战线的主要原因。根据这一错误分析，规定党的基本任务是“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其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以换取蒋介石向左转；扶助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陈独秀的政策是，既要拉住蒋介石，又要保护汪精卫。这实质上就是信任蒋介石、汪精卫超过了信任工农群众，以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右派势力的要求，自愿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这次会议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形成的标志，并开始在中央占统治地位，使全党没有集中力量支持正在日益高涨的工农群众运动，以应付蒋介石即将发动的反革命政变。

二. 北伐的胜利进军

〔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和胜利进军〕 1926年5月，广东国民政府派遣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进攻湖南，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7月6日，广东政府发布《北伐宣言》，明确指出：北伐战争的目的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全军共有8个军，约10万人，以蒋介石为总司令，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加伦为军事顾问。

北伐战争打击的直接目标是直系军阀吴佩孚，直系分支孙传芳，奉系军阀张作霖。根据敌强我弱和敌内部貌和神离的特点，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先打吴佩孚，再打孙传芳，最后消灭张作霖。国民革命军分三路出师，西路为主攻方向，进攻湖南、湖北，中路取江西，东路奔闽浙，吸引孙传芳的兵力。

西湖战场投入8万兵力，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为主力，叶挺独立团为先锋，与第三、七、八军相配合，几经血战，先取长沙，后占岳阳，迅速将吴佩孚势力赶出湖南。紧接着，在夺取华中重镇武汉的战斗中，独立团一马当先，英勇顽强，为夺取要隘汀泗桥、贺胜桥立下汗马功劳，武昌城克，直捣吴佩孚指挥所。10月10日，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消灭了吴佩孚的主要力量。吴佩孚败走信阳，从此一蹶不振。叶挺独立团的英勇善战，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光荣称号。

在江西战场上，国民革命军第二、六两个军于9月开始行动，11月占领九江、南昌，然后沿江东下，攻占安庆、芜湖，并于1927年3月24日，在挥师东进的西路军配合下夺取

南京。

闽浙战场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为主力，由于孙传芳主力被歼灭于中路江西战场，更由于北伐军的巨大声势，军阀部队望风披靡，纷纷投降。1927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领导工人阶级举行第三次工人起义，于22日占领上海。

驻扎绥远一带的冯玉祥部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于1926年9月宣布脱离北洋军阀，加入国民革命，并在五原誓师出征。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中，北伐军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将革命推进到长江流域，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1927年1月，国民政府迁往武汉。

〔北伐战争胜利的原因〕北伐战争能够迅速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国共两党领导和发动的北伐战争是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战争。由于北洋军阀长期的反动统治和连续不断的内战，使广大中国人民啼饥号寒，无以为生。北伐战争要消灭军阀的反动统治，因而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第二，北伐军采取了正确的军事方针；第三，北伐军英勇善战，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战争中发挥了先锋和模范作用；第四，苏联的支援。苏联除派有军事顾问协助北伐军指挥作战外，在物资和军火方面也给予了很大支援。

三、国民党右派集团叛变革命 国民革命失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着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发展，帝国主义加紧了干涉中国革命的罪恶活动。它们除直接武装干涉外，寻找新的代理人。蒋介石在帝

国主义的政治引诱下，加紧了反革命活动。

1926年底，蒋介石反对国民政府迁都武汉，要求迁往南昌的阴谋被挫败后，他仍以南昌为反革命中心，变本加利进行叛变革命活动。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全会通过了拥护三大政策，提高党权，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决议，并免去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但继续让蒋介石担任国民军总司令。蒋介石一方面加紧与帝国主义勾结，另一方面疯狂镇压革命运动。1927年3月6日，蒋介石密令枪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之后又以武力解散了国民党南昌市党部，袭击了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受到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欢迎。从4月1日起，蒋介石在上海进行了一系列的秘密活动，加紧布置反革命政变。4月11日，蒋介石密令实行清党。4月12日凌晨，全副武装的流氓打手冒充工人，向工人纠察队发动进攻，反动军队借口“调解工人内讧”，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支，上海总工会被洗劫一空，当场死伤300多人。4月13日，上海20多万工人罢工，遭到军警的血腥屠杀，死亡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这就是蒋介石制造的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国共统一战线发生了分化，蒋介石公开投入了帝国主义怀抱，成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4月18日，蒋介石在人民的血泊中建立起南京反革命政权。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反动的统治。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失败，大革命进入了紧急阶段。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在革命形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在武汉政府控制的地区又发生了宜昌夏斗寅叛变和长沙许克祥发动的“马日事变”。此时，武汉国民政府的领导人汪精卫的反革命真面目也逐渐显露出来。5月22日，汪精卫下达了压制工农运动的命令，并在6月10日和19日分别同冯玉祥和蒋介石举行了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共同策划宁汉合作、反苏反共的阴谋。7月15日，汪精卫不顾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举行了“分共”会议，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了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在“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民革命终于失败了。

〔国民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其教训〕国民革命失败的原因从客观上讲是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帝国主义、地主豪绅、军阀买办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结成反革命联合阵线，其力量大大超过了革命力量。主观上讲是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理论水平和领导经验都不成熟，特别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央占居了统治地位，放弃了革命领导权，特别是放弃了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加上共产国际指导上的失误，导致了这次革命的失败。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第一，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建立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参加的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对资产阶级必须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第二，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也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无产阶级只有放手发动和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建立牢固的工农联盟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第三，无产阶级在领导革命斗争中，只有建立起自己的武装，才能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强大统治下取得胜利。

国民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解决，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还会到来的。

思考题

1. 为什么说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如何继承和发扬五四青年的爱国主义精神？

2.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成为革命的指导思想？

3.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4. 怎样理解国共合作对中国革命所起的历史作用？从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可以吸取什么经验教训？

阅读书目

陈独秀：《敬告青年》

李大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周恩来：《关于1924至1926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

第三章 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救亡运动

第一节 国民党全国政权的建立及其黑暗的统治

一、国民党全国政权的建立

汪精卫叛变革命以后，全国形成了三个政权鼎立的局面，这就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南京政府；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武汉政府和奉系军阀张作霖把持的北京政府。他们各自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为争夺全国的政权而进行着激烈的争斗。

蒋介石在建立南京政权后，要求武汉政府归并南京，而汪精卫则以国民党中央正统自居，力主“倒蒋”，从而形成了宁汉对立的局面。南京政府中的胡汉民派和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为削弱蒋介石的势力则主张联合汪精卫，实现宁汉合作。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也主张宁汉合作，以进攻奉系。蒋介石陷入孤立境地，遂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1927年8月13日宣布下野。蒋介石的下野，促进了宁汉合流，8月22日，宁汉双方代表商谈合作。8月25日，武汉政府宣布迁都南京。宁汉合流正式实现。9月，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方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并重新改组了“国民政府”。这样，国民党内部的矛盾由两个政府的斗争转变为蒋、桂、

冯、阎、粤各派新军阀之间的斗争。

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的实权落在了桂系军阀和西山会议派手中。汪精卫因其地位不稳重返武汉，策动唐生智同桂系对抗，不久，发生了唐、桂之战，唐生智兵败下野。而广东军阀张发奎、李济深则公开打出“拥汪护党”的旗帜，联名电请汪精卫回粤“主持党国大计”，10月底，汪精卫抵广州，宣布南京政府为非法，并积极联合各派势力同南京政府对抗，从而出现了宁粤对立的局面。宁粤对立，为蒋介石重新上台提供了时机。而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在同奉系的战争中受到强大压力，希望蒋介石重新上台，以结束国民党内部的争斗，联合攻打奉系。掌握南京方面大权的桂系军阀为打击汪派和粤系，也主张蒋介石复职。12月3日，国民党在上海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1928年2月，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蒋介石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随后，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主席，至此，蒋介石重新掌握了国民党的军政大权。国民党新军阀内部取得了暂时的妥协。

蒋介石上台后，将军队改编为4个集团军。蒋介石任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担任第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在“统一中国”的旗帜下，1928年4月，开始了讨伐张作霖的“北伐战争”。“北伐”部队进入山东，战胜张宗昌的军队之后，进逼京、津地区。奉系军阀张作霖见大势已去，6月放弃北京，败走关外，日本帝国主义看到张作霖败局已定，在皇姑屯将张作霖炸死。蒋介石在占领京、津之后，鉴于日本方面的牵制，对继任东北保

安总司令的张学良采取了和平统一的方针。在美国的斡旋下，张学良不顾日本方面的压力，于12月29日通电全国，决定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至此，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统一”。

二、新军阀混战

〔**新军阀的混战**〕1928年，国民党政府取得了统一。但是，这是表面的，国民党内部各派之间的明争暗斗仍然存在。两广、四川、西北和东北各地方军阀都相对保持半独立状态，分裂割据，并不断和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公开对立以至发生战争。1929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编遣会议，企图遣散其他军阀的军队，扩充自己的实力，并且在国民党三大上排斥反对派，引起了国民党内各派系的不满，从而导致了国民党各派新军阀的混战局面。

1929年3月，首先爆发了蒋介石同李宗仁、白崇禧争夺两湖地盘的蒋桂战争。10月，又爆发了蒋介石和冯玉祥争夺山东地盘的蒋冯战争。11月，粤军张发奎联合桂系组成“护党救国军”，挑起第二次蒋桂战争。蒋介石在这些军阀混战中，采取了政治分化和军事打击的策略，因而一一战胜了他的对手，使国内的战事暂时停止。但是，不久又爆发了蒋冯阎的中原大战。各派军阀在共同的利益上联合起来共同反蒋。1930年3月，冯、阎、桂三个集团的将领鹿钟麟、商震、黄绍竑等人发出通电，历数蒋介石的罪状，促其下野，并推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等为副司令，共同反蒋。5月，空前规模的军阀大混战正式揭开。东起山东，西至襄樊，南迄长沙，在千里战场上，百万

大军在厮杀，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7月，冯、阎联合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和谢持、邹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9月初，在北平成立“国民政府”，推阎锡山为主席，汪精卫、冯玉祥和李宗仁为委员，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相对抗。拥兵关外的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观望数月后，终于在蒋介石委张为海陆空军副总司令、赠军饷3000万元和让出青岛给东北军接防的诱惑之下，于9月18日发出拥蒋通电，派军入关，使整个战局急转直下。10月，阎、冯通电下野，11月初，“扩大会议”和它的政府随即垮台。中原大战以阎、冯失败而结束。蒋介石借此削弱了地方军阀，扩张了自己的势力，建立起国民党新军阀对全国的独裁统治。

〔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特点〕 1927年以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代替了旧的北洋军阀，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反革命统治。蒋介石政权在阶级本质上与北洋军阀并无差别，依然是一个在帝国主义扶植下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但是，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同旧军阀相比，又有某些新的特点：第一，蒋介石集团窃取并利用了曾经是革命的国民党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他们欺骗人民的幌子，在“革命”词句的掩盖下，进行着反革命的罪恶勾当；第二，蒋介石上台后，建立了一支以“黄埔系”为骨干的在数量和装备上都大大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军队，并且在全国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组织，对人民实行法西斯式的统治。第三，蒋介石集团以政治强制和军事掠夺的形式，促成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垄断了全国的财政金融，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人民生活日益贫

国，国家日益落后。因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更富于欺骗性、买办性和残酷性，是中国历史上最反动的专制势力。

三、国民党政府的内政和外交

〔对外投降外交〕国民党新军阀政府，既然是一个在帝国主义扶植之下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也就决定了其外交方针必然是投靠、依附帝国主义。

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1927年12月，声明对外“要联合各国共同对付第三国际”，心甘情愿充当帝国主义反苏反共的工具。1928年3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与美国驻华公使达成的解决南京事件的换文中，竟把北伐战争中英、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炮轰南京所犯的罪行，说成是中国人民损害了英美的利益，反而向英美等帝国主义赔款、道歉，甚至下令通缉“宁案”要犯林伯渠。其后，国民政府又同日本就济南惨案进行谈判。在所达成的协议中，也将日本帝国主义杀害中国军民和造成的严重财产损失的罪责一笔勾销，只宣称中日两国所受损害，由中日联合实地调查决定，中国政府还要负责保护日本人在中国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蒋介石政权，就是这样不惜牺牲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以换得帝国主义对他的支持。

1928年7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起了收回关税自主权和领事裁判权为主要内容的“改订新约运动”。帝国主义为了欺骗舆论，也在形式上做了某些让步。美国为了保持在华的外交优势，首先与国民党签订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系之条约》。随后，德、意、英、法、日等十几个国家先后同国民

国民党政府重订了通商和关税新约。在与各国签订的条约上，虽然都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但实际上却对提高中国的关税作了种种限制，并且各国仍保留享有最惠国待遇。这样，中国仍无权自定关税。而帝国主义则借国民党卖国之机，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除了大量向中国输出资本和商品外，还派人担任中国各地海关的要职，控制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金融和经济命脉，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殖民地化。关于废除在华领事裁判权的谈判，则更是空有其名。1929年4月，国民党政府分别照会英、美、法等国家，要求各国废除领事裁判权。各国协商后虽口头上同意，实际上拒绝。1931年5月，国民党政府公布了《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规定1932年元旦施行。不久，“九一八”事变，国民党政府只得暂缓执行。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不了了之。

“改订新约”运动，并没有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相反却加深了国民党政府对帝国主义的依赖。

〔国民党政府的军事独裁统治〕1929年，蒋介石在打垮了阎、冯、桂的军事进攻后，为使自己的统治地位合法化，于5月召开了国民会议，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使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以约法的形式确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政治体制，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在军事上，国民党政府建立了一支超过当时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庞大武装。为了加强中央军的作战能力，使之成为国民党军事专政的支柱，蒋介石聘请了大批的外国军事顾问，购买了大量外国军火。此外，还改建、扩充了地方武装，建立了省以下的地方保安机构和保安团、队。同时，又组织和强化

各种特务系统，建立了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组织，在乡村普遍推行保甲制度，作为专制统治的工具。

在经济上，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垄断集团。他们凭借手中的政治权力，在长期的内战中用各种方式搜刮军费，掠夺财富。1928年，国民党政府成立中央银行，通过发行兑换券、铸发国币、经管内外债等特权，到1931年，中央银行的总资产增加了二倍多。其间，国民党政府还控制了北洋军阀时代规模最大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又成立了中国农业银行，设立了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形成了以“四行两局”为中心的垄断金融体系。凭借这些机构，国民党政府除增加各项捐税外，还发行了大量公债。而这些公债大多是用军费开支。此外，它们还通过银行投资和政治强制手段，使民营企业“国有”化，使“国有”企业私有化。从而操纵了全国的经济命脉，成为蒋介石政权的经济基础。

由于蒋介石上台后，奉行的仍然是对外投靠帝国主义的政策、因而使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也就更加深入了。它们垄断了中国的重工业，轻工业、财政金融和交通运输等。如中国的钢铁工业一向为日本垄断；煤业则为日、英两国垄断；全国发电量最大的上海电力公司为美国所垄断。在轻工业中，外资占绝对优势。如1928年，在上海市工业投资总额中，外资占1/3。在交通运输方面，中国铁路的84.3%被帝国主义直接经营和控制。同样，在金融财政上，帝国主义凭借雄厚的资金压制中央银行，自行在华发行纸币，操纵中国的外汇价格，控制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金融大权。由于国家的经济命脉仍控制在帝国主义手里，中国的经济日益衰退、凋

蔽。

在文化上，蒋介石为维护其统治，加强了对文化思想领域的全面控制。1934年，蒋介石发起了新生活运动，以抵制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此外，国民党政府还采用强制手段，查封进步书刊。颁布各种“审查条例”、“出版法，”以绑架、暗杀等手段迫害左翼的和进步的文化工作者。

在政治上，蒋介石为确立和巩固他的一党专政统治，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和镇压。1928年2月，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制止共产党阴谋案》，要铲除共产党的理论、方法、机关、运动。此后又颁布了《中华民国刑法》、《民众运动案》、《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等一系列反革命法令。在这些反动法令下，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遭到残杀。

第二节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 全国政权道路的开辟

一、党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革命转入低潮〕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革命转入低潮。首先是革命力量遭到了极大摧残。国民党新军阀统治建立后，在全国范围内制造白色恐怖，对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实行野蛮的大屠杀。从1927年蒋介石叛变到1928年上半年，被害的共产党员和群众达33.7万多人。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如蔡和森、陈延年、赵世炎、恽代英、彭湃、向警予、夏明翰、罗亦农等都惨遭杀害。党的队伍由原来的6万多人减少到1万人左右。其次是工农运

动受到了打击。大革命失败后，许多革命工会都被封闭，工人领袖被捕、杀。1929年，工会会员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300万仅剩下3万人。许多优秀的工人被工厂开除，大批工人失业。工人的劳动时间一般都恢复到每天11个小时以上，甚至更长，而工人的工资却在不断的减少。在农村，农民协会被解散，农会会员受到迫害，土豪劣绅对农民反攻倒算，加租加息。据统计，1932年，全国捐税达1700多种，加上军阀混战和自然灾害，造成成千上万的农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第三，大革命失败后，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跟随大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因而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革命力量只剩下了无产阶级、农民和贫苦的小资产阶级。中国革命的形势转入了低潮。

〔“八七”会议〕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次会议的任务是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任务。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等重要文件。

这次会议的历史功绩在于：第一，在政治上，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从理论上，路线上系统地对陈独秀投降主义进行了清算。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着重批评了陈独秀不抓军队、不要武装斗争的严重错误。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第二，在组织上改选了党中央领导，解除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第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举行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为全党领导革命指明了方向，使党进了一大步。但是这次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却为党内滋长起来的“左”倾情绪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关于中国革命形势、革命性质、阶级关系等问题的“左”的观点。这对以后的中国革命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八一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是由临时中央根据派往九江一带工作的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人的建议而决定的。

1927年8月1日，前委书记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在克服了张国焘的阻挠后，领导了在党影响和掌握下的军队约3万人，在江西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经过激烈的战斗，全歼南昌城内的敌军1万多人。起义后，成立了以共产党人为主体的，包括国民党左派的革命委员会，发布了《起义宣言》，宣布继承北伐革命没有完成的事业，反对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提出了《土地革命宣传大纲》。同时，重新整编了起义部队，贺龙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叶挺为前敌代总指挥，刘伯承为参谋长。

南昌起义的胜利，使敌人大为恐慌。蒋介石、汪精卫急忙调军队向南昌进攻。8月5日，起义部队退出南昌，向广东进军，准备夺取广州，重建革命根据地。经过一个半月的艰苦战斗，9月下旬，攻下潮州、汕头。但不久，在汤坑地区遭到敌军2万余人的围攻，几经激战，终于失败了。有1千多人突围到海陆丰地区坚持斗争。一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转战湘南、后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

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第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

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革命紧要关头，全国人民树立起鲜明的革命斗争旗帜，给国民党新军阀屠杀政策以英勇的回击，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畏强敌，前仆后继的精神；第二，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创建了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之一，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大贡献。8月1日被定为中国人民军队的建军节。

南昌起义证明，在革命低潮的形势下，革命力量要想重新占领敌人统治的中心城市，继续走北伐战争的道路已经不可能。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必须探索新的革命道路。

〔秋收起义〕“八七”会议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先后举行了200余次武装起义。毛泽东受党中央委托，“八七”会议后以中央特派员身份，赶赴湖南。8月18日，湖南省委开会，由毛泽东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研究了秋收起义的重大问题，制定了具体计划，并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9月9日，爆发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参加这次起义的部队有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平江、浏阳的农军和安源的工人武装，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由卢德铭任总指挥，下辖四个团，共5000多人。

起义爆发后，工农革命军曾取得白沙、醴陵、浏阳等战斗的胜利。后来，当起义部队分别从修水、铜鼓、安源等地向长沙进攻受挫后，毛泽东命令起义部队到浏阳的文家市集中，放弃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于20日带领部队向敌人力量薄弱的井冈山地区进军。途中遭到敌人多次截击，损失很大，只剩下几百人。9月29日，当部队到达莲花县三湾时，毛泽东召开了党的前敌委员会会议，进行著名的三湾改编。将

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确立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班、排成立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以上有党委，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使工农革命军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部队中进行了民主改革，采取了许多革命措施。这样，就为建立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奠定了基础。10月底，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始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秋收起义向井冈山进军，是中国革命向农村转变的一个重要关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一）它是中国革命由城市转入农村战略转变的开始。向井冈山进军，是革命在城市失败后，把进攻与退却结合起来的最好典范；

（二）它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起点，是继十月革命之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

（三）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设了一支新型的工农红军。

〔广州起义〕 1927年12月11日，张太雷、苏兆徵、叶挺、叶剑英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一部和广州的工人赤卫队为骨干，共5000人，举行了广州起义。起义军经过激烈战斗，消灭了城内守敌。是日上午，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选举苏兆徵为主席。公布了政府的各种纲领和政策。

广州起义给了国内外的反动派以震惊。他们勾结起来向革命武装反扑。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出动炮舰，不断向市区轰击，国民党军队也在帝国主义的配合下大举反扑，起义部队虽经浴血奋战，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被迫撤出广州。总

指挥张太雷和周文雍等在这次起义中壮烈牺牲。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和工人联合起来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又一次英勇的反击，是党在大革命失败后，领导工农武装夺取政权的又一次尝试。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新军阀。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连接起来，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与创立红军的开端。

〔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84人，候补代表34人，代表4万多党员。这次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1）它正确地肯定了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2）它正确地指出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3）大会制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反对了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并指出当前党内主要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大会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当时由于过分强调工人成分，向忠发被选为总书记，但他实际上没有起到总书记的作用。

这次大会的缺点是：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认识不足。因此，没有解决革命力量必须由敌人力量较强大的城市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这个关键问题。

二、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立〕 1927年10月，毛泽东领导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创了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首先恢复、整顿和建立了湘赣边界党的各级地区组织，先后成立了宁冈、永新、茶陵、遂川四个县委，酃县成立了特别区委。同时，部队深入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助群众建立农民协会等革命组织和各级工农革命政权。此外，还积极争取和改编了原在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的地方武装，建立和发展农民暴动队、赤卫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到1928年2月，初创了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暴动的农民军来到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在宁冈砦市胜利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同时，又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第四军委员会和湘赣边区特委会。井冈山会师，进一步壮大了革命力量。在军委和特委的领导下，粉碎了湘赣两省敌人的多次“会剿”。特别是龙源口大捷，歼敌1个团，取得了根据地建立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经过红军的战斗，根据地发展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和吉安、安福、遂川、酃县。井冈山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在它的影响下，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迅速发展。到1930年夏，全国各地的红军已近10万人，先后在全国十多个省开辟了大小15块革命根据地，其中主要有

井冈山、湘赣边根据地、赣南闽西根据地、湘鄂赣根据地、赣东北、闽北根据地、湘鄂、洪湖根据地、左右江根据地。这些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为中国革命重新聚集了力量，开创了在革命转入低潮时期，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局面。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是毛泽东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初期，在不断总结井冈山斗争和各革命根据地斗争的经验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六大”以后，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都有了很大发展。但是，仍有人热衷于城市起义，反对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特别是根据地内部也有一些人由于四周白色恐怖，斗争环境异常艰苦，在困难面前产生了悲观情绪，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1928年10月至1930年1月，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先后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三篇著作，从理论上回答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问题。其基本内容是：

第一，论述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道路的必要性。

从社会性质看：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国内外敌人极端凶恶残暴，内无民主，外无独立，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权利。所以，在中国只能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特征。

从革命性质和革命动力看：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

主革命，而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是土地革命。中国的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由于身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所以，中国的武装革命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战争。无产阶级要夺取全国胜利，必须派遣自己的先锋队深入农村，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

从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看：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他们的统治力量主要在中心城市，特别是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占据了全国的中心城市，革命力量在城市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从而使革命力量很难在城市首先发展起来。而广大的农村，特别是偏僻的边界地区，则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无产阶级要坚持革命，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斗争，那就必须把革命的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在那里积聚力量，把落后的农村改造成为先进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借以在长期的斗争中逐步地削弱敌人，壮大自己，以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第二，论述了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在强大的敌人压迫下，农村根据地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

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所谓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指中国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地方性的农村经济占优势。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农村相对地可以脱离城市，不依赖城市而独立生存，这样，在敌人经济封锁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可以自力更生地长期在农村坚持革命战争。政治不平衡，就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力量在全国不平衡不统

一。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中国统治阶级内部分长期的分裂和战争，它削弱了敌人的力量，又造成了敌人之间进攻革命的不一致，给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于农村和边远山区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广大农村又是封建压迫严重、社会矛盾尖锐的地区，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存在造成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经过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许多地区、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因此，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首先在这些地区存在和发展。

有相当数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同国民党对抗，造成武装割据的局面。

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不错误，是保证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意义〕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是中国长期革命战争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它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从根本上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和陈独秀的取消主义和党内的右倾悲观主义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通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国革命才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工农联盟和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无产阶级

领导农民进行革命战争,开展土地革命,以乡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学说,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三、反“围剿”斗争和长征的胜利

〔红军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极大恐慌。1930年中原大战以后,蒋介石调集重兵,连续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三次大规模“围剿”,重点进攻赣南闽西根据地。赣南闽西根据地的红军战士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执行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依靠根据地人民的支援和帮助,分别于1930年12月到1931年1月,1931年4月到5月,1931年7月到9月,粉碎了国民党的三次“围剿。”其它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也取得胜利。

在反“围剿”斗争中,工农红军逐步摸索出一套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毛泽东同志在1936年写下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这些原则做出精辟的概括。他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有四个基本特点:第一,它是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而且又经历了1924——1927年的大革命后发生的;第二,敌人强大;第三,红军弱小;第四,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些特点决定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是“围剿”和反“围剿”,规定了红军作战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实行人民战争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红军的作战原则是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打歼灭战、速决战,在运动中消灭敌人。这些作战原

则的提出，解决了弱小的红军如何战胜强大的敌人这个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最大难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思想。

随着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各根据地内部普遍打倒了地主政权，建立了县、区、乡各级政权。1931年11月7日到20日，在江西瑞金城北的叶坪，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毛泽东同志为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会议还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一系列法律、法令。

1932年5月，蒋介石又一次调集63万兵力，对革命根据地发起第四次“围剿”。鄂豫皖根据地和湘鄂西根据地的红军官兵英勇抗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但是，由于受到错误路线的干扰，均遭到严重损失，鄂豫皖红军转向川陕边界开辟新根据地，湘鄂西红军则转战于湘鄂川黔边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局面也是严峻的，毛泽东已被错误的临时中央排挤出中央领导岗位，所幸错误的军事路线还未贯彻到红军中。在朱德和周恩来同志的指挥下，红军灵活运用前三次反“围剿”作战中的成功经验，采取大兵团伏击和集中兵力围歼的原则，于1933年2月到3月，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使根据地进一步巩固，红军进一步扩大。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1年1月，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宗派主义小团体在共产国际支持下掌握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在工作中推行一系列“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给各方面工作带来严重损失，使革命处在严重的危机之中，就在这种形势下，

蒋介石于1933年10月，经过半年多的准备，在德国、意大利、美国军事顾问的直接参与下，调集100多万部队，200架飞机，对长江流域的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直接用于中央根据地。蒋介石亲自到南昌指挥。这次“围剿”，敌人改变了前几次“围剿”中“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而是分兵四路，采取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方针。修公路以分割根据地，建碉堡以紧缩根据地，准备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和作战物资，然后一举消灭红军，占领根据地。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来到苏区后，不懂军事，一切听命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指挥。而李德不了解中国的情况，硬搬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联正规军的经验，实行了一条“左”的军事路线，放弃了历次反“围剿”中红军游击战的经验，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其原因是：

第一，错误地估计了形势。1934年1月，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会议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第五次反“围剿”就是红色政权与国民党政权、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决战，夺取全国政权的形势已经到来。这次会议，标志着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发展到了顶点。

第二，实行了“关门主义”政策。1933年11月20日发生福建事变，国民党十九路军建立了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被迫从“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队中抽掉部分兵力前去镇压。而当时的中央，却先后发表了《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中央为福建事变第二次宣言》，不承认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和蒋介石的矛盾，把本来可以争取的力量推到反革命一边去。

第三，在军事上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方针。即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刚开始，“左”倾错误领导者拒绝采用毛泽东过去的集中优势兵力和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而是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命令红军“全线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贸然进攻敌人的坚固阵地，以主力对主力，使红军受到很大损失，陷于被动地位。

当福建事变发生后，毛泽东主张将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迫使蒋介石回援江浙，红军既可趁此机会粉碎“围剿”江西的敌军，又可以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博古、李德却拒绝毛泽东的主张，错过了时机。结果，蒋介石在打垮了十九路军后，又调军队对红军重新围攻。这时，蒋介石分六路围攻红军和根据地，一面修碉堡，缩小包围圈，一面修公路分割根据地。此时毛泽东主张，应当把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挺进，跳到外线去消灭敌人。但是博古、李德仍没有采用毛泽东的意见，而是采取六路分兵、六路防御，与敌人打阵地消耗战，使红军遭受重大伤亡。断绝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红军不得不退出根据地，被迫进行转移。红军在转移、退却中，“左”倾机会主义者又犯了行动无计划、军事无准备，政治无动员的逃跑主义错误。给红军带来了惨重的损失。给革命造成了严重危机。

〔遵义会议〕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根据地，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瑞金，雩都等地出发，开始长征。红军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人员由出发时的8万减少到了3万多。这时，蒋介石纠集了40万军队在湘

西堵截准备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中央红军。博古、李德仍主张同敌人硬拚，把希望寄托于会合上。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形势，力主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这一主张得到了中央大多数人的拥护。于是，决定部队立即向贵州进军，12月，红军攻克黎平，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城。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1）在军事上，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方针，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军作战的正确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2）在组织上，改组了中央领导机关，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会后又组成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

遵义会议是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召开的，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遵义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后，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指挥下，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佯攻贵阳，直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长征途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接着，又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胜利到达陕北，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第二，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会议，是党的历史上意义最为深远的伟大转折，标志着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第三，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走上了胜利发展的道路。

〔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胜利会师。中共中央根据两大主力红军会师的形势，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确立了北上建立川陕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但是，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却自恃兵力雄厚，提出要向川康边界退却，与中央方针发生了严重分歧。为了团结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党中央先后在北上途中召开了沙窝会议和毛儿盖会议，党中央同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帮助。张国焘表面上不得不接受中央的方针。同时，党中央还决定将红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继续北上。左路军以朱德为总指挥，张国焘为政委，刘伯承为参谋长。右路军以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机关随右路军。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又按兵不动，以种种借口反对北上，后擅自决定率军南下川康。他不仅直接对抗党中央的命令，而且暗中密电右路军陈昌浩，企图危害党中央和毛泽东。针对张国焘的右倾分裂行为，9月12日，党中央在川甘边界的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决定》，再次电示张国焘率部北上，但张国焘顽固地坚持其

错误主张。9月中旬，他强令左路军和右路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并于10月间，在卓木碉公然成立党中央。俄界会议后，红一、三军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继续北上。10月，突破天险腊子口。这时，中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随后，红军又越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抵达陕北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11月下旬，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指挥下，于直罗镇全歼敌军一个师，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进攻，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在党中央率红军继续北上的同时，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等始终坚持全党团结的方针，同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早在阿坝，张国焘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朱德就严正警告张国焘：“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1936年1月，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这是：“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电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伪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迅即北上。但张国焘坚持错误，拒不执行中央命令。这时，红四方面军因天全、芦山地区形势日益严重，前有敌人，后无根据地，被迫退至西康甘孜一带。同年7月，根据党中央指示，红二方面军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进行长征。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下，迅速到达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在朱德、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等坚决斗争和四方面军指战员的要求下，张国焘被迫取消了伪中央，表示愿意同二方面军一起北上。这样，到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地区胜

利会师。历时两年的红军主力长征以胜利宣告结束。

三大主力会师后，张国焘仍然继续坚持他的反党退却路线。1937年3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红军长征胜利的意义〕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从江西、福建出发长征，到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和陕北红军会合，历时一年，经历了11个省，行程25000里，战胜了军事上、政治上和自然界的无数艰难险阻，终于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它具有伟大的意义：首先，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是震惊世界的伟大壮举，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实现了空前未有的战略大转移，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开辟了胜利前进的道路；其次，长征向全世界宣告，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人是不可战胜的。在长征途中，红军经历了300多次战斗，击溃了400多个反革命武装，爬雪山、过草地，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长征结束时，全国的红军由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全国的党员也只剩下4万左右。人数是减少了，但他们是一批久经考验的革命骨干，是中华民族的精华；第三，长征的胜利，在全国扩大了革命影响，它告诉人民，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真正解放的道路，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团结抗日。总之，长征是以敌人的失败和红军的胜利而载入史册的。

第三节 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和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一、民族危机加深，全国抗日运动高涨

〔“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自己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沟附近的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然后诬称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并以此为借口，大举进兵沈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实行了不抵抗政策。蒋介石下令东北军将领张学良，“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严禁张学良的东北军进行抵抗。结果，张学良率几十万东北军向山海关以南撤退。19日，日军占领沈阳。1932年2月，日本又顺利地夺下锦州、哈尔滨。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日军占领了整个东北三省，使3000万同胞沦为亡国奴。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卖国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宣言，并号召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东北人民在党的号召和领导下，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上海、南京、天津、武汉等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市民纷纷罢课、罢工、游行示威，要求蒋介石政府抗日。各地人民还组织各种救亡团体，开展抗日活动。各城市的学生组织请愿团前往南京，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冲击下，国民党的统治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胡汉民和汪精卫，策动两广的军阀与

蒋介石南京政府进行争夺权利的斗争，要求蒋介石解除兵权和主席职务。蒋介石处境困难，极端孤立，被迫于1931年12月22日，宣布下野。蒋介石下台后，国民党集团呈现一片混乱局面，大小军阀实力派拥兵自重，乘机扩大地盘。1932年1月，蒋、汪重新合作，蒋介石再次上台，同汪精卫联合执政，变本加厉地推行对日妥协的政策。

〔“一二·九”运动〕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三省以后不久，又侵占了热河。1935年，又向国民党提出了放弃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从东北调遣军队入关，威胁北平、天津，扬言如不接受日本的要求，就要采取“自由行动”。国民党政府完全屈服。电令何应钦与日方谈判，全部承诺日方要求，签订了“何梅协定”。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加紧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青年学生悲愤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推动下，全国抗日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爆发了“一二·九”爱国运动。

1935年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在中共北方局和各校进步教授的组织带领下，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阻挠，走上街头，高呼“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举行了大规模的抗日救国请愿游行。国民党政府出动大批军警，用大刀、皮鞭、水龙袭击游行队伍，打伤100多人，逮捕30多人，接着，军警、密探又封锁、监视学校，并继续抓人。12月10日，根据北平学联的决定，全市学生实行总罢课。

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在全国各地引起强烈的反响。南

京、上海等10多个大城市的各界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各地爱国人士纷纷成立救国会。“一二·九”运动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声援，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

“一二·九”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1）冲破了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恐怖统治，揭露了日本吞并中国的阴谋，打击了蒋介石的卖国政策；（2）这次运动，大力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使其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3）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激情，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高潮的起点。

二、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方针的确定

〔瓦窑堡会议〕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又进一步侵略中国，国内抗日民主运动出现了新高潮。面对这一新的形势变化，中国共产党为了对当前的形势作出正确的分析，于1935年12月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会议的中心内容是确定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对这一政策做了全面的阐述。其内容是：

第一，分析了时局的基本特点。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东北四省后，现在又并吞了整个华北；而且正准备并吞全中国，并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的行动，重新唤醒了全中国人民，掀起了新的民族革命高潮。同时，在这种形势下，反革命

营垒出现了动摇、分裂与冲突，不仅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广大的知识分子是抗日的基本力量，甚至一部分富农、地主及军阀对新的民族运动也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

第二，规定了党的策略路线。决议规定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各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战争。只有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

第三，改变过去的一些重要政策。为了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提出将“工农共和国”口号改为“人民共和国”，其目的是为了为了使苏维埃从代表工人和农民的政权扩大为代表中华民族的政权。

第四，强调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共产党要在中国革命中取得领导权，单靠宣传鼓动是不够的，必须使它的每一个党员在实际斗争中，表现出他们是群众的领导。在目前的形势下，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为了更好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争取党的领导权，党必须同党内的“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作斗争。

瓦窑堡会议的意义：瓦窑堡会议是继遵义会议后又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问题，扭转了“左”倾机会主义给党造成的长期孤立的局面，确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为推动全国的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根据党中央的决议精神，于1935年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基本内容是：

第一，报告根据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独占殖民地所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论述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危险，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坚决要求抗日的，并且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力量。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他们具有软弱性的特点，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害怕革命的彻底性，但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至于地主买办阶级，其营垒也不是完全统一的。由于他们分别投靠于各个帝国主义，当斗争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走狗们则要遵照其主人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明争暗斗的。这一切表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可能的。

第二，根据中国革命和反革命力量的对比，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力量还大于现实的革命势力，又由于中国政治经济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必须准备持久作战，必须调动千千万万的民众，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动员一切抗日力量，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就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第三，批判了“左”的关门主义错误。“左”倾关门主义者否认由于日本的侵略而产生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既不承认民族资产阶级的变化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也不承认地主买办阶级营垒内部的矛盾，因而拒绝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其结果是把可能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关在门外，把他们赶到敌人那边去，使革命停滞、孤立、甚至失败。

第四，解释了以人民共和国代替工农共和国的口号的意义。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反封建的阶级。它的基本政策是保护工农群众的基本利益，允许民族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人民共和国较之工农共和国的成份要广泛得多，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外，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也可以参加。

第五，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毛泽东在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仅应当在统一战线中掌握领导权，而且也有力量担负领导责任。共产党和红军不但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将会是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的台柱子。因此，共产党必须扩大自己的队伍，扩大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放手发动群众，巩固自己的领导权。

毛泽东的这一段报告，以阶级分析的方法，阐明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根据，成为建立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

三、西安事变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西安事变**〕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推动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也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东北军张学良

和西北军杨虎城亲笔致函蒋介石，要求抗日。但蒋介石仍逼迫张、杨继续剿共。1936年10月下旬，蒋介石亲自到西安督战。张、杨两位将军以“苦谏”请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到拒绝，遂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响。国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南京政府与西安妥协，力图挑起中国内战。英美则反对用武力解决这次事变，以维护他们的在华利益。国内，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企图借机扩大事态，讨伐张、杨，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而亲英美派的宋子文，孔祥熙等力争使蒋获释。

中共中央在接到张、杨的邀请参与处置西安事变急电后，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正确地分析了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以及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出了以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的代表团，前往西安协助张、杨处置事变。代表团根据中央的指示，在西安向张、杨及东北军、西北军将领阐明了中共采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在西安各界人士中宣传这一主张。12月23日，宋子文、宋美龄代表南京政府与张、杨谈判。蒋介石于24日接受停战议和，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等条件。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西安事变得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对推动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逼蒋抗日政策的胜利，推动了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1937年2月中旬至6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同国民党的代表蒋介石、顾祝

同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了多次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中国共产党为了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迅速共同对日作战，在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的前夕，于1937年2月10日发出《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了实现国共合作抗日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第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第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第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中国人才，共同救国；第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的一切准备工作；第五，改善人民生活。电文还表示，如果国民党政府能将此五项要求作为国策，共产党本着团结御侮的诚意，愿作以下四项保证：第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执行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武装暴动方针；第二，工农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的指导；第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现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第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持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为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建议，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在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亲手订联俄、联共，拥护农工三大政策案”。经过斗争，国民党三中全会终于通过了一个实际上接受中共提议的决议案。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

思 考 题

- 1、 国民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统治为什么成为中国革命的直接目标？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为什么能迅速兴起？

2、 中国共产党人冲破教条主义束缚，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重大意义何在？它的历史经验在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有何现实意义？

3、 如何正确认识“一二、九”运动的历史经验？今天应该怎样继承和发扬“一二、九”运动的光荣革命传统？

阅 读 书 目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二）

《青年运动的方向》

《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一、二）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

第四章 全民族的抗日战争

第一节 全民族抗战的兴起

一、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国内形势和第二次 国共合作的形成

〔抗日战争的爆发和全民族抗战的实现〕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芦沟桥事变，进攻北平；8月13日，又进攻上海。中国守军奋起反抗，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日本帝国主义在1937年下半年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国际形势变化和日本国内矛盾日益激化的结果。首先，吞并中国和独霸亚洲是日本统治集团的既定国策。其次，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列强之间瓜分世界斗争日益尖锐，日本采取先下手为强的政策。第三，为了缓和国内阶级矛盾，转移人民的视线，防止世界经济危机的袭击，迫不及待地发动侵华战争。

芦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便向全中国人民发出紧急呼吁，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各界爱国人士和群众团体也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特别是“八·一三事变”

后直接威胁着蒋介石的统治中心；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8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自卫”声明，宣布中国决不放弃领土的任何部分，全民抗战得以实现。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7月15日，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7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又约见蒋介石，就红军改编、边区政权等问题谈判。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同意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独立指挥机构。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共产党的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实行两党合作。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 在民族战争历史条件下的统一战线，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广泛的民族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侵略、捍卫中华民族独立为中心目标，包括所有的抗日阶级和阶层，不仅有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而且包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英美派。这些阶级和阶层具有不同的利益，相互之间存在矛盾，抗日的坚定性也不同。特别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集团，具有极大的妥协性和动摇性，同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

第二，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有政权、有军队的合作。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是两党经过十年分裂后的第二次合作，

国民党掌握着全国政权和200多万正规军。共产党也拥有了自己的军队和政权，并且日益成长壮大。国民党对共产党政权和军队的限制同中国共产党反限制的斗争，成为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

第三，长期性。抗日战争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反侵略战争，这决定了统一战线的长期性。这是中国共产党制定一切政策的出发点。

第四，没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的政治纲领，而是采取遇事协商的办法。国民党总是想利用占据全国政权的优势地位控制共产党和其它力量，这就增加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重要性。

第五，处于既有利又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得到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得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苏联的援助。但是这些援助主要是给予国民党的。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坚持自力更生原则，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夺取抗战的胜利。

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全国抗战部署及其抗战纲领〕 1937年8月12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及国共联席会议，部署全国抗战。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作为抗战最高统帅部，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何应钦为参谋总长。会议制定了持久消耗战的作战方针，并将全国划分为新的战区，调整部署全国军队。

8月25日，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将西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到9月12日根据战时序列改称第十

八集团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下辖115师、120师、129师。10月12日，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

全国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在指导抗战的路线上存在分歧。国民党在抗战初期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性，制定《抗战建国纲领》，成立由共产党和其它民主党派参加的国民参政会，释放一批政治犯，并给了人民较多的自由。但是，从根本上看，国民党执行的是一条不要人民参加的单纯政府负责的片面抗战路线。所以，国民党的进步是有限的。

中国共产党认为，单纯的政府抗战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依靠全国人民的总动员。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扩大会议，向全国人民提出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军事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改良人民生活；抗日的教育政策；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抗日的民族团结”。为了贯彻这十大纲领，洛川会议还对人民军队的作战方针、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方针以及农村租佃政策等作了相应规定。洛川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和军事上做了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准备。

〔抗战初期正面抗敌〕抗战初期，日本进攻矛头直指南京政府，国民党正面战场是主战场。这时，国民党在军事上采取比较积极的态度，投入正面战场的兵力有182个师，46个旅，共计200多万人。广大官兵作战勇猛顽强，表现了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和牺牲精神。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1月，先后组织了淞沪会战、太原保卫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保卫战，并且取得了某些战斗和战役的胜利。特别是1938年4月

的台儿庄战役，取得了为世界所瞩目的胜利，对鼓舞全国抗战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从整体上看，正面战场呈现出节节败退的形势。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迁到陪都重庆，正面战场的大规模战事基本结束。

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初期就充分暴露出法西斯主义的本质。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以后，开始了持续六周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国军民30万人惨遭杀害，南京城内1/3房屋被焚毁。类似的事件在其它占领区也时有发生。

〔敌后战场的开辟〕1937年8月底到10月底，八路军主力陆续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敌前线。为配合太原保卫战，9月25日，115师在晋东北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板垣师团，歼敌1000余人，取得了抗战以来中国军队主动歼敌的第一个胜利。八路军首战告捷，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华北人民的抗敌决心。此后，八路军各师又在雁门关、土豆村、黄崖底、广阳等地取得了对日作战胜利，并且夜袭了日军阳明堡机场，有力地支持了正面战场的作战。

11月8日太原失守，国民党在华北的主要防线瓦解，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在华北已经结束。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八路军利用正面战场南移、敌后空虚的有利时机，分兵挺进敌后，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敌后根据地，形成敌后抗敌战场。

1937年10月，八路军115师留守部队在聂荣臻率领下进入五台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在粉碎日军多次围攻后，收复了晋北、冀西、察南50多个县，开辟了第一块敌后抗敌根据地。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在河北阜平县

成立。此后又逐渐开辟了平北、冀中、冀东一带的根据地。

1937年11月，129师进入晋东南地区，以太行山为依托开展游击战争，先后收复19座县城，于1938年春创立太行、太岳根据地。此间，129师和115师一部进入冀鲁豫平原，在边界地区打击日军，开辟了冀南、冀鲁边、冀鲁豫等根据地，后来统一发展为晋冀鲁豫根据地。

1937年冬，120师进入晋西北地区，同当地抗日组织结合，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春创立晋西北根据地。8月，李井泉支队挺进大青山，与当地蒙汉抗日武装配合，开辟大青山根据地。最后发展为晋绥根据地。

在山东，中国共产党自1937年末到1938年初先后领导了十多次抗日武装起义，相继开辟了胶东、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后来，罗荣桓率115师进入山东，创立了山东根据地。

在华中，新四军各支队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敌后根据地和皖南、皖中、皖东的广大游击区。

此外，在东北、华南，也相继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或游击区。陕甘宁苏维埃政府也于1937年9月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共辖23个县，林伯渠为主席，以延安为首府，是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核心。

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与共产党敌后战场互相配合，协同作战，形成了统一的中国战场，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使敌陷入中国人民长期的包围之中。这是相持阶段到来和坚持持久抗战的决定性因素。

三、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抗战方针

〔“亡国论”、“速胜论”的出现〕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都十分关注着两个问题：抗日战争能不能胜利？怎样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在各种回答中，有两种错误观点对全民抗战危害极大。其一，是汪精卫亲日派散布的“亡国论”。认为中国武器不如日本，抗战前说“战必败”，战争爆发后则说“再战必亡”。这种民族悲观主义情绪是民族投降的基础，动摇人民的抗日决心。其二，是国民党当权者提出的“速胜论”。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英美的援助上，认为日本侵略中国，必然引起英美与日本的矛盾，英美到一定时候会出兵，就可迅速结束战争。“速胜论”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定影响，认为依靠国民党数百万正规军可以迅速取得抗战胜利。“速胜论”的危害在于，使人民产生轻敌思想，不做充分的战争准备。

〔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战略方针〕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重要著作，对抗日战争的客观发展规律和我们应取的战略方针，从理论上进行了全面的科学的阐述。

第一，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以及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毛泽东认为，研究问题的全部根据在于中日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这就形成了敌我双方根本对立的四个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第一个特点决定日本会在中国横行一个时期，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历程，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而不能是速决战。其

它三个特点则决定日本必然由强到弱，逃脱不了最终失败的命运。

持久的抗日战争大体上要经历三个阶段：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其中最重要的是相持阶段。这是整个战争最困难的时期，然而也是战争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战略防御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相持阶段全民族的努力程度。战争的总趋势是：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不承认相持阶段，就是不承认持久战，实质上是主张速胜。

第二，深刻阐述了抗日战争必须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要把抗战胜利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必须发挥人民的力量。抗日用的政治动员，把广大人民组织起来，实行人民战争，才能坚持持久战，使敌人陷入灭顶之灾。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力量对比不仅是军事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心和人力的对比，唯武器论是错误的。

第三，具体规定了持久战的作战方针，阐述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抗战第一和第二阶段的战略方针应该是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作战。第三阶段是战略反攻。抗日战争的作战形式，就解决战争的命运来说，运动战是主要的。但在第一、第二阶段，游击战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抗日游击战争是大规模的、在外线独立作战，它在长期残酷的战争中将向正规战发展，所以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理论

纲领，对争取抗战胜利起到极大的动员和指导作用。《论持久战》一书则是一部光辉的政治著作、军作著作、哲学著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进行人民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四、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

〔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及其危害〕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是抗日战争初期党内的一场重要斗争。早在1937年11月，毛泽东就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共两党斗争的新情况，以及我们党内右倾情绪的滋长，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尖锐指出右倾倾向已成为当前的主要危险。他提出了在全国反对民族投降，在党内反对阶级投降的任务。

王明从苏联回国后，不仅完全反对这个报告，而且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在1937年12月和1938年3月召开的两次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全盘否定党的洛川会议制定的一整套正确的抗战路线，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

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核心问题是放弃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他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反对放手发动群众，依靠人民战争夺取人民抗日的胜利。主要表现是：（1）他否认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差别和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因而反对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他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就是要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2）他不相信人民的力量，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认为抗战的胜利必然是国民党的天下。因此，他反对党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

反对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敌占区和敌后农村。他主张集中我军去配合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由国民党“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3）王明还在组织上闹独立性，违反党的纪律，擅自用党的名义，发表与党中央不一致的错误宣言、决议和文章。

在王明主持长江局工作期间，积极推行其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对抗战初期党在国统区的工作，以及党在南方地区的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都起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反对王明新投降主义的斗争〕

1938年9月29日到11月6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由张闻天主持，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和结论。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

会议强调了党的独立自主原则，批判了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所谓独立自主原则，就是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不受国民党的限制，保持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提出和实行自己的政治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放手发动群众，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它实质上就是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毛泽东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主要的，但阶级斗争的存在也是一个事实。在抗日条件下，一切必须服从于抗日，阶级斗争必须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但是只有坚持独立自主，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才有利于合作，有利于抗日。他批评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指出，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

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与此相反，我们应该采取“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的策略，独立自主地发展革命力量。

会议肯定了党的洛川会议确定的独立自主地发展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再次阐明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批判了轻视游击战争的错误观点。会议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分别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以便发展自己和应付即将到来的相持阶段的斗争，使自己成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决定因素。会议要求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还重申了党的纪律，要求全党严格执行“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规定。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对党领导抗日战争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这对以后各项工作的开展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节 坚持全民族的团结抗战

一、相持阶段中坚持抗战反对分裂的斗争

〔日本侵华方针的调整〕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人力、物力、财力已大量消耗。中国抗日战场的扩大和战线的延长，使日军兵力和资源严重不足。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人民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根据地的建立，迫使日军停止战略进攻，转为战略保守。抗日战争进入毛泽东预示的战略相持阶段。

相持阶段到来后，日本对华方针作了较大调整。对蒋介石政府，日本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对占领区，日本大力培植汉奸政府，以达到以华治华的目的；对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则集中主要军事力量进行疯狂的“扫荡。”此时，敌后解放区已经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

同时，日本还极力策划国际阴谋，利用英、法、美等国既要集中力量应付德国法西斯，又想保住在东方利益的心理，以共同反对社会主义苏联为诱饵，企图通过英美压迫蒋介石投降。

〔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日本诱降政策加速国民党政府的分化，国内亲日派头子汪精卫首先开始行动。汪精卫当时任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委员会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早在抗战前，他就散布民族失败主义，组织“低调俱乐部”，声称“抗日必亡。”抗战爆发后，他派代表同日本秘密协商，签订《日华协议记录》。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同陈璧君（汪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周佛海（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国民政府副秘书长）、陶希圣（国民参政会议员）、曾仲鸣（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等人经昆明逃往河内。29日，汪精卫公开发表致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监委的“艳电，”表示接受日本政府提出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原则，投降日本。

全国人民愤怒声讨汪精卫的无耻行径。中共中央指示各级党组织发起讨汪运动，批判其卖国理论；各界爱国人士坚决要求对汪精卫绳之以国法；国民党中的抗日人士则要求对汪作出党纪处理。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出党，并撤销其一切职务。

〔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内的英美派集团在相持阶段到来后，把政策的重心由对外转向对内。这一时期，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也组织了一些局部抵抗，如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上高战役、桂南战役、枣宜会战等，取得一些胜利，大体上保住了西南、西北大后方，但多数战场上国民党依旧以失败告终。在这同时，蒋介石集团在反共问题上态度却越来越积极。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宣布，抗战到底的“底”就是恢复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同时制定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方针，并且设立“防共委员会”。会后，国民党中央党部秘密下发一系列反共文件。于是，各地发生了一系列摩擦事件。1939年末到1940年初，形成了大规模的反共高潮。

1939年12月，国民党胡宗南部勾结边区反动势力何绍南进攻陕甘宁边区，占领宁县、镇原、正宁、淳化四县，加上6月所占的洮县，共五座县城。他们还集结重兵，准备袭击延安。同月，阎锡山下令向山西新军发起进攻，摧残敌后抗日根据地。1940年初，蒋介石指令石友三、朱怀冰等向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发起进攻。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口号，在军事上采取自卫的方针。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八路军359旅从晋西北返回延安，协同留守兵团击退顽军进攻，解放绥德分区五个县，使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对于阎锡山，中央作了全面分析，认为他同蒋介石是有矛盾的，目前也不会公开

投敌，所以，一方面要制止他的进攻，一方面要争取他中立，留在统一战线中。据此方针，把斗争目标集中在反共最力的陈长捷、孙楚等顽固势力。新军在粉碎顽军进攻后，转移到晋东南和晋西北根据地，并入八路军序列。在太行山，八路军在说理无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反击，消灭朱怀冰主力，将石友三部赶至陇海路边。这样，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就被击退了。

二. 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国民党在政治上的进攻〕国民党在制造军事摩擦的同时，还雇佣了一批反动文人、汉奸分子对共产党发起“理论斗争。”张君勱发表《致毛泽东先生的公开信》，叫嚷“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要求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叶青则提出中国是三民主义的世界，共产主义应该离开中国。

1939年3月，国民党颁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鼓吹“国家至上”，推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主张，以强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

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既不满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又害怕人民革命力量过于发展，幻想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即使在中国共产党内和革命群众中，对于战后中国的前途也缺乏统一认识。

为了从理论上武装全党，为了回击国民党在政治上的进攻，毛泽东写了《新民主主义论》一文，深刻研究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内容〕 1939年前后，毛泽东写下了一系列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著作。其中有《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等。这些著作中，毛泽东比较完整地阐明了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第一，阐明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1919年以后的中国民主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它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1）时代特点，俄国十月革命后，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2）革命领导者不同，五四运动后，中国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有了自己的政党，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成了革命的领导者；第三，前途不同，旧民主主义革命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最终目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前途是走向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第二，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论证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步走。毛泽东指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把中国变成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是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两个阶段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是错误的，土地革命中王明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也是错误的。

第三，规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新民

主义的政治纲领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在中国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是：没收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民主共和国所有，使它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并不禁止私人资本的发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经济，同时允许富农经济存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是：发展共产主义思想指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文化。

在这些著作中，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进一步阐明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总结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这些著作表明，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

三.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

〔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策略方针的制定〕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一种“左”的倾向，认为国共破裂不可避免，统一战线难以维持，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只讲斗争，不讲团结。为了纠正这种错误倾向，维护共同抗战的大局，毛泽东在1940年4月和12月写下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等著作，系

统地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

毛泽东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在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必须采取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对国内不同阶级不同集团要加以区别，采取不同政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党的组织到全国，发展全国的民众运动，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这是我们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基本条件，也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保证。

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和地方实力派。中间势力有相当大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影响，是我们同顽固派斗争中可以决定胜负的因素之一。争取中间势力的三个基本条件是：我们有充足的力量；尊重他们的利益；对顽固派的斗争取得胜利。同时，对他们动摇的一面进行适当的说服、批评和斗争。

孤立顽固势力，就是孤立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一面主张抗日，一面摧残进步势力，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对其尚能抗日和联共的方面，采取联合的政策；对其动摇和反共的一面，则采取斗争和孤立的政策。对顽固派的斗争要讲究策略，以达到既不破裂统一战线、又能促进团结的目的。我们的原则是：自卫的原则，胜利的原则，休战的原则。即在同顽固派的斗争中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相持阶段到来后，中共中央针对日军把进攻重点转向解放区这一特点，制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使敌后根据地得到较大发展。华北的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根据地日益壮大，华中、华南也逐步建立起大面积根据地，山东根据地则成为联结八路军与新四军的枢纽。到1940年7月，党领导下的军队已发展到50万人，民兵200万，根据地总人口近一亿。在此基础上，1940年8月到12月，八路军调集100多个团的兵力，向敌人发起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作战，毙伤日军20000多人，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人民力量的壮大，却使蒋介石为首的顽固派忧心忡忡，他们要想办法限制人民武装。

1940年9月，国际形势也发生新的变化。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在柏林正式签订军事协定，英、美也签订了联防协定。日本急于压迫蒋介石投降，而英美为了让蒋介石牵制日本的力量，加强了对他的援助。这一切，使蒋介石自认为身价抬高，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共活动。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政府以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发表致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一个半月内移往河北，同时调集顾祝同的7个师8万余人，准备在新四军北移过程中进行围歼，由此发起第二次反共高潮。

中共中央立刻向全党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顽固派进攻的紧急指示，并在军事上做出相应部署。根据中央决定，朱、彭、叶、项于11月9日发表“佳电”，驳斥国民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诬蔑，拒绝国民党要八路军、新四军撤出华中的无理要求。为了顾全大局，同意将皖南新四军主力开往江北。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主力向江北转移，6日，在茂林地区遭到埋伏在这里的8万国民党军队的伏击，经七昼夜激战，新四军弹尽粮绝，除2000人突围外，其余6000人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被捕、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1月17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番号，将叶挺交军法审判。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进行猛烈反击。1月20日，中央军委宣布重建新四军，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22日又发表对新四军问题的谈话，揭露国民党的罪行。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在重庆也展开激烈斗争，对国民党表示极大的抗议。全国人民和国际舆论也对蒋介石发出愤怒的指责。

蒋介石为了摆脱极端孤立的困境，不得不做出退却的表示。3月6日他在国民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决不会再有反共的军事行动，在其它政治问题上也做了让步。中国共产党为维护抗日大局，表示愿意继续同国民党合作，只是希望它改变对内政策。至此，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政策，迫使国共两党以外的中间势力放弃对他的幻想，联合起来。皖南事变后不久，在中共南方局的帮助下，农工民主党、各界救国会、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国社党和青年党开始谋求联合。1941年10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外宣告成立，发表对时局的主张。这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影响扩大，国民党政治地位下降的一个重要反映。

第三节 克服困难 坚持抗战

一、解放区的严重困难和党为克服困难而采取的措施

〔解放区的严重困难〕 1941年和1942年，是敌后解放区战场最困难的时期。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法西斯势力猖獗一时。日本为实现“南进”计划，把中国变成“大东亚圣战”的基地，以主要兵力（1941年75%，1942年63%）向解放区发起进攻；在敌占区则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国民党顽固派也加紧反共活动，一方面在“曲线救国”的名义下指使大批高级将领投敌，充当伪军，进攻解放区；另一方面则加强对解放区的经济和军事封锁，停发八路军、新四军军饷。同时，华北解放区在1940年到1942年又连续三年遭受自然灾害，解放区的农作物产量下降1/3。

在日、伪、顽夹击和自然灾害的冲击下，解放区处于严重的困难之中。解放区面积缩小，人口由1亿下降到0.5亿，八路军由40万减少到30万，新四军由13.5万减少到11万，而财政经济的困难尤为突出。

〔克服困难的各项政策〕 为了克服困难，巩固解放区，坚持持久抗战，中国共产党制定并实施了十大政策：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减租减息、三三制。

第一，党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英勇的对敌斗争，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和民兵相结合，统一指挥、协同作战的方针，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清乡”、“蚕食”、“扫荡。”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华北解

放区军民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水上游击战”等多种作战形式，显示出人民战争的威力。人民战士则表现出可歌可泣的牺牲精神，狼牙山五壮士的动人事迹至今仍教育着我们的青年。

第二，在各解放区内部，加强政权建设，建立由共产党、党外进步人士、中间分子各占1/3的“三三制”民主政权；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减轻人民负担。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使处于困难之中的解放区显示出勃勃生机，体现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进步性。

第三，开展大生产运动。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走在前边，359旅在南泥湾开垦荒地，边战斗边生产的成就给解放区军民树立了榜样。1940年到1942年，边区开荒188万亩，产粮47万担，实现生产自给，减轻了人民负担。其它各解放区也在“劳动与武力”相结合的口号下，因地制宜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在克服经济困难、奠定抗战胜利物质基础的同时，密切了军民关系、干群关系，树立了自立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锻炼了干部，积累了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

二、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无论从党的历史看，还是从党的现状看，中国共产党都有必要进行一次全党的整风运动。遵义会议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久经锻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路线是正确的，工作也有很大成绩。但是，

对于党的历史上所犯的右倾和“左”倾错误，还未从思想上进行清算，特别是王明的主观主义的思想错误，在党内还有一定市场。另外，抗战爆发以来，党吸收了大批新成员，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他们革命热情很高，但是缺乏理论，容易受教条主义蒙蔽，这是王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盛行的基础。因此，在党内开展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进行一次大规模整风是完全必要的。

这时中国共产党也具备了进行整风运动的条件。首先，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已在党内占居领导地位，他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已做出理论性的总结；第二，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系统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为整风运动做好了思想理论准备；第三，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解放区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正是整风的有利时机。

〔整风运动的内容与方针〕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高级干部开始整风。1942年到1943年，全党整风进入高潮。到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整风运动结束。

延安整风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以反对主观主义为中心。

学风问题，党内存在两种根本对立的态度，正确的态度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另一种态度是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的主观主义，表现为经验主义和教

条主义，是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源。要打倒主观主义，就是要从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出发，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践方面发展，有实践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避免片面性。为了克服主观主义，中央向全党发出了调查研究的号召。

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问题上的反映，表现为本位主义、分散主义、个人主义等，由于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和小资产阶级特别广大，突出表现为山头主义，严重妨碍党的团结和统一。为克服宗派主义，必须树立立党为公的思想，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

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腐朽文风。毛泽东号召用生动活泼的、新鲜有力的、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风取代党八股。

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党内矛盾大部分是认识问题，即使是路线是非，也属于革命同志在如何革命等题上的原则争论，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来解决。

〔整风运动的意义〕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革命运动，也是打破教条主义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使全党干部掌握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个基本方向，树立和发扬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使全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空前团结，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整风运动对于正确解决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是一次成功

的实践，它提供了从思想和世界观方面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宝贵经验，创造性地解决了处理党内矛盾、进行党内教育的良好形式，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

等四节 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一、解放区的恢复和发展 国统区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涨

〔1943年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1943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后，转入反攻，到1944年肃清全部在苏联国土上的德军，并把战争推向德国本土。1943年7月意大利政变，墨索里尼下台，9月，意大利投降。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在1943年2月瓜达尔卡纳尔争夺战中取得胜利，日军丧失所有可以使用的海陆空机动兵力，太平洋战争出现转折点。

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作战失利情况下，做最后的挣扎，为弥补其已经丧失的海上交通，解救太平洋战场的颓势，集中兵力打通大陆交通线，于1944年4月至1945年2月，先后投入四、五十万兵力，发起豫湘桂战役。经过10个月战斗，国民党军队丧失了河南、湖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20万平方公里土地，146座城市，6000万同胞沦于日寇铁蹄之下。日本虽然打通了大陆交通线，却未能挽回失败的命运。以当时在华日军的兵力，分布在如此广大的战线上，在战略上处于极大的被动地位，有利于中国军民的反攻。

〔解放区的恢复和发展〕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解放区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1943年，日军继续对解放区进行“扫荡”，我军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深

入到敌后之敌后开辟根据地。我军作战形式也从游击战转变为运动战。1944年，各解放区先后开始局部反攻，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敌后战场上消灭了大量敌人，收复大片国土，发展了抗日武装，取得巨大胜利。到1945年4月，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的主力已发展到91万，民兵200多万，建立了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冀热辽、晋绥、山东、苏北、苏中、淮北、淮南、河南、皖中、苏浙皖、浙东、湘鄂、鄂豫皖、东江、琼崖等18块抗日根据地，加上陕甘宁边区，共有19个解放区。解放区面积达95万平方公里，拥有人口9950万，解放区的发展和壮大，使日军占领的大多数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都处在人民军队的包围之中，为全面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国民党统治的腐败〕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解放区日益壮大的同时，国民党统治区却更加黑暗和腐败，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陷入严重危机。

在政治上，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特务统治和保甲制度相结合的法西斯统治。为了加强一党专政，国民党提出“全国党化”的口号，到处出现“集体入党”、“举手入党”的怪现象。蒋介石本人权力更加集中，一人独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长等重要职务，甚至一度兼任行政院院长。为了维护一党专政，蒋介石加强特务统治，由他直接控制的中央调查统计局（“中统”）、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两大特务机关的势力遍布全国各地。到1943年，又特请美国特工人员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训练特务。特务活动的矛头直接指向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在农村，国民党则加强保甲制度，区乡长、保甲长都

成了国民党员，他们以国民党为后盾，欺压百姓，鱼肉乡里。

在经济上，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陈立夫、陈果夫为首的官僚垄断资本大发国难财。他们垄断了中国最大的金融机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成立四行联合办事总处，蒋介石自任理事会主席，凭借它发行货币的权力掠夺人民。四大家族一手包办国内外贸易，对主要农产品出口实行统购统销，对主要日用品实行专卖制，对主要工业品、矿产品实行管制，从而操纵国计民生，打击和压迫民族工商业。在农村，四大家族则通过官价粮食征购、田赋征买、粮食征借的政策，剥夺农民一半左右的收获。四大家族的疯狂掠夺，使工厂倒闭，农民破产，通货膨胀，商业萧条，广大人民则挣扎在死亡线上。四大家族带头搜刮人民，使国民党各级官员纷纷效法，贪污之风大盛，社会风气败坏。

在军事上，国民党长期的避战、观战政策造成军队人数减少，战斗力下降，当反法西斯战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时，中国军队无力组织象样的大反攻。

〔国统区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涨〕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在政治上的独裁和经济上的掠夺忍无可忍，以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国国民党军事失败为契机，国统区掀起广泛的民主爱国运动。

1944年5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批评国民党排斥异己，拖延“训政”，拒绝民主。6月，国民党内的民主派李济深、柳亚子等成立“抗战动员宣传工作委员会”，在桂林从事民主活动。著名民主人士张澜在成都成立“民主宪政促进会，”西南联大进步师生以昆明为中心开展民主运动。同时，反对国民党横征暴敛的农民暴

动，反对特务暴行的工人和市民运动，反对国民党民族压迫政策的民族起义，反对国民党官僚垄断政策的工商界请愿活动，此起彼伏，互相呼应，形成一股强大的民主浪潮。事实证明，中国人民再也无法忍受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为了给全国人民指明方向，把国统区人民民主运动推向高潮，在1944年9月15日召开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中共代表林伯渠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一主张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愿望，得到各阶层人民的热烈响应。国民党进步人士、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纷纷集会表示拥护。但是，蒋介石拒绝了共产党的正确主张。

1944年9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私人代表赫尔利来华，调处国共关系。11月，赫尔利在延安表示，赞成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但是他回到重庆后，却违背自己的诺言，继续支持蒋介石的一党专政，并且妄图以“公允”的姿态同时整编国共两党军队，直接干预中国内部事务。中国共产党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种无理要求。美国放弃公允的假面具，公开宣称支持蒋介石以武力统一中国，实行扶蒋反共政策。

二、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七大的主要内容和贡献**〕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中国又一次面临两个命运决战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全国121万共产党员。

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报

告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抓住了时局的关键，郑重地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基本要求。报告论述了中国抗战中共两党不同的抗战路线和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般纲领及当前的具体纲领，深刻总结了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报告确定了党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报告论述了加强党的建设以实现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的基本原则。报告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朱德同志做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这个报告对中国八年的抗战经验、特别是解放区抗战的经验做了深刻总结，指出，解放区战场的胜利是由于采取了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的军事路线，正面战场的失利是由于采取了消极防御、专靠外援的反人民的军事路线。报告最后要求我军做好大反攻的战略准备。

刘少奇同志做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新党章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24年的历史经验，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明确提出群众路线是党的基本路线；强调建全党的民主集中制。

大会经过充分酝酿和民主讨论，选举出44名中央委员和33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在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七大的历史意义】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中国共产党24年的历史经验，为党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了党的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及其历史意义

〔**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共七大以后，各解放区发动大规模夏季攻势，给敌伪以重创，收复大片国土，迫使侵略者龟缩到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沿线。同时，各解放区积极扩军练兵，游击队由分散到集中，上升为正规兵团，为全面反攻做好准备。

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6月，美军攻占冲绳岛，战争推进到日本国土。7月，中、美、苏三国发布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向日本的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8日，苏联对日宣战，150万苏军分三路进入中国东北，歼灭关东军主力。

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代表党中央，号召各解放区军民立即举行对日大反攻。10日和11日，朱德总司令接连发出七道向敌人展开进攻的命令。在党的号召下，各解放区军民立刻展开全面反击，从8月到10月的两个月中，毙伤敌军23万多人，收复城市197座，解放国土31万多平方公里，人口1800余万。

在中国人民和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打击下，日本军国主义土崩瓦解，于8月15日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正

式签订无条件投降书，中国人民历时8年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抗日战争胜利的重大意义〕抗日战争是一场规模空前、代价巨大的战争。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中国各阶级、各阶层、各民族，乃至海外华侨，都被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号召起来，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其动员之广泛，热忱之高涨，形式之多样，都为历史上所罕见。为了民族的解放，中国人民献出了2100万优秀儿女的生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的财产损失达600多亿美元，蒙受重大的经济灾难。中华民族以其坚韧的毅力证明，她可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对中国发起侵略战争，每次均以中国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告终。只有抗日战争是以中华民族的胜利载入史册的。

抗日战争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开辟的最早，坚持的时间最长，并且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中国人民抗击和牵制了日本的主要兵力，打乱了日本侵略者的战略部署，使它无法实现“北进”计划，也推迟了它的“南进”计划，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经验〕第一，为了战胜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中日民族矛盾这个主要矛盾，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民族抗战，以打击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第二，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必须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坚持持久战，执行基本上是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作战原则，不断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从而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后举行战略反攻，打败强大敌人。

第三，加强共产党自身建设，保持党内思想的统一和组织的巩固，是实现党对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的前提条件。在党的建设方面，要着重加强思想建设，不断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

第四，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的团结奋斗，但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和援助也是十分重要的。联合世界上一切反对侵略的国家和人民，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孤立和反对主要敌人，是民族战争取得胜利的外部条件。

思考题

- 1、如何继承和发扬抗日军民的爱国传统？
- 2、怎样正确认识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 3、怎样正确认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
- 4、如何理解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

阅读书目

毛泽东：《论持久战》

《新民主主义论》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学习和时局》
《论联合政府》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

第五章 全国解放战争

第一节 党领导人民为争取 和平民主而斗争

一、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

〔抗战胜利后国际形势的特点〕 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标志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战前六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中，德、意、日被打败，英、法被削弱，帝国主义阵营力量下降。社会主义苏联经受住战争的严峻考验，国际地位迅速提高。亚洲和欧洲相继出现一些人民民主国家，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同时，亚、非、拉美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国家内的人民革命斗争，以及全世界人民反对战争的和平运动，也在日益发展。这一切，都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因为国土远离战场、参战较晚而损失较少，又因军火生意发了财，成为战后国际反动势力的中心。这时在国际斗争的格局中，美苏成了主要对手。美国要取代日本，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使蒋介石成为它控制中国的工具，因此，公开推行“扶蒋反共”政策。而此时苏联对华政策的特点，是以国民党政府为对象。这限制了它对中国革命的支持。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中国人民的革命。

〔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的特点和各党派的政治主张〕 战后国内形势同样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

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空前壮大。共产党员已发展到120万，党领导下的正规军发展到120万，民兵220万，十九个解放区的人口达一亿多。中国人民饱受战争离乱之苦，坚决反对内战，迫切要求和平。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抗战胜利后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并把“民主联合政府”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国内民主党派也很活跃。中国民主同盟积极开展活动，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要求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同时，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相继成立，代表社会不同阶层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以民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迅速成为国内争取和平民主的重要力量。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顽固坚持独裁、内战、卖国的政策，抢夺人民的抗战果实。日本一投降，他就下令禁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接受敌伪投降，要求日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等待他把龟缩在西南后方的部队调到前线去受降。同时，以蒋、宋、孔、陈为首的官僚资本利用“接收”的名义，对日伪占领区的财富进行空前的吞并掠夺，使官僚资本的发展达到顶峰。为了维持自己的利益，蒋介石集团必然坚持独裁统治，对外推行民族投降主义。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的存在，是蒋介石独裁卖国的最大障碍。因此，蒋介石必然企图发动内战，消灭人民力量。

由此可见，抗日胜利后，中国人民同美蒋反动派的矛

盾，已经取代中日民族矛盾而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个矛盾集中表现为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当时斗争的焦点，就是争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的方针〕 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方针已定，却突然在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他去重庆谈判。这种不同寻常的姿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第一，全国人民强烈的和平愿望，迫使蒋介石不敢贸然发动内战；第二，英、美、苏在战后国际斗争中都有许多棘手问题，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美国通过各种手段帮助蒋介石与苏联政府接近，通过一些政治让步，迫使共产党交出武装；第三，八年抗战中，蒋介石的部队大部分集结在西南，来不及运到华北、华东、华中等广大地区；第四，蒋介石估计毛泽东不会来重庆，这样就可以把内战的责任推到中国共产党头上，毛泽东若来重庆，他还可以用政治手段压迫共产党让步，同时准备内战。蒋介石是用一边准备内战、一边高喊和平的反革命两手夺取斗争的主动权。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什么呢？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了《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方针。第一，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战后国内外的形势特点，又从历史的角度剖析了蒋介石的阶级本性，认为内战、独裁、卖国的三位一体是蒋介石的基本点，他要打内战的方针、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方针，都是定了的，内战的威胁严重存在。第二，由于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存在，有可能把内

战暂时限制在局部范围，或者推迟全面内战的爆发。第三，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一方面尽量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使内战限制在局部范围或推迟爆发时间；另一方面必须对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做好充分准备，用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毛泽东的报告在从抗日战争向国内革命战争转变的复杂历史环境中，为全党指明了方向，使全党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警惕，为战后初期的斗争做好了思想上、政治上的准备。

二、争取和平民主的重大斗争

〔重庆谈判〕 1945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决定毛泽东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首先，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顺应人民的和平愿望，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争取国内和平的机会。其次，蒋介石内战准备不足，我们有可能利用谈判推迟内战的爆发，这对人民也是有益的；而且，蒋介石若坚持内战，他的和谈骗局自然就会破产。

1945年8月28日，中国共产党代表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特使赫尔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陪同下，由延安飞抵重庆，受到各界人士普遍欢迎。中国人民看到一线和平希望，无不欢欣鼓舞。29日，谈判正式开始。除了蒋介石与毛泽东的会晤外，谈判主要是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整个谈判历时43天，到10月10日双方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协定》）。

由于国民党顽固坚持“一党专政”的反动立场，坚持把

军令、政令的统一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拒不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合法地位，谈判在许多问题上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国民党不得不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与民主的基本要求。《双十协定》决定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同意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实行长期合作；同意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为达到和平建国的必由途径；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国民党还承认了党派平等合法的原则，保证人民享有各种民主权利。

重庆谈判的历史意义在于，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和平的诚意，教育了广大中间人士和全国人民，使中国共产党在战后的斗争中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国民党则陷入被动，它被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中国人民得到一个很好的斗争机会。国民党被迫承认和平建国的方针，它再发动内战，就在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

〔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共38人，包括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7人，以孙科为首的国民党代表8人，民盟代表张澜等9人，青年党代表曾琦等5人，无党派社会贤达郭沫若、王云五等9人。代表成分复杂，意见纷呈，会上斗争激烈。中国共产党主张，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国民党则坚持其一党专政的卖国独裁统治。民盟和无党派人士则幻想通过改良道路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会上争论的焦点仍旧是军队和政权问题。国民党及其追随者提出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妄图以欺骗手段使共产党交出人民的武装。中间党派对此抱有幻想，甚至提出以中

间党派代表国家，接受国共双方交出的部队。中国共产党则坚持把国家民主化作为军队国家化的前提。在政权问题上，国民党提出要扩大政府，吸收其它党派成员到政府中去作官，共产党要交出解放区。中国共产党则要求召开真正的国民大会，制定民主宪法，成立各党派平等的民主联合政府。

政治协商会议在1月31日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国民大会、和平建国纲领、宪法草案、军事问题等项协议案。这些协议虽然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还有一定距离，但却贯彻了和平民主原则，否定了国民党内战、独裁的政策，对人民是有利的，对国民党是不利的。政协决议的通过，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它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获得主动权，而美蒋的和谈阴谋再次受挫。

〔停战协定〕在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进行期间，蒋介石已经开始部署内战，向解放区进攻。中国共产党人为维持国内和平，多次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停战谈判。美帝国主义为了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做出一副公允的姿态，对中国内战进行“调停”。1946年1月5日，国共两党达成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并商定由国民党代表张群（后为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会商解决军事冲突有关事项。1月10日正式签订停战协定。后来，在北平成立由国民党代表郑介民、共产党代表叶剑英、美国政府代表罗伯逊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监督停战协定的实施。

1946年3月，中国共产党又同国民党就东北停战问题进行谈判，于27日签订东北停战协定。

中国共产党严格遵守停战协定的各项规定，得到了全人

民的信任，而国民党反动派则在“谈判”，“停战”的掩护下不断向解放区进攻，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了假和平、真内战的本质。

三、解放区军民加紧自卫战争的准备

〔用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对解放区的进攻〕 1945年8月，在毛泽东到达重庆进行谈判的第二天，蒋介石即下令大量印发1933年编印的《剿匪手本》。并且命令部队向华北各解放区进攻。中国共产党一面坚持谈判用和平手段解决国内矛盾，一面用自卫战争回击蒋介石军队的进攻。9月到11月初，解放区军民分别组织了上党战役，绥远战役，邯郸战役，粉碎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保卫了解放区。

同时，我党坚决执行《双十协定》的有关规定，将分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除外）等八省的主力部队撤往苏北、皖北解放区，集中整编。

〔“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 1945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的指示，提出争夺东北的战略任务。东北地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又背靠苏联，是我党长期坚持武装斗争的理想根据地。抗战胜利后，苏联红军实际控制东北，美军无法进入，蒋介石在那里更无一兵一卒，这是我党控制东北的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国民党这时也注意到东北的战略地位，在美国帮助下加紧向东北运兵。这使争夺东北的斗争更具紧迫性。

为了加强对东北地区工作的领导，1945年9月15日，中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同时，两万干部、10万大军，挺进东北，占领广大农村地区，挫败了国民党抢占东北的计划。12月28日，中央做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明确指出，党在东北的任务，是在距离中心城市较远的广大农村建立根据地，工作重心是认真发动群众，搞好清算汉奸、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建立政权、扩大军队等工作。东北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对于后来解放全东北，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发生了全局性的深远影响。

〔解放区的练兵、减租和生产运动〕关于练兵，中共中央指示，无论是野战军、地方军、还是民兵，都要利用战斗空隙搞好练兵。除训练军事技术外，还要加强军队政治工作，提高政治素质和作战能力。

关于减租，主要在新解放区进行，对抗战中已进行过减租的老解放区只进行复查。减租由农民自己组织成农会进行，减租斗争同农民的组织、发动工作同时进行，使自卫战争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关于生产，中央要求，多打粮食，增加日用必需品。除工人和农民外，各部队、机关、学校在不妨碍打仗、工作和学习的情况下，都要积极参加生产。生产运动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部队给养有了保障，为自卫战争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准备。

第二节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一、全面内战的爆发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

〔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蒋介石

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撕毁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挑起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内战。

内战爆发时，国共两党力量对比非常悬殊。国民党拥有430万正规军，统治着3亿以上人口的地区，控制全国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接收了100万侵华日军的全部装备，又有美国在军事和财政上的大量援助。而中国共产党的120万部队，主要分布在各个农村根据地，武器装备也比较落后，不仅没有空军和海军，就是陆军也以步兵为主。解放区有一亿人口，但是土改还没有完成，后方还不巩固。而且没有任何外援。

这样的力量对比，使蒋介石错误地估计了形势。6月26日，他以30万部队进攻中原解放区；7月开始，又分别向苏皖、山东、晋冀鲁豫、晋绥、陕甘宁、东北等解放区发起大规模进攻，目的在于迅速摧毁解放区政权，消灭人民武装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方针〕1946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发生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进攻》的指示，指出：战争性质、人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国民党军队虽然占优势，又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解放区的自卫战争，虽然暂时处于劣势，亦无外援，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而不但必须而且能够打败蒋介石。8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进步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针对国内外一些人的悲观失望，提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指出：反动派总有一天会失败，因为他们代表反动；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因为我们代表进步。毛泽东的论断，使解放区

军民树立起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正确思想，坚定了打败美蒋反动派的信心。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敌强我弱的军事形势，9月到10月间，中共中央又发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三个月总结》等文件，制定了粉碎蒋军进攻的政治方针和军事方针。

我们的政治方针是：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一个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在农村，要坚定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紧紧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减少敌对分子，使解放区更加巩固；在城市，除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小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分子外，还应争取一切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在国民党军队中，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

我们的军事方针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力求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

二、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

〔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1946年7月到1947年2月，国民党军队向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战火燃遍大半个中国。解放区军民执行中央制定的军事原则，开展大规模运动战，歼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

中原解放军于6月底分路突围，主力在李先念等率领下横越鄂豫陕甘四省，在陕南鄂西创立新根据地，其中一部回到陕甘宁边区。一路进入武当山地区。一路进入苏皖解放区。蒋

介石围歼中原解放军的阴谋宣告破产。

华中解放军在严裕、谭震林指挥下，集中优势兵力，从7月13日到8月27日，在泰兴、如皋、海安、邵伯一带连续作战，七战七捷，歼灭汤恩伯7个旅5.6万余人。接着，又先后在苏北、鲁南、莱芜等地歼敌3万余人。

8月10日，晋冀鲁豫解放军在刘伯承、邓小平等指挥下分路向开封至徐州之间的陇海铁路一线的蒋军出击，歼敌1.6万余人。9月初又组织定陶战役，歼敌1.7万余人。

在其它战场上，人民解放军也不断取得自卫战争的胜利。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大量消耗，战线拉长，兵力不敷分配，在1946年10月占领张家口以后，进攻势头锐减。

1946年12月，华东野战军发起宿北战役，歼敌三个整旅共2.4万人。1947年1月，又发起鲁南战役，共歼敌5.2万余人。2月，华东野战军组织莱芜战役，歼敌6.2万余人。同时，晋绥和太岳解放军发起晋西南战役，粉碎胡宗南偷渡黄河进攻陕甘宁的阴谋，歼敌2.2万余人；晋察冀解放军出击平汉线歼敌近10万；东北解放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扭转了东北战局。

经过8个月艰苦作战，人民解放军共作战160余次，消灭蒋军71万余，蒋介石的全面进攻被迫停止。

〔粉碎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1947年3月，蒋介石的机动兵力由117个旅下降为85个旅，已无力进行全面进攻，只好把进攻重点放在陕北和山东。在陕北，蒋介石调集32个旅共23万人，在胡宗南指挥下，妄图一举夺取延安，当时留守陕甘宁的部队只有2.5万。3月19日，中共中央主力撤离延安。26日，中央在清涧县枣林沟村决定，成立前敌委员

会和工作委员会，由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前委，代表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另外两位书记刘少奇和朱德率领工委，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其它工作。此后，西北野战军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利用边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广大等有利条件，采取蘑菇战术，接连发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战斗，变被动为主动。此后，又在陇东、榆林、沙家店等地歼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

在山东，蒋介石于1947年3月底调集60个旅约45万人，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逼迫山东解放军在沂蒙山区与其决战，或撤往黄河以北。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谭震林指挥下，在孟良崮地区与蒋军举行决战，一举歼灭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王牌师——第74师，共2.3万多人。国民党进攻鲁中的部队全线溃败，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遂告失败。

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歼灭国民党军队共112万，迫使国民党军队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而自己则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1947年7月，国民党军队总兵力已由430万下降到370万，机动兵力减少，后方空虚，战斗力下降，充满失败主义情绪。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则由120万上升为195万，后方巩固，士气高昂，充满必胜信心。举行战略反攻的条件已经成熟。

7月到9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以敌人兵力薄弱的中原地区作为突击方向，将主力打到外线去，把战争引向国统区。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解放军

主力12万人渡过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我军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7日，刘邓大军到达中原，建立起大别山根据地。8月22日晚，陈赓、谢富治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部队在晋南渡过黄河，进入豫西，在鄂豫陕边展开攻势，创建根据地。9月26日，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主力，进入豫皖苏地区。三支大军在中原地区形成“品”字形阵势，完成战略展开。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亡的转折点，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亡的转折点。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公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号召全国人民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为彻底埋葬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而斗争。

三、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

〔国民党统治的全面危机〕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一年中，不仅在军事上遭到失败，而且在经济和政治上也陷入全面危机。

国统区的经济危机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第一，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经济上的垄断和掠夺，对民族工商业构成严重威胁，也使人民生活日益贫困；第二，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使民族资本无法立足，人民血汗被吮吸殆尽；第三，蒋介石政府的内战政策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造成巨额财政赤字；第四，大规模内战，直接破坏工农业生产，使人民流离失所，无以为生。

经济危机的具体表现，首先是物价飞涨；其次是工商业倒闭；其三是农村经济面临破产；最后是劳苦大众挣扎在死亡线上。经济危机把社会各阶层人民推到死亡的绝路上，迫使他们团结起来为生存而斗争。

政治危机集中表现在蒋介石政治欺骗的破产。1946年11月，国民党政府违背政协决议，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遭到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联合抵制。12月25日，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各民主党派联合否认。1947年4月，蒋介石又演出“改组政府”的闹剧，拉拢一些政客参加政府，组成所谓“多党政府”，使他在政治上进一步孤立。

为了摆脱困境，国民党政府加强恐怖统治。1947年7月颁布“戡乱动员令”，剥夺人民一切民主权利，8月又公布《后方共产党处理办法》，迫害广大进步人士，列入国民党特务黑名单的民主人士达6万多人。10月27日，国民党内政部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强令解散。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国民党于1948年3月到5月召开“行宪国大”，给蒋介石戴上了“总统”的桂冠。至此，蒋介石的政治欺骗彻底破产。

〔国统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国民党政府推行的内战卖国独裁政策，国民党统治的全面危机，激起了国统区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抗，形成了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潮。

1946年11月到12月，上海人民为反对国民党当局取缔摊贩的命令开展英勇斗争，迫使当局收回这个命令，并且撤销了黄浦区警察局局长的职务。

1946年12月，北平学生为抗议美军强奸中国女学生的暴行举行大规模游行，得到上海、天津、南京等几十座大中城

市、50多万学生的响应，形成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又一个高潮。

1947年5月，全国各大城市学校为纪念五四运动又一次掀起学生运动高潮，明确提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5月20日，京沪苏杭地区6000名学生的大游行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镇压，酿成“五二〇惨案”，长沙、重庆、昆明、开封、洛阳、南昌、桂林、沈阳等地学生纷纷罢课，对政府表示抗议，其它各界也对学生爱国运动表示声援。

学生运动促进整个民主运动的发展。在城市，1947年参加反美反蒋示威游行的工人达到120万人，1946年到1947年，全国50多个城市发生抢米风潮。在农村，抗捐、抗税、抗租的群众运动扩大到17个省，人数达100万。1947年2月，台湾人民举行“二、二八”起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

国统区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爱国华侨、其它爱国分子，都积极投入了反蒋爱国斗争。毛泽东同志对国统区内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包括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爱国民主运动给予极高评价，称之为军事战线之外的“第二条战线。”

〔民主党派觉醒〕抗战胜利后，民主党派成为中国民主运动中的重要力量。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他们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后来又联合抵制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他们的目的是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国民党政府对民盟的活动恨之入骨。1946年7月，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闻一多。

全面内战爆发后，民主党派中的许多人，加紧宣传中间路线，要求使中国走上第三条道路。他们的政治主张是：在社

会政治制度上，建立一个介乎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制度，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也不赞成共产党的人民民主；在方法上是和平的，改良的，反对暴力革命，企图以和平手段改造国民党政府；在经济制度上，他们反对中国殖民地化，反对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垄断，也不赞成社会主义，而主张尽量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优点，充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他们不赞成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主张用一个对各阶级都适用的办法，和平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

国民党政府并没有因为他们主张用和平手段改造中国而放弃对他们的迫害。国民党宣称反内战就是反政府，反政府就要用惩治中共的办法处治。1947年9月27日，蒋介石亲自召集特务头子在南京集会，布置对民主人士的迫害。10月，仅上海、北平、杭州、西安等28座城市就有2100人被杀害，而且大批逮捕民盟、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会等民主党派成员。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宣布，民盟“勾结共党，参加叛乱，”为非法团体，下令取缔民盟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11月6日，民盟总部被迫宣告解散。其它民主党派也被迫停止活动。

革命形势的发展，“中间道路”的破产，促使广大爱国人士重新考虑中国的出路，开始新的结合。1948年1月，国民党内的反蒋派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同月，民盟总部在香港重建；其它民主党派也逐渐恢复活动。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5日，各民主党派

和爱国人士联名通电，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号召。8月，他们陆续进入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同筹备政协。

四、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十二月会议

〔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土地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因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深厚的基础。土地革命也是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因为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是军队的主要来源。要获得贫苦农民的拥护，就必须彻底改革土地制度，使他们成为土地的主人。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把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抗战胜利后，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农民阶级迫切需要土地，在解放区，广大农民自发地起来夺取地主土地。为了适应广大农民的需要，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把减租减息的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各解放区根据中央指示进行土地改革，到1947年2月，大约2/3的地区完成了土改。

1947年7月到9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的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总结土地革命经验，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第一，《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半封建性的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农会接收，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第二，《大纲》规定，征收富农的多余土地和财产分配给农民，以更大限度地满足农民的土地要

求。第三，《大纲》规定，乡村中一切土地均按人口平均分配，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第四，《大纲》规定，土改中的一切权利归农民群众，让广大农民自己解放自己。

全国土地会议以后，各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土改工作团（队），深入农村宣传《土地法大纲》，发动群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改斗争。到1948年底，老区半老区的土改基本完成，1.6亿人口的地区约1亿农民获得土地。同时，各解放区的党组织也在1947年秋开始进行整党活动。整党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主要内容（简称“三查三整”，提高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素质，推动了土改运动。

土地改革运动的胜利，加强了工农联盟，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广大农民为了保卫翻身果实，积极支援解放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仅东北解放区就有160万翻身农民参加解放军。留在农村的广大劳动力也加紧生产，积极支前。翻身农民的积极拥护，是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在土改和整党运动中，一度发生过“左”倾错误。主要是错划阶级成分，侵犯中农和中小工商业者的利益，个别地方出现乱杀现象。中央及时发现了这些题问。从1947年冬到1948年春发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明确规定，必须避免对中农及中小工商业者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区别对待大中小地主，区别对待地主富农中的恶霸与非恶霸；坚持少杀，严禁乱杀；在不同地区实施不同政策。这些指示的贯彻，使“左”倾错误得到纠正。

〔十二月会议〕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战争形势迅速发展。为了夺取全国胜利，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十二月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制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行动纲领和政策。

在军事方面，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系统阐明了解放军作战的指导思想、作战目的、作战方法、作战形式以及战斗作风等问题，其核心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是解放军长期作战的经验总结，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在经济方面，规定了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没收封建地主的土地归广大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指出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总目标：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在政治方面，指出现阶段中国共产党最基本的政治纲领是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它爱国分子，组成民主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没有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十二月会议在思想上、政治上和政策上为夺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做了充分准备。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

一、战略决战

〔决战时机的成熟〕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后，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防御”和“分区防御”，共歼敌152万。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后，敌我力量对比及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已增加到280万人，武器装备也得到极大改善，建立了炮兵、工兵，大大提高了攻坚作战的能力。解放区面积已发展到占全国总面积的1/4，人口占1/3以上。经过土地改革，广大群众革命热情高涨，生产得到迅速发展，解放区日益巩固。这一切，使解放战争的进行有了军队和后方两方面的保证。

国民党军队的状况却刚好相反。1948年秋国民党军队已减少到365万人，用于第一线的只有174万，而且士气低落，军心动摇，战斗力也在下降。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加上国统区人民的民主运动，使后方非常不巩固。蒋介石在1948年8月召开的军事会议上，确定了“撤退东北、巩固华北、确保华中，经营华南”的方针，改“分区防御”为“重点防御。”国民党的五个战略集团，分别被牵制在五个战场上。东北卫立煌集团55万人，分布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华北傅作义集团50万人，困守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山海关等地。华东刘峙集团70万人，聚集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区。华中白崇禧集团75万人，以武汉为中心准备负隅顽抗。西北胡宗南集团25万人，据守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对于撤退东北的具体部署，国民党举棋不定，处于被动挨打

的局面。

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要求各野战军树立敢于夺取敌人坚固设防的战略要点、敢于打大规模歼灭战的决心，抓住战机，同蒋家王朝进行最后决战。1948年9月16日到24日，华东野战军发动济南战役，激战八昼夜，攻克城防坚固的济南，歼敌10万余，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此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因势利导，先后组织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

〔辽沈战役〕这是战略决战的第一个战役。全国五大战场中，只有东北战场我军兵力超过蒋军。先打东北，又可粉碎蒋介石战略收缩的企图，使东北解放军入关作战。东北又是重工业基地，对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有重要作用。同时，东北地区土改已完成，后方巩固。总之，首战东北既有重要战略意义，又有取胜把握。

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是先打锦州，将蒋军封闭在东北，歼灭锦州之敌的同时准备消灭由沈阳、长春来援之敌。9月11日，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线，10月1日包围锦州，14日发起总攻，激战31小时，攻克锦州，全歼守敌10余万。17日，在人民解放军威慑下，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19日，驻守长春的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率部投降，长春解放。26日至28日，东北野战军在黑山、打虎山一带歼灭由沈援锦之廖耀湘兵团，并乘胜于11月2日解放沈阳和营口。至此，辽沈战役胜利结束。辽沈战役共歼敌47万余人，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国民党下降为290万人，解放军增加到300余万，加速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

〔淮海战役〕 1948年10月中旬，中央军委开始部署淮海战役。参加这一战役的部队有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军区、中原军区及晋冀鲁豫军区地方部队，共约60余万。国民党刘峙兵团70万人重点集结于徐州附近，企图以密集防御阻止我军南下，守住中原，屏障南京。

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是，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集团，完成中间突破，吸引徐州之敌前来增援，在运动中各个歼灭。11月6日，华东野战军在碾庄地区全歼黄兵团。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率部在台儿庄地区起义。11月23日到12月25日，中原野战军在双堆集全歼前来增援的黄维兵团。1949年1月6日至10日，我军在永城东北的青龙集、陈官庄全歼杜聿明集团。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歼敌55万，解放了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完成了歼灭敌人主力于长江以北的战略意图，使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完全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炮火之下。

〔平津战役〕 辽沈战役的胜利和淮海战役的进行，使聚集在平津地区的傅作义集团成了惊弓之鸟，在西窜绥远和海运南逃上举棋不定。为就地全歼敌军，中央军委急令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与华北野战军配合发起平津战役。

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是“围而不打”、“隔而不围”，把华北敌军分别包围在几个主要城市，切断退路、逃路和相互联系，然后先打两头后取中间，各个歼灭。1948年12月，我军完成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12月22日到1949年1月5日，歼灭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解放天津。北平守军完全处于被包围状态，欲战不能，欲逃无路。华北国民党军队最高指挥官傅作义在中国共产党和平政策感召下，从民族大义出发，服

从人民公议，接受和平改编。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入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华北全境基本解放。

三大战役历时142天，歼敌共154万，其规模在中国战争史上是空前的。此后，国民党赖以维持其统治，发动反人民内战的精锐部队几乎丧失殆尽，其反动统治根本动摇，蒋家王朝的末日为期不远了。

二、国民党和平阴谋的破产 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

〔国民党和平阴谋的破产〕经过三大战役，国民党只剩下110万正规部队，军事失败已成定局。政治上，国内各阶级的政治态度也发生激烈变化，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纷纷奔赴解放区，国民党内部也四分五裂，蒋介石成了名符其实的孤家寡人。蒋介石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一方面，他抓紧军事布署，妄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南进，制造新的南北朝；另一方面，他开始使用和平手段，呼吁和谈，企图以此为自己获得喘息之机。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要求和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和平谈判。美帝国主义为了自己的利益，也鼓动那些既同反动阵营联系又同革命阵营联系的“自由主义人士”呼吁和平。中国一些地方实力派和资产阶级右翼人士也在策动“和平运动”，劝中国共产党怜惜反动派，把解放战争停顿下来。

在重大历史抉择面前，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指出：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

民民主专政。同时，为了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在下列条件下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它国民党军事集团和地方政府进行谈判：〈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利。

中国共产党的严正态度，迫使蒋介石在1月21日“引退”，副总统李宗仁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代理总统职权。李宗仁一面表示愿意和中国共产党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一面加强长江防线，妄图利用和谈，争取三到六个月的时间，扩充军队，卷土重来，或者划江而治，保住东南半壁江山。

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到达北京，同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进行谈判，拟定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南京政府拒不放弃分裂祖国阴谋，拒绝在协定上签字。它的和平阴谋最终破产。

〔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3月5日到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讨论并决定最后摧毁国民党统治的战略安排、党的战略重心转移以及从新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和基本政策等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重要报告做出相应决议。

第一，提出迅速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军事方面，对国民党残余部队采用三种基本方式：用战斗消灭的“天津式”；用和平方法改编的“北平式”；在孤立地点保存部分

敌军、使其中立，在政治上逐渐争取到我们一边、最后进行改编的“绥远式”。政治方面，迅速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建立全国性中央人民政府。

第二，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为了实现这一转变，全党同志必须以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同时要学会在城市中同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及资产阶级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斗争，并同帝国主义进行外交斗争。在城市工作中，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争取知识分子，争取一切可以合作的人，去战胜敌人和进行生产建设。同时，城乡必须兼顾，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结合起来。

第三，分析了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党的总任务和各方面的基本政策。指出：革命在全国胜利并解决土地问题后，中国还存在两种基本矛盾，国内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党的总任务，就是解决这两种矛盾。在政治方面，要强化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认真地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坚持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在经济方面，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使之成为领导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对城乡私人资本主义采取利用、限制的政策；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则谨慎地、积极地、逐步地引导他们经过合作社向集体化和现代化发展。在外交方面，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也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第四，分析了革命胜利后思想战线上的形势，提出加强

执政党思想建设的任务。要求党内防止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并且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号召全党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七届二中全会对上述基本问题的解决，为党领导人民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做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准备。会后，中共中央迁往北平。

〔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 1949年4月21日，在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和平协定的第二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颁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第二野战军、陈毅、粟裕、谭震林指挥的第三野战军，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余公里的战线上，展开大规模渡江作战，一举摧毁国民党苦心经营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宣告蒋家王朝22年反动统治的覆灭。

此后，人民解放军继续胜利进军，陆续解放了杭州、南昌、上海、武汉、太原、西安、兰州、银川、西宁等地。在我军强大攻势下，湖南和新疆两省和平解放。到1949年末，中国人民解放军全歼了大陆上的国民党部队，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发表〕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同志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就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性质、国内阶级关系、对内对外政策做出回答。

第一，毛泽东论述了在中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历

史必然性。一百多年来中国革命的历史表明，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而且只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第二，毛泽东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内各阶级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因为它最有远见，大公无私，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工农联盟是国家的基础，因为这两个阶级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不论革命还是建设，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不能占主要地位，但是必须团结他们，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发展生产，巩固人民政权。

第三，毛泽东阐明了民主和专政的关系。对人民的民主和对反动派的专政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自由权利。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但是，只要他们不造反，也给他们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新人。

第四，毛泽东阐明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在互利的条件下做生意；在平等与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鉴于当时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革命的仇视，毛泽东强调我国站在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扩张。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澄清了一些人在国家政权问题上的错误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8年后，各民主党派和无

党派爱国人士陆续进入华北解放区。1949年6月16日到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参加会议的有23个单位共134名代表，共商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大事。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北京召开。

政协通过了一系列建国文件，其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全国人大召开前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少数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并且为新中国规定了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和外交政策的总原则。

政协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北平改名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暂时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底五星红旗。

政协还决定在天安门广场设立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于当天举行奠基礼。

政协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机关。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六人为副主席。选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56人。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决定，推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长。并责成他们迅速组成各政府机关，开始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毛泽东亲自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告》。他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一章。

四、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和历史经验

〔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被推翻了，中国一百多年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结束了。中国从此成了真正统一、独立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从此成了国家的主人。中国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中国革命的特殊环境中，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找到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件战胜敌人的法宝，正确地解决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实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继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它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阵线，使帝国主义的殖民制度遭到沉重打击。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对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斗争，是一个有力

的支持和鼓舞。

〔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经验〕 革命必须有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的正确领导。这个党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自己，并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经验相结合，深刻认识中国革命发展规律，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政策，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这个党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密切联系群众，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革命必须要有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强大的人民军队，必须坚持以武装斗争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采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革命必须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巩固工农联盟，对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革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主要依靠中国各族人民自身的力量去夺取革命的胜利，而不能依靠外来援助。一个国家人民革命的胜利，固然离不开一定的国际环境和各国人民的支持，但从根本上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

思考题

1. 为什么国民党反动统治迅速崩溃，中国革命能迅速胜利？
2. 为什么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必须走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道路？

3. 中国新民主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和伟大意义是什么？

阅读书目

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

《论人民民主专政》

《将革命进行到底》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第六章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

第一节 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和 国民经济的恢复

一、 建国初期的形势和党的七届三中全会

〔**建国初期的形势和党的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新的历史时期

建国初期的形势是错综复杂的。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还盘踞在西南、华南的某些省份和台湾等沿海岛屿，进行垂死挣扎。大量的国民党特务、土匪和各种反革命分子的破坏也很猖獗。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对我国革命的胜利，怀着极大的仇恨。它们不仅指使和支持国民党残余势力进行骚扰破坏，而且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新解放区的农村尚未实行土改，农民与地主的矛盾仍然很尖锐。特别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不断发动内战的破坏，本来就十分落后的国民经济这时更陷入全面破产的境地。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城市失业人数高达400多万，农村水利失修，灾荒严重，有4000万灾民需要救济；加上国民党统治时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造成1949年我国财政的严重赤字，人民生活和国家财政经济都面临严重困难。因此，党在建国后头三年

的主要任务是彻底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实行各项社会改革，恢复国民经济，从而为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条件。

〔全国大陆的统一和地方各级政权的建立〕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人民解放军各野战部队继续向西北、西南、华南和东南进军，追歼国民党残余，将解放战争进行到底。10月中旬，解放了广州。12月上旬，解放了南宁。1950年6月，解放了海南岛和舟山群岛。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谈判，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同年10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宣告西藏和平解放。至此，中国大陆获得完全解放。

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民族自治政府。这就改变了旧中国长期分裂的政治局面，实现了全国范围内（除台湾等岛屿外）空前未有的统一和各族人民的团结，加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为我国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没收官僚资本〕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各级人民政府的建立，人民政府立即有秩序地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建国前后，人民政府没收了占旧中国工业固定资产80%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2858家，归人民共和国国家所有，使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在全国大型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到41.3%。其中发电量占58%，原煤产量占68%，生铁产量占92%，钢产量占99%，棉纱产量占53%。此外，我国政府还对帝国主义国家在华企业分别采取了管制、征购、征用、代管等措施，陆续转为国有。社会主

义国营经济建立并取得了对国民经济的领导权，这就为人民民主专政建立了必要的经济基础，为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奠定了物质基础。

〔**稳定物价**〕建国初期，国家经济状况的严重困难，是市场混乱，物价飞涨。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刚刚建立，还不可能给国家财政提供主要来源，为弥补赤字，不得不增发货币；更主要的是，投机资本家乘国家财政困难大肆兴风作浪。他们扰乱金融，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哄抬物价，各大城市先后刮起了四次物价大涨风，严重危及了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因此，在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后，党和政府一方面大力组织恢复工农业生产，另一方面领导人民开展反对投机倒把，稳定市场物价的斗争。这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市场领导权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争夺对整个国民经济领导权的斗争。同时，政府还加强对金融的管理，紧缩市场货币流通量，收购、调运和控制粮、棉、煤等主要的民用必需品并在各大城市和灾区大量集中抛售，与此同时，还辅之以行政手段，取消投机资本，终于稳定了物价飞涨风。到1950年春，市场物价基本稳定。

为了从根本上治理通货膨胀，确保物价稳定，1950年2月，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召开了全国财政会议，研究统一财政经济管理问题。3月3日，政务院颁布了《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的主要内容是：第一，统一全国财政收入；第二，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第三，统一全国现金管理。“三统一”，对稳定物价和平衡国家财政收入，扭转当时财政经济困难局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我国建国后经济战线的一个重大胜利。这个胜利标志着我国财政经

济状况开始好转。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为了争取国家财经状况的根本好转，确定当时的中心任务和战略、策略原则，党于1950年6月6日到9日，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会上，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刘少奇、陈云、周恩来和聂荣臻分别就土改、财经、外交与统战、军事等问题作了报告。全会着重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

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党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的基本好转。并规定了实现这一任务所需要的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会议确定，要做好土改、稳定物价、调整工商业、肃清反革命、整党等八项工作，创造三个条件，争取在三年时间内，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

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在分析了国内各阶级的动态后，阐明了分清敌、友、我，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孤立和打击少数敌人的战略策略方针。会议强调必须稳步前进，调节各个方面的关系，团结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集中力量向国民党残余势力、封建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进攻，而不要树敌过多，造成全国紧张。

七届三中全会，是党在建国后召开的第一次重要全会。会议确定的中心任务和战略策略方针，是我国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工作纲领。

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运动

〔抗美援朝〕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扩大朝鲜战争，同时侵占我国领土台湾。28日，周恩来代表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侵略朝鲜、台湾及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但是，美国不顾我国政府的严重警告和世界舆论的谴责，于7月7日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非法通过侵朝决议。9月15日，美国纠集15个仆从国家的军队，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在朝鲜仁川登陆，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严重地威胁我国安全。为此，党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毛泽东发出《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并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到达朝鲜前线，和朝鲜人民军并肩抗击美国侵略军。从1950年10月至1951年6月，连续进行五次大规模的反击战役，取得了五战五捷的辉煌战果，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附近。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同时，国内各族人民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热潮，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在党中央“边打、边稳、边建”方针的指导下，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推动了国内各项社会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

1951年7月，美国侵略者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被迫同意举行停战谈判。美国侵略者并无诚意，它一面制造借口拖延和中断谈判，一面不断发动军事进攻，甚至施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妄图施加军事压力使我屈服。我军则针锋相对，同美国侵略者展开了边谈边打的斗争。经过两年的激

烈斗争，美国侵略者不得不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议上签字。中朝军民，在三年的英勇奋战中，共击伤和俘虏109万敌人，其中美军39万多人，取得了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胜利。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了朝鲜的独立和我国的安全，对国际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土地改革运动〕新中国成立时，全国约有3.1亿农业人口的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在抗美援朝的同时，党和政府领导新解放区农民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土地运动。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新解放区农民普遍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根据建国后的新情况，《土地改革法》将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便更好的孤立地主，保护中农，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在土地改革中，党坚决反对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的错误做法，坚持有领导的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起来打倒地主阶级，获得土地的方针。到1952年底，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外，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

土改胜利完成，彻底消灭了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并为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

〔镇压反革命运动〕全国解放后，大陆上残留着200万土匪和大批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

子。这些反革命残余势力一直没有停止进行破坏和捣乱，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反动气焰更加嚣张，妄图里应外合，颠覆人民民主政权。美国间谍分子竟然企图在1950年“五一”节时，炮击天安门检阅台，杀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了巩固人民政权，1950年3月党中央发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1950年10月，又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党坚持群众路线，贯彻专门机关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同时，贯彻对反对革命分子坚决镇压与宽大处理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注意调查和证据，严禁逼、供、信，以便稳、准、狠地打击各种反革命分子。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到1952年底，镇压反革命运动胜利结束，基本上肃清了中国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提高了广大人民的觉悟，安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使抗美援朝战争有了安全的后方，使恢复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改革得以顺利进行。

【“三反”、“五反”运动】根据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1950年上半年，党和政府对全国工商业进行调整。这主要是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引导他们走上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

经过半年的合理调整，私营工商业克服了困难，有了较大的发展。1951年全国私营工业生产总值比1950年增加39%，私营商业零售额比1950年增加36.6%。但是，随着私营工商业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投机取巧的本性也进一步

暴露出来。他们违背《共同纲领》采用“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法，大搞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活动。由于资产阶级的腐蚀和影响，党和国家机关中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倾向也滋长起来，有的甚至蜕化变质。这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1951年12月1日，党中央发出了在全国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又于1952年1月发出了对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斗争的指示。从此，“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在“三反”运动中，党采取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检举，坦白运动，其重点是打击大贪污犯。对于大多数情节较轻或彻底坦白的贪污分子，予以从宽处理。对极少数情节严重而又拒不坦白的，给予严厉惩治。在“五反”运动中，党中央又提出对不法资本家的处理，坚持：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的基本原则，争取和改造了多数资本家，孤立和打击了少数反动资本家。

1952年6月，“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这场斗争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增强了防腐蚀的能力，进一步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这就为后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基础。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旧有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改革〕

在各项社会改革的同时，党在知识分子中进行了思想改造工作。党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建国后，党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坚持了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並号召他们积极参加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的同时，用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方法，肃清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阶级思想影响，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帮助他们树立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1951年下半年开始，党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组织广大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二是组织他们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帮助他们在斗争中划清敌我界限，提高思想政治觉悟。1952年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基本结束。这项学习运动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有的单位要求过高过急，方法简单，使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感情受到伤害。

在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同时，党和政府还对旧有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改革。旧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基本上是为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服务的，不能适应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1949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大众开门的总方针。还决定学校废除国民党的训导制度和国民党党义等反动课程，开设了马列主义理论课程，建立了党团组织和政治思想教育制度。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又进行了院校调整。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改变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教育制度，清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在文教事业方面的严重影响，促进了新中国文教事业的迅速发展。

三、经济恢复任务的完成

〔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27亿多元，比1949年增长77.5%，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45%，农业总产值增长48.5%。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交通运输、内外贸易、文化教育、体育、卫生保健事业等都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物价稳定。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从1949年到1952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了70%左右。农民的收入一般增长了30%。这些成就标志着国家财经状况已基本好转，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

〔恢复时期的历史经验〕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胜利完成，表明党不仅有能力领导人民群众破坏旧世界，也有能力领导人民建设新世界。三年时间经济建设成就，是党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及领导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使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坚持以发展生产为中心，正确处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从中国实际出发，制定正确的方针和政策；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第二节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及其历史必然性〕党中央和毛泽

东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的经验，于1952年下半年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第一，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只有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才能以先进设备武装国民经济各部门，提高生产力水平；才能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才能建设强大的国防。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和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国内主要矛盾已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国家需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定发展，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必然出现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这就不能不发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在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的各项经济政策之间，在它们和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之间，在它们和本企业职工、全国各族人民之间，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为此，党在领导全国人民打击投机倒把、调整和改组工商业、进行“五反”运动、实行粮棉统购统销等一系列措施和步骤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采取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把原来落后、混乱、畸形发展、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引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三，国家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土改中得到了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下中农，生活虽有改善，但由于经营方式落后，又时有天灾，生产和生活仍有很多困难。他们迫切要求在获

得土地后，尽快增强生产能力，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农业产量，以避免产生两极分化，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当和出卖土地。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国家对农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大，另一方面也为农业的技术改造提供了越来越有利的条件。所有这些都说明，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把个体农业引上合作化的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个体手工业同个体农业相类似，从其自身利益和社会需要出发，组织起来，向集体经济过渡也是必然的。

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它及时地向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指明了由新民主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务、途径和步骤，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党在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同时，还提出了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至1957年）。这个计划是根据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而编制的，它是实现总路线的一个重大步骤。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党中央领导下，由周恩来、陈云主持制定的。其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援建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为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以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以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高饶反党 联盟阴谋的被粉碎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为了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需要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证人民群众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加国家建设事业的积极性。经党中央提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54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任务是：制定宪法和几个重要法律，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新的国家领导人员。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周恩来作了《政府工作报告》。

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国家的总任务规定下来，还对人民的权利义务、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作了明确的规定。

大会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等13人为副委员长；大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结束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由《共同纲领》代替国家根本大法的过渡状态。大会通过的宪法及其他法律，巩固了革命胜利的成果，反映了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同愿望，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初步基础。

〔高岗、饶漱石反党篡权阴谋被粉碎〕正当全党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的时候，党内出现了高岗、饶漱石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高、饶反党活动的基本特点是以阴谋手段，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高岗、饶漱石于1952年先后从东北和华东调来中央工作。高岗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长。个人野心，驱使他们互相勾结起来，进行了一系列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他们的反党活动，是在1953年6月至8月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9月至10月的中央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及其前后暴露出来的。在财经工作会议上，高岗利用主持会议的机会，发表了一系列错误言论，歪曲事实，制造混乱，攻击中央负责同志，企图分裂党中央。会后，高岗以休假名义，背着党中央窜到华东和东南进行造谣和挑拨，鼓吹荒谬的“两党论”、“军党论”，把我们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他说党是军队“创造”的，并自称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应当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副主席，并担任国务院总理。饶漱石积极配合高岗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妄图改组中央组织部的领导，全面夺取人事大权。

党中央及时识破了高、饶的反党阴谋活动，并与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54年2月6日至10日，党中央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会议深刻揭露和批判了高、饶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针对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强调了增强党的团结、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加强和维护党的团结重要性。会后，党继续召开会议，进一步揭发高、饶反党分裂党的活动。在查清

高、饶反党罪行的基础上，于1955年3月，党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并把高岗、饶漱石开除出党和撤销他们党内外各项职务。

我们从高、饶反党事件应吸取的主要教训是：必须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和团结统一，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同分散主义和骄傲情绪作斗争；共产党人必须光明磊落，不要搞阴谋诡计；必须对党员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和组织监督，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要特别警惕野心家、阴谋家的反党篡权活动。

三、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个体农业改造的完成〕对个体农民，通过合作化引导他们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马列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江西苏区就组织过劳动互相关社和耕田队，到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在陕北、华北和东北等各解放区，又广泛组织过劳动变工队和互助组，并有少数农业生产合作社。建国以后，党中央又及时号召农民组织起来，积极领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1951年9月9日，党中央号召开了第一次互助合作的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这个决议草案总结了解放区的经验，指出土改后农民中存在发展个体经济和实行互助合作的两个积极性，以及农村中出现新的两极分化的新情况，要求各级党委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的条件，按照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的原则，逐步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

路。不久，党中央把互助合作决议草案发给各级党委试行，推动了合作化运动的发展。从此，我国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进入了以办互助组为主要内容的初级发展阶段。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把《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作了部分修改后，正式公布。到1953年底，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发展到14000多个。10月，党中央召开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毛泽东在会前和会议期间，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作了两次重要谈话。12月16日，党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总结了办社经验，进一步指明引导农民经过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这是党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道路。在决议的指引下，农业生产合作社从试办时期开始进入发展时期。全国农村普遍出现办初级农业社的热潮，1954年春，就发展到95000多个。生产普遍增长，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性。

1954年10月，党中央召开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会议总结了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成功经验，即准备一批，发展一批，巩固一批，再准备一批。会议肯定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是发展互助合作的主要环节。党中央批准了1955年初级社发展到60万个的计划，合作化运动进入大发展阶段。

1955春，在大发展过程中，部分地区合作社发展过多过猛，违反自愿互利原则，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加上1954年国家向农民多购了70亿斤粮食，全国农村中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紧张状态。针对这种情况，1955年1月，党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指出合作化运动“应基本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并根据不同地区的

情况，提出了“停”、“缩”、“整”、“发”的措施。通知下达后，各地合作社的发展仍然继续猛升，到三、四月份就超过了全部计划，发展到67万个。四月下旬至五月初，中央农村工作部受中央委托，召开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着重研究了搞好合作社的整顿巩固工作，提出“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的方针。并对合作社的发展计划作了相应调整。经过整顿，收缩了2万多个合作社，巩固了65万个，迅速缓和了农村紧张形势，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6月中旬，党中央批准了1956年在现有65万个社的基础上发展到100万个社的计划。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党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经验，从理论上作了明确的阐述：（一）论证了迅速实现农业合作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指出土改后的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二）阐明了农业合作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辩证关系，指出工业化需要建立大规模经营的农业，农业的机械化必须以工业化为条件。在我国的情况下，先合作化后机械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三）强调了实现合作化对巩固工农联盟的重要意义，指出土改以后个体农业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出现两极分化现象，工农联盟就有被破坏的危险；（四）重申了自愿互利的原则和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的办社路线，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注意合作化的质量，注意整社工作等。这些，无疑是正确的。在合作化大发展的形势下，10月4日至11日，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加速了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但是，这两次

会议上对“右倾”的批评是不符合实际的。

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后，合作化运动迅速发展，出现了整乡、整区、整县实现合作化的高潮。1955年6月，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14.2%，到1956年1月，就猛升到占总农户的80.3%，全国基本实现了初级合作社。1956年初，合作化运动转入以高级社为中心的阶段。到5月份就有占农户总数一半的农户加入高级社；年底，加入高级社的农户达到了占农户总数的87.8%。这就标志着我国农村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我们党和毛泽东根据这个原理，领导农民成功地实现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它的主要经验是：（一）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先合作化，后机械化，“趁热打铁”，不失时机引导农民组织起来；（二）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的过渡形式；（三）依靠贫雇农（包括新老下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对富农采取从限制到逐步消灭的政策，把消灭剥削阶级同改造剥削分子结合起来。这些成功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个体手工业改造的实现〕逐步实现国家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手工业生产总值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4，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个体手工业者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个体手工业生产，由于资金缺乏、规模狭小、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不能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

活的需要，迫切需要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生产。党在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同时也抓紧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对手工业者，采取经过合作化的道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把分散的个体的小生产改变为集体生产，逐步实现手工业生产的机械化或半机械化。根据手工业生产的特点，党采取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在改造的形式上和步骤上，采取从手工业供销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形式，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逐步改变手工业的生产关系；在方法上，应当从供销入手，实行生产改造。

由于党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很快。到1954年底，全国参加手工业合作组织的人数激增到121万，比1949年的8.9万人增加13倍，比1953年也增加4倍，占全国手工业总人数的13.6%。但手工业合作化迅速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为此，党中央于1955年5月提出了对手工业实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决定对手工业合作社进行整顿和巩固工作。各地党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妥善解决了手工业合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1955年农业合作化高潮兴起以后，手工业合作社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到1955年底，全国手工业合作社和合作小组就发展到6.8万个，入社人数达22万，占全国手工业总人数的40%。12月，在党中央领导下，召开了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会议，制定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规划。1956年3月，毛泽东指示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国迅速掀起手工业合作化的高潮。到1956年底，参加手工业合作社的有509万人，组织了约10万个社（组），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占总人数的90%以上，基本上实现了对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采用和平“赎买”的方式，通过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第一，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它具有剥削工人阶级牟取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尤其建国后经过没收官僚资本，取缔投机资本和打击不法资本家的“五毒”的斗争，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多数分子认识到只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才是唯一出路。第二，我国建立了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有了改造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条件。尤其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之后，割断了资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系，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第三，党和国家采取了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并把企业的改造和人的改造相结合等一整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早在建国初期就开始了。1953年以前，国家就对私人工商业采取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等最初步骤，即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进行改造。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公布，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从1954年起，开始有计划地发展公私合营企业。1955年10月，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之后，毛泽东邀请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举行了座谈会，希望他们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接着，陈云、陈毅又在工商联执委会上作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号召全国工商业者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

造。11月，中央政治局召集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决议指出：“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决议确定把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推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阶段。这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1956年初，在农业合作化高潮推动下，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出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热潮。1956年1月15日，北京市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随后，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地以及全国各大、中城市，也先后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私营工业人数的99%，私营商业人数的85%，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全国基本上完成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对全行业公私合营后的企业，规定在若干年内每年给资本家5%的定息；对原工商业者，在政治上和工作上给予适当的安排。在公私合营的企业里，资本家除按规定领取定息之外，已失去了对企业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全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企业的领导权和管理权都掌握在国家政权手中，因此，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

党通过和平的变革，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主要是：（一）根据中国社会特点，对民族资本采取和平改造，实行“赎买”的政策，实现国有化，成功地把马克思、列宁的设想变成了现实。取得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终把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三）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对资本家个人的改造结合起来，通过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成功地将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四）继续坚持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不剥夺其政治权利。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中一条新鲜的经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三大改造胜利的伟大意义〕 由于我们党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及时提出和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采取了正确的步骤和方法，使我国从1949年到1956年，在短短的七年内，不仅恢复了国民经济，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而且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当然，在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主要是在1955年夏季以后，对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及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较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但是，总的说来，在一个

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三大改造的胜利，使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剥削制度已经消灭，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这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

三大改造的胜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我们不仅避免了在社会大变革情况下通常难以避免的生产力下降，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就壮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力量，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三大改造的胜利表明，我国在很少社会震动的情况下，胜利地完成了和平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使命，并且正确地实行了把原来的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方针。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

〔三大改造的基本经验〕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也是极其丰富和宝贵的。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开辟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历史已经证明，这条道路是成功的，正确的。它的基本经验是：（一）依靠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社会主义工业化为社会主义改造提供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社会主义改造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前提条件，两者互为条件，互相促进，从而把我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推向社

会主义。(二) 由于我国人口多, 耕地少, 广大农民在土改后迫切要求迅速摆脱落后贫穷状况, 而又不能立即实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 这就必须先合作化, 后机械化。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 又必须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 采取各种逐步过渡的形式, 而不能强迫命令, 更不能对农民实行剥夺。(三) 由于我国资产阶级有两面性, 既有剥削工人的一面, 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 无产阶级手里握有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 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 再加上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创造了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 并且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相结合, 因而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设想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这些基本经验, 也是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理论。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

第三节 探索我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

一、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召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迫切需要加强和改进党对于整个科学文化工作及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导, 以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为此, 党中央第一次把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提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议事日程上, 要求全党加以认真的研究和讨论, 以便制定出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实施办法来。

1956年1月14日至20日，党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首先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和充分地发展科学、利用科学知识。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为了赶上世界先进的水平，必须付出最紧张的劳动，向现代科学进军。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报告还着重指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了适应社会主义事业急速发展的需要，必须加强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导，克服轻视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情绪，必须纠正低估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帮助他们进一步进行自我改造，迅速扩大知识分子队伍，提高知识分子水平。他还向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会议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

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讲了话，他指出：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

这次会议之后，党中央又发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指出力求十二年内使我国的科学技术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国务院决定成立以陈毅为主任的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集中全国大批优秀科学家编制了1956年至1967年全国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为了促进我国科学文化的发展，毛泽东在五

月间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一切都极大地鼓舞我国几百万知识分子，在全国迅速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论十大关系》〕为了开始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1956年初，党中央政治局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听了中央工业、农业、商业、运输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中央政治局经过多次讨论，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基本问题统一了认识。在集体总结经验的基础上，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

《论十大关系》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毛泽东提出要正确地处理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

《论十大关系》所阐明的主要问题是：

第一，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就是《论十大关系》的中心思想。

调动积极因素，在国内，主要是调动工人和农民的积极性；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

素，但我们仍然要做好转化工作。国际上，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中立，反动的可以分化和利用。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必须正确处理革命和建设、政治和经济以及经济领域内部的相互关系等各方面的关系。

毛泽东在论述工业和农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时，都强调要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他说我们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但也不能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内地工业也必须大力发展；要加强国防建设，首先要加强经济建设，只有经济建设迅速发展，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的进步；还必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既要有中央的强而有力的统一领导、全国统一计划，又必须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总之，要充分调动广大工人、农民等各方面群众的积极性，挖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在解决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国家、集体和生产者个人诸关系的问题上，必须统筹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头，都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

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必须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加强各民族的团结，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对于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是非关系，既要分清是非，又要团结同志；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上，一是要分清敌我，二是要采取正确的政策，对一切反革命分子给予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第二，指明了我国工业化的正确道路。工业化道路问题，主要是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必须肯定。但对生活资料的生产也决不能忽视。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就不能发展重工业，因此，必须充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要通过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去促进重工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要加重一些。这样，一可以更好地提供给人民生活，二可更快地增加资金和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这就为我国指明了工业化的正确道路。

第三，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经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在报告中，不仅论述了要正确处理国内经济、政治中的各种关系，而且还要求处理好中国同外国的关系，以便把外国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我所用。毛泽东正确分析了中国和外国关系，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和方针。他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技术、文学和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对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作风，要坚决抵制和批判。要把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引进先进科学技术正确地结合起来，以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论十大关系》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规定了经济建设中许多重大政策，它是经济规律的客观反映，也是社会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证，并为党的八大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的情况下，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党在北京举行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有5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团，应邀参加了大会。毛泽东主持了八大并作了开幕词，刘少奇作了政治报告，邓小平作了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在大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大会经过热烈的讨论并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并选出第八届中央委员会。

〔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历史功绩〕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七大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经验，制定了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因此，八大的历史功绩是：

（一）大会深刻分析了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党和国家今后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大会指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大会强调指出：今后我国虽然也有阶级斗争，还必须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

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二)大会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教训后指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第一，应该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第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的发展。第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建全物资储备制度。第四，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大会提出既要防止右倾保守又要反对盲目冒进的倾向，强调一定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以保证国民经济稳步前进。

(三)大会提出必须扩大党和国家民主生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是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依靠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所以必须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但是这种民主权利，必须有社会主义法制保障。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目的是为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保证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民主权利。

(四)大会特别强调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切实执行党的群众路线；防止骄傲自大的主观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加强党内民主和党委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这些原则，对我们党的建设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大意义〕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大会正确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任务胜利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根据主要矛盾的变化，党中央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决策。大会所制定的关于经济建设、政权建设、民主与法制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的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为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and 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大会所提出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而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二、反对经济工作中的冒进倾向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成就

〔反对经济工作中的冒进倾向〕1956年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而且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胜利面前，党内一部分同志头脑开始发热，也由于1955年下半年三大改造中不适当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于是党内滋长了“左”倾情绪。因此，在安排1956年国民经济时，出现贪多求快，急躁冒进倾向。基建规模过大，职工队伍增加过急，农业生产贪多图快，结果造成了财政赤字，物资紧张。1956年6月20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人民日报》发表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情绪》的社论。社论指出在反倾向问题上必须实事求是，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根据社论精神，党中央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修订计划、压缩指标、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党中央提出反冒进方针和所采取的措施，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得以肯定，所以迅速纠正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冒

进倾向，使1956年的国民经济建设得到顺利的发展。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成就〕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建设社会主义方针的指导下，全国人民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很快，到1956年，我国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主要指标。

在基本建设方面，从1953年到1956年，投资总额达411.7亿元，建立起一系列新的现代化企业，并对原有的工业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改进和技术改造。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基本建成，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的工业基础大为加强，在内蒙古、西北、华北、华中各地开始出现许多新的工业城市。

在工业方面，1956年总产值达703.6亿元，比1952年增加一倍多。在工业总产值中，现代工业所占的比重，由1952年的56.4%，提高到71.6%。主要工业产品钢、生铁、煤炭、水泥等，1956年的产量都超过了原计划的1957年的指标。钢产量达到446.5万吨，生铁产量达到477.7万吨，原煤产量达到10592万吨，水泥产量达到639.9万吨。工业技术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有了自己的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新式机床制造业、冶金矿山设备制造业。以及高级合金钢、重要有色金属冶炼业等新的工业部门。我国已经能够生产汽车、喷气式飞机、新式机床、万能机床、高级合金钢等许多我国从来不能生产的产品。

在农业方面，政府增加了大量的投资和贷款，供应了大量的农业机械、化学肥料，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虽然多次在许多地区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而粮食等产量仍有所增加，到1956年底，粮食作物和经

济作物的产量都接近于1957年的计划指标。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农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增4.8%。

在这四年间，我国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都有很大的发展。从1952年到1956年在校学生人数的增长，高等学校从19.1万人上升到40.3万人，中等专业学校从63.6万人上升到81.2万人，普通中学从249万人上升到516.5万人，小学从5110万人上升到6346.4万人。

在这期间，人民生活也有很大改善。全国职工总数1949年只有800多万，而1956年增加为2400多万，就业人数达到全国解放时的三倍。人民收入明显提高，1956年职工平均工资比1952年提高了36.8%，农民收入增长了24.3%。

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开始改变了我国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面貌，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在短短十二年里取得这样大的成就，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空前壮举，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思考题

1. 为什么说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否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
2. 为什么说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3. 我国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经验及其意义是什么？
4. 怎样理解党的八大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阅读书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第七章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始 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第一节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

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

〔历史背景〕1956年底，我国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当时国际国内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

在国际方面，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斯大林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中所存在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同年夏秋相继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暴露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矛盾。帝国主义乘机掀起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在关于如何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等问题上，也出现了尖锐的分歧和争论。

在国内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许多人一时还不大适应。那些留恋旧社会、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一遇机会就想兴风作浪。也由于我们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及其他原因，国内少数地区陆续发生了一些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农业合作社社员要求退社等事件。

国际国内的斗争实践表明，如何正确认识和区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仍然存在着的阶级斗争，这在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各个国家中，还是有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不解决这些问题，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能顺利前进。

〔**基本内容和历史意义**〕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①的著名讲话，论述和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后遇到的一些新问题，其基本内容如下：

第一，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性质和情况。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产生的矛盾。因此一般不表现为对抗的性质，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因此，必须按照具体情况，改革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克服上层建筑中的弊病，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去适应和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對抗性矛盾，用专政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用民主的方法解决。

^① 以下简称《正处》

第三，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一系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其目的都是为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自觉地调整各种关系，更好地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正处》的发表有着重大的意义：

第一，《正处》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开始阶段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是指导党和人民正确处理各种矛盾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第二，讲话在正确分析当时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所提出的各项方针、原则，为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讲话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及科学社会主义的国家学说。

二．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整风运动**〕为了使全党的思想和作风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中共中央根据八大的精神，决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明确规定了整风运动的目的、内容、方针和方法。《指示》认为，我们的国家已经从革命的时期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处于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又因为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在执政的地位，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

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指示》规定，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整风的主题。《指示》要求，这次整风运动必须执行“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进行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批评自我批评。

5月1日，整风指示公开发布，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就蓬勃地开展起来了。

〔反右派斗争〕在整风运动中，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为了坚持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从1957年6月开始，党领导群众在全国陆续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进行反击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由于当时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加上不适当地支持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使反右派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第一，由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这就导致党在指导思想对知识分子的估计发生了变化，认为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仍然属于资产阶级，因而对他们不信任、

不重用，使他们在社会主义事业中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二，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损害了社会主义法制，中断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进程。使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集体领导制度日益被削弱，党内个人专断作风和个人崇拜有所发展。

第三，反右派斗争后，重新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内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改变了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为后来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四，在反右派斗争中，党不适当地支持了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四大”）人为地加剧了紧张局势，混淆了两类矛盾；在反右派斗争后又错误地总结了“四大”是解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最好形式，并且推行到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领域，使经济建设纳入阶级斗争的轨道，从而严重地破坏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

由于反右派斗争主要是在知识分子范围中进行的，它对当年的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和实际工作还没有发生直接的影响，错误还是局部的。在1957年的大部分时间内，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还是在经济建设方面，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

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

〔**坚持了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由于党中央认真执行了“八大”确定的正确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虽然在反右派运动中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毕竟是局部的，经济建设事业仍然蓬勃发展。

在经济工作中，党中央认真地贯彻了既反保守又反冒

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同时，党中央和国务院又采取积极措施，调整、压缩了1957年基本建设的投资。1956年11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明确提出，1957年的计划应当在继续前进的前提下，对基本建设要作适当的压缩，要合理调整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以适应国家的财力和物力的可能性。1956年11月，陈云在关于商业问题的讲话中也提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1957年1月，陈云进一步提出制定计划必须切合实际情况，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的重要观点。

1957年2月，党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七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从物力、财力上保证了1957年经济计划的完成。

由于贯彻执行了党中央提出的上述方针和措施，使1957年国民经济发展成为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到1957年底，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地超额完成，使我国工业的面貌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在工业生产方面，1957年的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产值）达628亿元，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1957年指标的17.3%。钢产量达到了535万吨，生铁为594万吨，煤炭为13100万吨，都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标。从而使我国的工业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工业体系。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飞机和汽车制造业、重型和精密机器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冶金和矿山设备制造业以

及高级合金钢和有色金属冶炼业等许多新的生产部门建立起来了。

在农业方面，发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战胜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旱灾，获得了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了3900亿斤，棉花达到3280万担。

交通运输方面，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建了8500公里的铁路和7万多公里的公路。1957年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到29900公里。公路通车里程达到25万多公里。

教育、文化、科学和卫生事业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

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批失业人员基本上得到了安置，职工的平均工资达到637元，比1952年增长42.8%。农民的收入比1952年增加近30%。全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增长了34.2%。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壮举。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提高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初步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信心。

第二节 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失误 和纠正“左”倾错误中的曲折

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

〔急于求成思想的发展〕1957年经济工作的出色成绩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为展开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也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和全国

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形势一派大好。但在大好的形势下，急于求成的“左”的指导思想迅速发展，导致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的失误。

“左”的指导思想是在不断的反右倾、批反冒进过程中产生的。

1957年9月23日至10月9日举行了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在讨论国内形势时，毛泽东在讲话中就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轻率地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为后来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的发生提供了理论依据。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把起了积极作用的反冒进当作右倾保守思想加以批评，说反冒进反掉了多快好省，给群众泼了冷水，损害了他们的积极性。会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公开批判反冒进，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象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这表明党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

1958年1月，党在南宁召开了由9省工业书记参加的会议。会议提出了“不断革命”的要求，认为“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这就为破坏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会上毛泽东再次严厉地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说反冒进是“右倾”、“促退”。说反冒进泄了6亿人民的气，是政治问题，让资产阶级右派钻了空子，给工作造成了损失。并提出以后不要提反冒进这口号。南宁会议后，批判反冒进的浪潮更高，这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地发展起来。

1958年3月8日至26日，党在成都召开了有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再次严厉批判反冒

进。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把1956年国际上发生的反共浪潮和国内的反冒进并提，说这两件事都给了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会议开展了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还要求各级党委抓好全面开展反右倾运动。由于长期来对右倾保守思想和反冒进的批判，党内的恐右病日益严重。同时，在各级干部中滋长了急躁冒进的倾向。

党内急于求成思想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和“大跃进”的发动作了充分的准备。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在不断的反右倾、批反冒进的过程中产生的，它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就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观点。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才正式形成完整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主要议程是：（1）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2）邓小平作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报告；（3）讨论通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谭震林作草案说明报告。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会议号召全党同志同心同德，团结全国人民，贯彻执行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条总路线把社会主义建设作为

主要任务突出地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并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经济建设中实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等规定为基本点。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是它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贯彻执行时，片面强调它的灵魂是搞速度，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进一步助长了急躁冒进的“左”倾思想的发展。

会议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作出的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结论。实际上否定了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必要性，仍然把抓阶级斗争作为党的主要任务。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会议认为中国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它反动派；另一个是正在逐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一个是农民和其他原先的个体劳动者，另一个是工人阶级）。这些观点违背了当时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为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根据。

二、“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大跃进”运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前后，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是经济建设方面“左”倾思想的具体实践，其特征是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

“大跃进”是从盲目地、片面地追求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开始的。早在1957年11月，党就提出，要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它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一口号成为全党全民的动员纲领。从此开始，党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实际上已转为以钢为纲。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即北戴河会议）。会议不切实际地规定了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根据对1958年粮食产量的过高估计，决定1959年的指标为8000亿斤~10000亿斤；规定1958年的钢产量比1957年的产量翻一番，即由535万吨猛增到1070万吨。会议向全党全民发出为钢铁产量翻一番而奋斗的号召。北戴河会议后，“大跃进”运动迅速在全国出现高潮。

1958年要完成产钢1070万吨任务，这是当时开采、冶炼、运输等能力所不可能达到的。为了突击完成钢的翻番任务，决定开展一个“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全民动员，几千万人一齐上阵，土洋结合，迅速掀起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大炼钢铁运动。1958年9月，全国直接参加大炼钢铁的有500万人，建小高炉60多万座。10月炼钢人数增到6000万人，11月和12月又增加到9000万人，小高炉也猛增加到100万座。钢铁生产被作为全党全国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各部门都要为“钢铁元帅”让路、服务。这种全力保钢，不顾其它，排斥科学和技术，不顾质量，不讲经济效益的做法，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平衡，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其结果，1070万吨钢这个指标名义上完成了，实际上合格的钢产量也只有800万吨。

“大跃进”要求各行各业必须全面跃进。在大炼钢铁的同时，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都开展“全民大办”。这种“以钢为纲”所带来的一系列“大办”，造成了一种表面上颇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的高潮。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同“大跃进”几乎是同时出现的。1958年3月，成都会议后，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小社并大社的决定，各地先后开展了并社工作。合并扩大后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的叫“大社”，有的叫“农场”，有的叫“集体农庄”。8月上旬，毛泽东在河南、山东等农村视察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他还指出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又出现了建立人民公社的热潮。

1958年8月，党的北戴河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决议指出，人民公社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决议虽然指出，人民公社建成后不要忙于改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分配制度还是按劳分配。但是又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有些地方三、四年内即可完成，有些地方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决议还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北戴河会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公布后，各地人民公社一哄而起，很快形成了全国性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到10月底，全国就建立了2.6万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多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基本上实现了公社

化。由于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公社的规模都很大。全国平均28个半合作社并成一个公社。有的一县数社，有的一县一社。在公社化运动中，有些地方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界限，“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严重泛滥起来。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不承认差别。对生产队的劳力、财物，公社往往无偿调用，社员的某些财物也被无代价地收归社、队所有。还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统统割掉，发生了否定和破坏商品经济的情况。公社中还大搞“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实行“大兵团作战”，连续昼夜苦战，使社员疲惫不堪。所有这一切，都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秩序，打击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生产力遭到很大的破坏。

三、党开始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倾错误

〔开始觉察到工作中的失误〕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造成了国民经济主要比例严重失调，使社会主义经济遭到了重大损失。在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方面，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积累率急剧上升。基本建设投资，1957年为138亿元，1958年则增加到267亿元。积累率由1957年的24.5%，增加到33.9%。由于基本建设规模太大，强调多快，忽视好省，这样过高、低效的积累，不但直接扣减了当年的消费基金，而且大大限制了以后几年消费基金增长的可能。在工农业比例关系方面，由于抽调农村劳动力、平调农村资财、征购过头粮食，使农业战线受到极大削弱，生产大幅度下降。由于实行吃饭不要钱，1958年农业生产虽

然获得了丰收，但是生产队的农产品很快就被消耗空了，以致不久以后社员的基本生活都受到了影响。由于取消生产责任制、经济核算，劳动纪律松弛，生产陷于严重混乱状态。在工业交通内部，由于实行“以钢为纲”，片面发展重工业，各行各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也严重失调。在社会购买力和商品可供量的比例关系方面，也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特别是人民必需的消费品已不能保证基本需要。这些由于“左”倾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党中央开始觉察，并采取积极步骤，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

〔第一次郑州会议和党的八届六中全会〕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会议明确指出：（1）必须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两种界限。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错误的。人民公社仍是集体所有制，即使将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不等于实行共产主义。（2）陈伯达等人提出的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主张是错误的。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我们不能避开一切必须使用的、还有积极意义的诸如商品、价值法则等经济范畴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了团结几亿农民，必须发展商品交换。废除商品、对农产品实行调拨，就是剥夺农民。（3）全民大办钢铁、大兴水利、深翻耕地等连续苦战需要休整，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在会议期间，毛泽东还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要求大家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强调指出：“要联系中国

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

郑州会议基本上解决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思想，这是纠正极左错误的开端。但会议仍未摆脱对当时经济发展形势的不切实际的估计，继续提出一些高指标。对人民公社内部的“共产风”还没有认识到。因此这次会议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同年11月21日到27日，在武昌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郑州会议，在批评刮“共产风”错误的同时，着重地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方面的问题。在会上，毛泽东针对“大跃进”中的问题明确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必须老老实实，不要弄虚作假。又说：北戴河会议关于成立人民公社问题的文件有缺点，需要改一下；他还说，现在“要压缩空气”，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会议根据毛泽东和其他中央同志的意见，初步调整了一些过高的指标。

在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的基础上，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举行了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那样作，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决议》还指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因此，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人

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决议》明确宣布：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衣服、家俱等）和在银行、信用社存款，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工具、小家畜、家禽，可以经营一些家庭副业。全会初步调整了北戴河会议所确定的1959年工业生产的高指标，把1959年钢的产量由3000万吨降为1800万吨。但对农业仍持乐观态度，规定粮食要由8000~10000亿斤增加到10500亿斤。

会议及其《决议》对于从理论上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限，澄清党内和群众中的混乱思想，制止“共产风”，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决议》仍然反映和肯定了不少“左”的东西，因而，难于起到从根本上纠“左”的作用。

〔第二次郑州会议和党的八届七中全会〕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党中央在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从人民公社内部所有制入手解决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进一步纠正“共产风”。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的思想。他指出，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偿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这种“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恐慌。这就是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他还指出，现在搞公社所有制是破坏生产的，应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他强调指出，等价交换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一个不能违反的经济法

则，今后社与队、队与队、社与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只能是
买卖关系，必须遵守等价交换原则。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
见，规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这就是：“统一领导，
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
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
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这次会议精神传达到广大农村后，得到干部和广大农民
群众的热烈欢迎。

为了继续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问题，同
年3月25日至4月5日，党中央在上海相继举行了政治局扩
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会议讨论和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
计划草案，检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进一步降低了钢铁
等主要生产指标。还补充规定人民公社实行生产小队的部分
所有制。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根据各地整社中群
众普遍提出清算旧帐（即清算公社化和大炼钢铁中平调生产
队的物资、劳力等项目）的要求，改变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关
于旧帐一般不算的规定。他指出：旧帐不算不对，一般要
算。因为算帐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法则，才有可能教会
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

如上所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党中央连续召开了六
次重要的会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
这对于纠正农村的“共产风”和平均主义倾向，压低高指标，
都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
改变，是在充分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
面红旗”的情况下进行纠“左”的。当时也只认为在实际工

作中有错误，而没有认识到这是党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同时又以保护群众的积极性为理由，强调“气可鼓而不可泄”，这就使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工作不可能彻底。

四、党的庐山会议，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

〔党的庐山会议〕为了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从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去认识和纠正“左”的错误，党中央于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在江西庐山连续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这两次会议，通称为庐山会议。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开始时，毛泽东对形势作了基本的估计：“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题下，指出了在执行政策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他认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是没有做到综合平衡，虽然讲了要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要有几个并举，但实际上没有兼顾，工作中有盲目性。他要求把人民群众的衣、食、住、用、行五个问题首先解决好。为此，他提出要将过去以重、轻、农为序改成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计划，并强调重工业要为农业和轻工业服务。在7月10日的讲话中，他批评了有的同志讲的得不偿失的观点。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问题，经过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已经逐步解决，就全局而言，成绩与错误还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

会议在分组讨论时，一些同志认为前阶段虽然进行了纠正“左”倾错误的工作，但现在“左”的倾向仍是主要问

题，应该继续纠正。而另一些同志则护短，不愿多谈缺点和教训，不能虚心倾听对“大跃进”的比较切实的意见。由于第一阶段的讨论安排到7月15日结束，彭德怀言犹未尽，于是在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彭德怀的信，首先肯定了1958年的成绩，然后着重谈了如何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他认为，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他指出，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他还恳切地说：“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彭德怀这封信，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责任感，反映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要求，也是符合党的原则的。但是这封信被严重地误解了，庐山会议的主题迅速逆转，由纠“左”转向“反右”。

7月20日，毛泽东将彭德怀的信批发给会议讨论。7月23日，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讲话。他对彭德怀及支持彭德怀观点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这些同志的意见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悲观性，是在向党进攻，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并对信中的观点逐一作了批判。此后，会议方向急转直下，集中批判彭德怀等的所谓右倾，说他们是反毛泽东的，说他们组成了一个“军事俱乐部”，其性质是反党集团。

8月2日到16日，召开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全会开幕时，毛泽东讲了话。他说，我们反了九个月“左”倾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6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他还在一个批示中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8月19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同时还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说“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从而，把所谓“反右倾”斗争推向全党，使一大批党员、干部，特别是老党员、老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一些同志被错误地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庐山会议后期批判彭德怀等和进而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是建国以后我们党内政治生活中一次重大的失误。在政治上，它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错误地打击了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在组织上助长了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给野心家、阴谋家的活动造成可乘之机；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左”倾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造成了更严重的损失。

〔**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1955年以来，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

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使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

第一，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粮食严重短缺。1960年全国粮食（加上大豆）产量只有2870亿斤，比1957年的3901亿斤减产1000多亿斤。棉花产量1960年为2100万担，比1957年下降1100多万担。由于粮食供应不足，在一些地区还出现了浮肿病流行和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等严重现象。

第二，基本建设规模太大，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1960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从1957年的138亿元增加到384亿元。由于基建规模逐年猛增，在全部国民收入中，积累所占的比例，则由1957年的24.9%提高到1960年的39.6%。这样大的积累率，就挤了人民的消费，挤了人民的生活。

第三，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关系失调。主要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不协调。从1957年到1960年，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3倍，轻工业总产值只增加47%，而农业总产值却下降了23%。这样，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57年农业占43.3%，轻工业占31.2%，重工业占25.5%；到1960年，农业比重只占21.8%，轻工业占26.1%，重工业却占52.1%。由于重工业的大发展，职工人数剧增，由1957年的2451万人，增加到1960年的5000万人。工业规模过大，城镇人口过多，出现了粮食和其它副食品的需要同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的现象。职工数量剧增，国家发的工资多，购买力迅速增长，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又造成工业和农业之间关系的不协调，出现了市场供应严重紧张的局面。

第四，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从1958年到1960年，财政赤字达169亿元，多发了几十亿元货币。商品短缺，

物价上涨，人民实际生活水平明显下降。

第三节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制定和执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制定和贯彻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提出〕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迫使我们不得不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1960年7、8月间，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李富春等提出的《一九六〇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决定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尽量抽调劳动力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会上，李富春集中大家的意见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提高的问题。8月底，国家计委党组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时，周恩来表示赞成李富春的意见，并加入“充实”二字，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9月30日，党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发展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就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所谓调整，就是调整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基本政策，调整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主要是调整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所谓巩固，就是巩固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取得的经济成果。所谓充实，就是指以少量的投资来充实一些部门的生产能力，使其成龙配套，以便收到更大的经济效益。所谓提高，就是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

〔继续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调整工作首先从农业开始，在1960年冬天就着手进行。

1960年11月3日，党中央发出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信中指出，在公社化初期产生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严重地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信中规定，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至少七年不变。信中还规定，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以及少扣多分，尽力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等。

中央指示下达后，得到广大干部和农民的普遍拥护，各地农村立即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重新开始了庐山会议以来一度中断了的纠正“左”倾错误的工作。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的报告》。报告根据当前的经济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指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必须更好地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的方针，争取农业丰收，特别是争取粮食的丰收。同时对各个部门各个方面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个方针是以调整为中心，其主要内容是搞好综合平衡，使农、轻、重之间、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趋于协调，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得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本着这种精神，报告提出了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对基本建设投资作了调整。全会同意这个报告，这就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

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在全会上，毛泽东反复强调了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做工作要有三条，一是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这里，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他提出，1961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全会以后，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深入工厂、农村进行典型调查。并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把深入基层，亲身进行系统的典型调查，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党中央先后制定和发布了各方面的工作条例。

1961年3月，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以后，党中央对这个文件又作了进一步的修订，形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决定取消分配方面的供给部分，停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等，在纠正平均主义方面跃进了一大步。1961年7月，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在此期间，党中央还先后制定或批转了《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林业十八条》、《科研十四条》、《高教六十条》、《中学教育五十条》、《小学教育四十条》以及《文艺十条》等各方面的工作条例。这些条例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至今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二、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来，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广大党员和干部对“左”的错误的认

识进了一步，在调整国民经济工作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党内仍有一部分干部对于困难形势估计不足，对于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不够果断坚决。工业战线的调整工作，进度缓慢，收效不大。为了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的认识，采取有力的措施，进一步扭转困难的经济形势，1961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7000多人参加，所以又称七千人大会。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提出一个书面报告并讲了话。

刘少奇在书面报告和讲话中，在肯定成就的前提下明确指出，这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有四条：第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的现象。第二，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曾经对集体所有制的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这样，就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它平均主义的错误。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犯了急于把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错误。第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的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第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的情况，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也加重了

农业生产的困难。

至于产生上述缺点错误的原因，报告认为，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的讲话，突出地强调和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在讲话中，毛泽东对几年来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2月6日，邓小平在大会上讲到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必须注意健全党的生活时，他指出：这几年，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有了很大的削弱，“有很多事情，形式上似乎比过去民主，但在实际上，命令主义、少数人或个人独断专横的现象却是十分严重的。”他强调，要把我们党的老传统真正地恢复和发扬起来，党的各级领导同志的态度是很重要的。他还提出：对于我们党的各级领导人，应该有监督。最重要的监督是来自党委本身，或者书记处本身，或者常委本身。他提议，把领导人的主要的小组生活，放到党委会去，或者放到书记处去，或者放到常委会去。在常委会里面，应该有那么一段时间交交心，真正造成一个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

2月7日，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他分析了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主要困难，提出了克服这些困难的主要办法。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是八大以后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它对于统一全党思想，纠正“大跃进”以来经

济工作中“左”的错误，进一步动员和组织全党和全国人民全面贯彻八字方针，克服经济困难，起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大会仍然存在不足之处：

第一，大会仍然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认为1958年以来的错误是执行中的问题，是在某些问题上犯了错误。由于大会未能从根本指导思想上认识“左”的错误，因而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纠正实际工作中的错误。

第二，大会要求对1959年庐山会议后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平反，但却毫无理由地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四人除外。对反右派中的问题，虽然已经提出，却没有纠正。因而，对阶级斗争扩大化中的错误，不可能进行认真的清理。

第三，林彪在会上抵制和阻挠会议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他别有用心地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并且反复强调，事情出了毛病，造成了困难，是因为“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他的讲话，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大会气氛很不协调，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纠正错误，吸取经验教训。

〔西楼会议和五月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对于纠正“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起了积极的作用，对于调整国民经济的迫切性的认识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对当时国内经济困难的严重程度，认识上并未取得一致。为了进一步统一党内对当时经济的认识，全面贯彻八字方针，1962年2月，由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了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西楼会议。会议讨论了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

经济形势的问题。陈云作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陈云指出，当前的经济情况是困难的，类似非常时期：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减产；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城市人民生活下降，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陈云在讲话中同时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办法：第一，把10年经济计划分为两个阶段，前5年是恢复阶段，后5年是发展阶段。农业的恢复大约要3、5年，在这个时间内，工业要放慢速度，进行调整和恢复。第二，实行“精兵简政”，减少城市人口。第三，要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如严格现金管理，节约现金支出，增产人民急需商品，增加几种高价商品等等。第四，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第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集中用于农业增产。第六，把计划委员会的工作注意力，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

1962年5月7日至11日，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又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会后，中央批发了这个报告。

会议进一步分析了当时国民经济的形势，认为我国国民经济仍处于一个非常时期，严重的困难还没有过去。而要克服困难，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调整要成为一个阶段。只有敢于承认困难，迎着困难上，这才是真正的勇敢，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气概。

会议在正确分析经济形势的基础上，作出了大幅度调整

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确定了一系列有关调整工作的政策和措施。

西楼会议和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对于推进全面调整国民经济，使国民经济摆脱困境，走上正确的轨道，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国民经济全面调整，经济形势明显好转〕西楼会议和五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有力的措施，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工作在全国范围展开，其主要措施是：

第一，进一步减少城镇人口，精简职工。党中央决定，在1961年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人，精简职工870万人的基础上，用两年的时间，再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人，精简职工1000万人以上。广大职工体谅国家的困难，积极响应号召。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简了职工1887万人。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人。采取这次措施的结果，既缓和了粮食供应的紧张状态，又充实了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对于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基建战线。1960年基本建设投资为384亿元，1961年减到123亿元，1962年又大幅度地降为67亿元。这样，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也相应地得到调整。1962年的积累从1960年的39.6%，下降为10.4%。由于许多基建工程下马，就有可能腾出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加强农业和轻工业战线，改善人民生活，使比例关系逐步协调起来。

第三，缩短重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除采掘和采伐工业等薄弱环节需要充实外，许多部门都有计

划地降低了发展速度。钢铁生产由1960年的1866万吨，降为1962年的667万吨。全国一大批县以上的国营工业企业实行关、停、并、转。1961年至1962年底，这类企业共减少了43700个。

第四，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大力发展农业。首先，通过压缩城镇人口和停止一些非急需的农村基建工程，使大批劳动力返回农业生产第一线。1962年，农村劳动力比1958年增加了5786万人，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其次，大量供应农村急需的物质，满足农村制造小农具的需要。工业也积极增产支农产品，大量供应农村。国家还减少了粮食征购量，并大幅度地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增加农村社队急需贷款。这些措施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五，充实轻工业，保住石油工业。在轻工业方面，除了恢复传统手工业和一般轻工业外，还发展了洗衣粉、塑料、化学纤维工业。在重工业方面，则保住了石油工业发展的需要。原油产量比1960年略有提高。

第六，稳定市场，回笼货币，消灭财政赤字。为此，采取了既稳重又积极的政策。一是大力压缩财政支出，特别是基本建设和各项事业支出；二是清仓查库、处理库存积压，包括机关招待所的物资；三是在坚决稳住粮、油、盐、肉、菜、布、煤等18种基本生活必须品价格的基础上，继续对10种商品（如糖果、糕点、自行车、饭馆饮食等）实行高价政策；四是坚决打击投机倒把活动。

在采取以上经济措施的同时，党中央还采取许多措施，在政治上也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第一，加速进行甄别平反。1962年4月，党中央发出

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对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被批判和处分错了的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平反。

第二，给“右派分子”摘掉帽子。在此期间，积极进行了为右派分子摘帽的工作，到1964年，共分5批为30万左右的“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

第三，落实知识分子政策。1962年3月，国家科委在广州召开了科学工作会议，同时还在广州召开了戏剧创作会议。周恩来、陈毅相继在会上作报告，肯定建国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大部分已有根本性转变和极大进步，重新肯定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人民的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国家的主人翁。这就是著名的“脱帽加冕”——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

由于以上方面的政策和措施的贯彻执行，加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从政治上保证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

党中央在经济上、政治上进行的调整，使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迅速取得了成效。到1962年，农业生产改变了前三年连续下降的状况，开始回升。1962年与1961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增长6.2%；粮食增产1250万吨，总产量达到16000万吨；油料增产10.5%，总产量达到200万吨。工业生产特别是轻工业生产，1962年底也开始出现了转机。国家财政实现了收支平衡，货币发行过多的现象也有所改变。城乡人民生活也开始有所好转。总之，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

三、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正当全党坚决贯彻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的时候，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党内各方面意见的分歧日益暴露出来，使纠“左”的进程又发生了曲折。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党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在此以前，党中央先在北戴河、后在北京开了近两个月的工作会议，为十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准备。

十中全会就国民经济的调整继续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并制定和通过了有关文件，如：《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等。全会指出，我国人民当前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地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全会还强调指出，我国国民经济情况已经开始好转，但目前还存在困难，需要全党团结一致，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继续调整国民经济。这些都是正确的，对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八届十中全会的主题是阶级斗争问题。会议不仅错误地批判了一些同志，而且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和理论化了。

八届十中全会批判了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

所谓“黑暗风”。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对调整时期的形势，采取了充分估计困难和认真地对待困难的正确态度。但是全会却错误地认为这是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是刮“黑暗风”。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现在有些人把我们的形势说成一片黑暗，他们思想混乱，丧失信心，看不见光明。

所谓“单干风”。邓子恢针对农业集体经济中存在的平均主义弊端，在一些单位宣传了实行有利于巩固集体经济的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严格的生产责任制的主张。但是全会却错误地把合理的生产管理责任制说成是闹“单干风”，是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黑风”。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这股风越到上层就越大。

所谓“翻案风”。1962年6月16日，彭德怀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了长篇申诉信，说明“组织反党小集团”、“里通外国”等均属强加于他的罪名。毛泽东说，这是“翻案”。他还说：19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对彭德怀不能平反。他还提出：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还是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作家李建彤写的历史传记小说《刘志丹》，被康生诬之为高岗翻案，是“反党小说”。毛泽东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个大发明”。此案株连许多人。

十中全会接受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错误论断。在全会的公报中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

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必须看到，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时，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时考虑到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斗争给经济工作带来的干扰，毛泽东采纳了刘少奇等的意见，在会上提出了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指出，“要把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样，就使全会结束后，经济调整工作能够继续按照原定计划进行。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1963年到1966年春，党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2月，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推荐了湖南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河北保定地区“小四清”（即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的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次会议确定，在农村普遍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

1963年5月，党中央在杭州召开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前十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认为农村中的“四清”运动和城市中

的“五反”运动，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9月，党中央又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后十条”一方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另一方面又指出了团结95%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的重要性。此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分别派出大批工作队，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5年1月，党中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二十三条”要求看待干部要一分为二，区别对待。但是，又把“四清”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左”的观点。

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党发动和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群众运动，这次运动，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在指导思想上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了，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简单地看成了阶级斗争，所以使“左”的错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但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上的“左”的东西又有发展，更主要是政治上的“左”的东西有很大发展，表现在：

第一，错误地估计了阶级斗争的形势。认为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已经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1964年5月召开的党中央工作会议上，认为农村1/3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对许多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失去信任，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造成了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打击过重的错误。

第二，错误地提出了关于阶级斗争的新概念。一是认为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二是认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所谓“走资派”的提法为后来把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党的各级领导核心提供了依据，成为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

不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只是在局部地区开展，而且是有领导地分期分批地进行的。因而还没有发展成为全局性的错误。

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党对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政治形势也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进行了一系列错误的阶级斗争实践。从批判《刘志丹》小说开始，斗争逐步扩大到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教育学、文学、艺术各个部门。一大批学术界的专家、学者遭到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

四、调整国民经济的胜利完成

〔调整国民经济的胜利完成〕 阶级斗争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虽然对经济工作产生不利的影响，但全党和全国人民仍然把主要精力用在继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上。在1962年国民经济有了明显好转的基础上，1963年9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再用三年时间，继续贯彻“八字”方针的工作，作为今后发展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除继续加强对农业的支援，改善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之外，重点是要求工业的各个部门认真做好现有生产能力的填平补齐、成龙配套以及更新设备等工作。同时改善企

业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和开展专业化协作等。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1963年出现了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的局面。到1964年，就基本上完成了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要争取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这个宏伟目标的提出，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和全国人民。

〔国民经济的新景象〕 经过1965年一年的继续调整，工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全面地完成了。

第一，工农业生产接近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农、轻、重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平衡发展。1963年至1965年，工农业生产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7%，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每年均增长10.9%，仅次于建国后恢复时期每年平均增长21.1%的速度。其中农业每年平均增长11.1%，工业每年平均增长17.9%。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每年平均增长14.9%，轻工业每年平均增长21.2%。经过5年调整，农、轻、重比例关系发生了如下变化：1960年农业占21.8%，轻工业占26.1%，重工业高达52.1%；1965年农业占37.3%，轻工业占32.3%，重工业下降为30.4%。上述变化表明，三者比例关系基本恢复正常。

第二，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基本恢复正常，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提高。1965年，我国国民总收入达到1387亿元，比

1962年的924亿元增长了50.3%，比1957年的908亿元增长了52.7%。1965年的积累率从1962年的10.4%调整到27.1%，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恢复正常。

1965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为125元，比1962年增加8元，其中农民为100元，增加12元。职工为237元，增加11元。粮食、棉布、食油、猪肉等人民生活主要消费品的供应已接近1957年的水平。

第三，财政收支平衡，市场供应显著改善，物价稳定，对外贸易有所发展。1965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657亿元，比1962年增加了53亿元，比1957年增加了183亿元。各种副食品、工业日用品和人民生活必需品，供应比较充足，物价稳定，高价商品都已改为平价，集市贸易价格在许多地方已接近国家牌价。对外贸易方面，进出口平衡，出口额中工业产品比重逐步提高。

第四，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有了新发展，科技水平也有很大提高。1965年，全国高等学校在校人数为67.4万人，比1957年增加了23万人。各类中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近1000万人。医院床位72.8万张，比1962年增加7万张。体育队伍的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仅在1965年打破世界记录的就有28项。科学研究突飞猛进，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总之，1965年，我国生产欣欣向荣，市场活跃，人民高兴。

〔取得了可贵的的经验〕党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里，虽然遭受过严重的挫折，但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

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党在曲折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些经验主要有：

第一，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国内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而不能因为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而离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重点。

第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努力做到各经济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发展。不能单凭主观愿望，盲目追求高指标、高积累。不能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而忽视了农业，挤了轻工业。如果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就会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损失。

第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有利生产的发展。如果离开我国生产力的现状，轻率地改变生产关系，就会打击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地破坏生产力。

第四，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绝不能将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绝对化、扩大化。否则必将干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干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第五，在党的领导方面，必须严格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反对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必须始终保持谦虚谨慎、实

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绝不能因为胜利而骄傲自满，搞主观主义，无视客观规律。

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及其结束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全国大动乱

〔“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我国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之后，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进入新的发展历史时期，却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即“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其直接的原因：

第一，由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的错误的逐步发展的结果。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犯了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轻率地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到1959年7、8月召开的党的庐山会议上，进一步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党内，形成了党内阶级斗争的观点。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而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观点。到了1966年，终于形成了这样的论点：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

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进行斗争，才能夺回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文化大革命”正是在这样错误的理论指导下，混淆是非，混淆敌我的情况下发动的。

第二，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作风的逐步发展，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削弱以至破坏，使“文化大革命”的发生难以避免。由于历史原因，毛泽东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信赖、崇敬和爱戴。但是，他在党取得一系列巨大胜利面前不谨慎了，骄傲了，而且越来越欣赏日益泛滥的对他的个人崇拜。他逐渐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第三，林彪、江青、康生一伙野心家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错误，导致了“文化大革命”长期内乱。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林彪、江青、康生一伙，鼓吹“左”的理论，助长党内“左”倾情绪，蓄意制造个人崇拜，神化党的领袖。他们还凭借自己的地位和权势，诬陷干部，制造政治冤案。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林彪、江青等人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的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

当然，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还有其复杂的社会

历史原因。这主要是：党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经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消极影响；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没有肃清；没有建立一套完善的民主制度，权力过分集中，党内民主和政治生活不健全等等。

〔**“文化大革命”的准备**〕“文化大革命”的发动经过了一个酝酿准备的过程。

1965年11月10日，经过毛泽东批准，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文章发表后，遭到历史学界，文艺界及其他各界的强烈反对。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对于姚文元文章也表示了很大的不满。但毛泽东却认为姚文元的文章“很好，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把《海瑞罢官》同彭德怀问题联系起来，在全国掀起了批判的浪潮。为了解决学术批判中出现的这种不正常情况，1966年2月，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党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试图对文化思想方面“左”的偏向加以适当的限制。可是，这个《提纲》很快被否定了。与此同时，林彪勾结江青炮制了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全面否定建国以来文艺界的成绩，认为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个《纪要》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发向全党。这就逐步加重了“左”倾错误的程度，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党的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1966年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错误地揭发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的所谓“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所担任的领导职务，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审查他们的“反党活动”。这样，彭、罗、陆、杨被作为“反党集团”首先打倒了，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在组织上扫除了一大“障碍”。

5月16日，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对党内国内政治形势作了完全违反实际的错误估量，断言已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揭露、彻底批判，“清洗这些人”。《五·一六通知》是集中代表“左”倾方针的文件。

会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隶属于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诬陷；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这就在各地，首先是许多大、中学校和党、政文化机关掀起了“造反”浪潮，发生许多混乱现象。因为毛泽东不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但毛泽东认为工作组对“文化大革命”起

“坏作用，阻碍运动”。中央于7月底决定撤销工作组。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于北京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

会议一开始就被极左的气氛所笼罩，刘少奇在工作报告中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与会不少同志纷纷检查自己“跟不上形势”，“仍然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等。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虽然没有点名，但明显是针对刘少奇的。会议就转为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揭发批判”。

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规定：“文化大革命”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力量，是“左”派。“十六条”强调，要“敢字当头”，“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十六条”虽然对各级党委提出坚持正确领导的要求，但对于如何实现党的领导，没有具体的规定。与之相反，“十六条”却规定群众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是“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这实际上是明文规定把党的领导排除在运动之外。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及这两个会议相继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批判”、“揪斗”、“打倒”之风刮遍各地，全国陷入了严重的混乱和恐怖之中。

〔上海“一月风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二月抗

争]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社论根据毛泽东谈话内容，提出1967年“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张春桥、姚文元乘机首先在上海发难，刮起旨在夺权的“一月风暴”。1月4日，张、姚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身分来到上海。同日，夺了上海文汇报的权。1月5日夺了解放日报的权。1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又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对此夺权行为，毛泽东加以肯定，认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1月11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发出贺电，赞扬他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1月22日，张春桥在上海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我们对所有权都要夺”。1月23日，林彪在确定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方针时说：“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此后，全面掀起了夺权高潮，许多地方并发展武斗，造成了许多地方党政领导机构陷于瘫痪、半瘫痪，社会秩序和工农业生产进一步遭到破坏的严重局面。

当党和国家处于危难的关键时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挺身而出，于2月14日和1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政治局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问题，对林彪、江青、康生、陈

伯达等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叶剑英说：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谭震林说：你们的目的是，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又一个打光。他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会后，谭震林写信怒斥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并表示：“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这些老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发表意见的方式也是符合组织原则的。然而，这些老同志伸张正义的行为，却受到毛泽东严厉的指责，说他们是搞翻案，搞复辟。从2月25日起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会”。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围攻、批斗这些老同志。同时，林彪、江青等人借机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便实际上停止了活动，完全被中央文革小组所取代。

〔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全会是在许多中央委员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一些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继续遭受诬陷性批判的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会议主要议题是通过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刘少奇本人，早在1966年冬即被当作“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直接控制和指挥下的专案组，采取刑讯逼供，制造伪证，栽赃陷害等非法手段，给刘少奇横加了“叛徒、内奸

工贼”等罪名。由于当时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和党内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况之下，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这就造成了全国最大的冤案。

全会另一项议程是围攻所谓“二月逆流”的老一辈革命家，给会议制造了极度紧张的气氛。

1969年4月1日至4月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是在党遭受“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尚未建立，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的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大会的议程是：林彪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在政治报告中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所谓经验。报告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规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并认为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报告还说，“文化大革命”“千真万确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并提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所谓“战斗任务”。党的九大通过了林彪的政治报告，从而进一步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

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对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了歪曲的阐述，去掉了有关党员权利的规定。更为严重的是这个党章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入“总纲”。这种指定接班人的作法，完全违背了党的组织原

则，是同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根本不相容的。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林彪、江青集团的一批骨干和亲信进入中央委员会。在九届一中全会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集团的主要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从而加强了他们在党中央的地位。

实践证明，党的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二、林彪反革命集团武装政变阴谋的被粉碎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 林彪集团抢班夺权的阴谋被揭露〕党的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积极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林彪反革命集团并不满足九大前后所攫取的很大一部分权力，而是担心江青、张春桥等人势力的发展会超过自己，因此急于抢班夺权。当时他们把设国家主席和“称天才”两个问题，作为夺权活动的两个基本策略。

1970年3月，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毛泽东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而林彪集团却认为这是争得国家主席职位，然后相机夺取党的最高权力的好机会。因此林彪带头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并假惺惺地声称要毛泽东再任国家主席。当林彪的意见被毛泽东否定后，他们一伙并不死心。叶群私下对吴法宪表示，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目的是他自己要当国家主席。为此，他们仍积极策划，伺机进攻。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党在庐山召开了九届二中

全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宣布了全会的三项议程：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家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可是林彪却不顾大会既定的议程，在会议的第一天突然发表讲话，以歌颂毛泽东为幌子，大讲天才问题。陈伯达、吴法宪等人按事先的密谋，分别在各组同时宣讲由陈伯达编选、经过林彪审定的“称天才”的材料。随后，又发出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从而破坏了会议的议程，制造了一场混乱。

毛泽东及时识破了林彪一伙的阴谋。25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的讲话，收回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地批评陈伯达，揭穿了“称天才”的骗局，给林彪集团以沉重打击。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夺权阴谋被挫败了。

〔**林彪集团反革命武装政变被粉碎**〕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在党内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被迫作了书面检查。在用“和平过渡的办法”“抢班夺权”的阴谋失败后，林彪集团加紧策划新的阴谋，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1970年10月，在林彪的策划下，组成了以林立果为头子的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取名为“联合舰队”。1971年2月，林彪派林立果到上海，召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于3月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取名为《“571工程”纪要》。《纪要》阴谋“利用特种手段”暗杀、爆炸等发动武装政变，以达到“夺取全国政权”或至少是制造“割据局面”的反革命目的。3月31日，林立果在上海召开有南京、上

海、杭州三地林彪集团骨干参加的秘密会议，确定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指挥班子和具体分工。

党中央根据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形势的发展，决定于1971年国庆节前后召开党的九届三中全会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林彪等人认为，“三中全会可能把林彪端出来”，“四届人大肯定又是一个大难关”。于是他们加紧策划反革命政变，阴谋杀害毛泽东。

1971年8月14日9月12日，毛泽东到南方巡视。巡视途中，毛泽东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一方面着重讲了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另一方面也多次点名批评林彪。这些南巡讲话被林彪集团得知后，他们知道夺权阴谋已被毛泽东觉察，便立即采取行动谋害毛泽东，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9月8日，林彪下达了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弛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立果、周宇弛对“联合舰队”骨干分子进行了具体部署，策划用多种手段谋害毛泽东。后来，只是由于毛泽东的警觉，于9月12日安全回到北京，才使他们的部署全部落空。

林彪集团谋杀毛泽东的计划失败后，准备南逃广州，图谋另立中央，实行割据。但是，他们这个阴谋，又很快为党中央所察觉。林彪感到阴谋败露，惊恐万状，遂于9月13日凌晨，带同叶群、林立果等少数死党，私乘飞机，仓惶北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汉。林彪集团的其他余党或自杀毙命，或束手就擒，一场反革命政变遂被彻底粉碎。

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

变事件的发生，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各方面工作的转机〕“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

在经济方面，着重抓了国民经济的整顿和发展的工作，使工农业生产逐步回升，经济形势有所好转。

周恩来一再提出要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革命与生产的关系，批判了认为抓生产就是“忽视政治”、“业务挂帅”的错误思想。他多次强调要把工农业生产搞上去，并提出一系列整顿国民经济的措施。在农业方面，强调必须贯彻执行关于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按劳分配的政策，等价交换的政策，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政策。以及不要把党的方针所提倡和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倾向来批判。在工业方面，要求加强企业的经营管理，建立和健全各种合理的规章制度，重视产品质量，重视和发挥老工人和技术人员的作用。

在政治方面，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为遭受打击和迫害的部分领导干部恢复了名誉，安排了工作。1971年11月，毛泽东为在所谓“二月逆流”中受到诬陷的老同志平了反。1972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为陈毅平了反。1973年3月，党中央通过毛泽东的建议，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在外交工作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

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打开了中断20多年之久的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9月，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华，达成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协议。1971、1972两年内，又有30多个国家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活动和成就，打开了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对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此期间，周恩来还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问题，他说：“否定一切，不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还尖锐地指出，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但是，由于这种正确的批判，触及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本质，立即遭到他们的反对和攻击。由于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这样，江青一伙乘机大反所谓“右倾回潮”。“左”倾错误不仅未能得到纠正，反而继续发展。

〔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了大会。大会的议程有三项：一、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二、王洪文代表党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选举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政治报告中批判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但却错误地认为“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大会选举中央委员195人，候补中央委员124人。一批久经考验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排斥和打击的老同志被选为中央委员。与此同时，江青集团的一大批骨干分子进入党的中央委员

会。在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康生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张春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此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加紧了他们的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三、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阴谋 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

〔“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组阁阴谋被挫败〕 1974年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党中央转发了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开始了由江青、王洪文等提出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江青等人企图利用“批林批孔”运动，打倒周恩来和一批中央领导人，实现由他们“组阁”执政的目的。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经过密谋策划，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于1974年1月24日和25日，在北京连续召开在京部队单位和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上万人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上，他们攻击诬蔑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会后，江青还以个人名义向部队和国家机关一些单位写信、送材料、煽风点火、制造事端，极力搞乱局势。他们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不批林，假批孔，用批周公、批宰相、批“现代大儒”等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同时，他们以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为名，大肆吹捧“女皇”，为江青一伙上台大造反革命舆论。

由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刚刚趋向好转的全国局势，又重新逆转。全国重新出现了大动乱的局面，逐渐有所

恢复和发展的国民经济再次受到破坏。

毛泽东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但在发觉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之后，又对他们进行了重要的批评和揭露。1974年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地提出了“四人帮”的问题。但是江青等人并不以此为诫，幡然改悔。1974年10月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四人帮”有预谋地在10月17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对邓小平等同志横加攻击。当晚，江青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共同密谋，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告状。在长沙，王洪文造谣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味道”，“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等，妄图阻挠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实现由他们阻阁的阴谋。毛泽东当即批评了王洪文，并明确表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仍由周恩来负责。11月12日，毛泽东在对江青的一封来信的批示中，直接批评了江青想要“组阁”的野心，说：“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

由于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由于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抵制，“四人帮”组阁阴谋被挫败。

〔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形势明显好转〕1975年1月8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全会闭幕后，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于1月13日至17日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带病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重申了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

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目标。大会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並任命邓小平等12人为国务院副总理。四届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使“四人帮”组阁的阴谋未能得逞。

四届人大闭幕后，周恩来病重住院治疗。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努力排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提出要以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为纲，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全国形势明显好转。

鉴于铁路运输是当时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3月5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决定要求全国铁路实行以铁道部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确保运输安全正点。整顿铁路运输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对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坚决打击，依法惩办。全国广大铁路职工在党的领导下，按照中央决定进行整顿，效果显著。许多铁路长期堵塞不畅的局面迅速改观，铁路运输节节上升。

在铁路工作进行整顿的同时，党中央还发出一系列重要文件，采取有效措施，对工业、农业、财贸、教育和军队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6、7月间，中央军委召开了扩大会议，提出了对军队整顿的任务和要求，这对于“四人帮”篡党乱军阴谋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经过各方面的整顿，各个领域发生明显的变化。工业生产改变了停滞下降的局面，得到迅速回升；农村形势有了明显好转，农业生产获得了好收成；军队建设得到加强，军工企业的工作有了明显改进；科学、教育、

文艺等领域开始打破万马齐喑、严重混乱的局面，出现了新的气象。这充分说明邓小平当时坚持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有效的。但可惜好景不长，这种局面又一次被突然打断了。

邓小平对各方面工作的整顿，实际上是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他于1975年底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不甘心组阁阴谋失败的“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的错误，乘机煽风点火，进行篡党夺权的一系列反革命活动。在政治上，他们提出了“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的公式。胡说，现在革命对象就是“民主派”，妄图整垮一批中央和地方的负责人。在经济上，他们把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诬蔑为“唯生产力论”，竭力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妄图搞乱全国。他们全盘否定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甚至把对各条战线的整顿，诬蔑为“全面复辟”。在这个运动的冲击下，已经开始取得成效的整顿工作停下来了，已经好转的正常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又被打乱了，全国再次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天安门事件”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周恩来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的逝世，使全国人民无限悲痛。广大群众以各种方式开展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但却遭到“四人帮”的无理的压制。人民群众忍无可忍，利用清明节缅怀革命先烈的传统习俗，从3月底开始，自发地集合到首都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朗诵诗词，发表演说，抒发对周恩来的悼念之情，痛斥“四人帮”的倒行逆

施。在南京、杭州、郑州、太原等地也爆发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4月4日是清明节，首都人民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成千上万的群众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就在当天深夜，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被洗劫一空，一些守卫花圈的群众被抓走。5日，人民群众继续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悼念周恩来、抗议“四人帮”的声势越来越大。但是群众的革命行动却被错误地宣布为“反革命事件”。5日晚，大量手持铁棍、大棒的人员，野蛮殴打在天安门广场上悼念周恩来的人群，许多青年遭到非法逮捕，广大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活动，遭到残酷的镇压。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同时，“四人帮”还捏造各种罪名，认定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四人帮”捏造的事实，通过决议，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矛盾”，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同时，还作出了由华国锋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以“四·五”为中心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活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它显示了人民群众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大无畏的英勇气概。这次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天安门事件后，党和人民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矛盾和斗争更加激化和尖锐。1976年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与世长辞。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

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逝世后，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团却迫不及待地加紧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就在毛泽东逝世的当天，他们盗用党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向他们报告工作，企图切断党中央与全国各地的联系。他们唆使一些人给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书”。他们突击整理诬蔑党、政、军负责人的黑材料。他们伪造“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公开发出夺权的信号。他们秘密串连，策划武装叛乱，甚至公开叫嚣要人们准备迎接由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之后的所谓“盛大的节日”。

在“四人帮”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紧急关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江青反革命集团遂被粉碎。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使我们的国家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了很大的不幸，也给全党和全国人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教训。

第一，必须正确认识 and 对待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必须彻底抛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阶级斗争虽然还将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

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对于作为残存形态的阶级斗争和其它矛盾，必须通过法律程序来处理，保持为现代化建设所必须的长期的社会政治稳定。不应该人为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更不需要“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第二，必须正确理解和处理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对领袖人物的神化，必然损害党和国家的正常政治生活，导致指导方针的错误，为少数阴谋家、野心家所利用。因此，必须坚持实行集体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方针。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决不容许任何人凌驾于党组织和群众之上。

第三，必须进一步健全党的纪律和社会主义法制，切实保障全体党员和全体公民的民主权利，使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在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有不受党纪约束的特殊党员和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绝不允许任何人有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权。必须使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具有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神圣权威。

第四，必须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进程表明：绝大多数党的领导成员、各级干部和广大人民，他们都是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特别是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斗争和抵制。正是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共同斗争，才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并终于结束了十年内

乱。正是他们的共同斗争，才使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制度没有改变性质。

思考题

1.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它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意义是什么？
2. 为什么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中成绩仍然是主导方面？有什么主要的经验教训？
3. 从“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应该吸取哪些主要教训？

阅读书目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6至24条）。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六、七部分）。

第八章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第一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伟大的历史转折

一、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

〔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标志“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当时，全党面临的中心任务是：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 and 行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整顿和恢复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把生产建设搞上去。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使人民看到了希望，增强了信心和力量，一致行动起来，深入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党中央分三批下达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证材料，公布了毛泽东在世时批评他们的多次讲话。广大干部和群众揭露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揭发了他们残酷打击迫害干部、党员和群众的严重罪行，批判了他们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全面专政”、“唯生产力论”、“文艺黑线专政论”及否定教育战线十七年的伟大成绩的“两个估计”等谬论。在清查他们帮派体

系的基础上，党中央着手调整和加强了一些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机关、国家机关的领导班子，并开始了对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

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累累，最终受到历史公正的审判。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法庭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力终身；对王洪文、姚文元、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也分别判刑，给予法律制裁。

〔社会主义建设决策的失误〕在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同时，全国人民在努力恢复被破坏的国民经济，1977年工业生产已开始回升，全国工业总产值达3728亿元，比1976年增长14.3%，在80种主要产品中有65种完成和超额完成了计划，有52种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财政收入较大幅度增长，收支相抵，余30亿元，扭转了连续三年支大于收的状况。有3000多万职工调整了工资，市场供应紧张的局面有了好转，人民生活有了改善。

但是，在国民经济刚刚取得较快恢复的形势面前，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某些领导对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估计不足，还没有摆脱过去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影响，提出了不切实际的国民经济大发展的计划。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的报告中提出：到1985年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原油产量达到2.5亿吨，计划兴建和扩建120个大项目，其中有30个大电站、8个大型煤炭基地、10个大油气田、10个大钢铁基地、9个大有色金属基地、10个大化纤厂、10个大石油化工厂、10几个大化肥厂，以及新建续建6

条铁路干线和几个大港口等。这些计划和指标，脱离了中国的国情，超过了国家的财力、物力条件，特别是许多重大项目是准备依靠引进大量的资金、设备来实现的，远远超过了我国实际的支付能力。这么多项目同时上马，到1982年前后会形成一个全面建设的高峰，这对整个国家建设和经济形势将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力，是很难承受的。

〔对“两个凡是”的批判〕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广大群众和干部纷纷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强烈要求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但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提出：“目前主要是批‘四人帮’，也要批邓，一定要注意，毛主席批过的、讲过的不能批”。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经汪东兴决定被华国锋批准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在这篇社论中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其实质是要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延续下来，是要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最早起来批判“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是邓小平。他在1977年4月10日给中共中央写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他指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封信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即如何正确地对待毛泽东在晚年所作出的指示和决策，是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还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呢？“两个凡是”是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晚年的指示和决策。邓小平针锋相对地提出必须“用

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的一切工作，而不能用不准确的或只适合于一时一地的一些指示和决定来指导工作。这意见是完全正确的。5月3日，中共中央批发了这封信。在党内传达后，这封信就成了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

【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在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在华国锋“两个凡是”错误方针指导下，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提出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因此，破除这条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已成为党内斗争的焦点。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针对“两个凡是”开展起来的。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揭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序幕。文章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阐明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文章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文章发表后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和赞同。此后，报刊上开始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哲学界、理论界和各方面的群众、干部，许多省、市、自治区及大军区领导机关的负责人纷纷发表意见，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然而，这场大讨论受到了华国锋的压制和其它坚持“两个凡是”方针的人的非难，给这场讨论扣上了“丢刀子”、“砍旗子”等大帽子。但是，邓小平、叶剑英、李

先念、陈云、胡耀邦等同志积极地支持这场论争。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肯定了这个讨论，批评了“两个凡是”的观点，重新申明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思想路线。这一大讨论在全国普遍展开，形成了延安整风以来的又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

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对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端正思想路线，从过去长期存在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具有重要意义；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清除了思想障碍；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为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创造了条件。

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工作重点的转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中央在北京举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全会召开前，党中央召开了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为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

全会决定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会议着重讨论了农业问题，一致认为全党必须集中力量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试行。全

会经过讨论，原则上同意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全会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全会决定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必须加强民主，加强党的领导机构，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选举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及常务委员，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

〔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充分发扬了延安整风精神，解放思想，畅所欲言，恢复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解决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主要是：

会议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即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全会坚决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恢复了党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从根本上恢复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为全面地、认真地纠正过去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奠定了思想基础。

会议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错误口号，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确立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且立即动员起来，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会议提出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的严重

失调，要采取措施，消除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混乱现象，妥善解决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的问题，尤其是要集中精力把农业生产搞上去。

会议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决定在组织上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反对突出个人和宣传个人崇拜，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建立党内监督制度，保障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和实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从此，结束了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使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开始了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改革的新时期。

〔国民经济的调整〕为了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解决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失调问题，1979年4月党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提出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

调整，即调整国民经济中农、轻、重、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由于我们对经济比例失调状况认识不足，经济发展的步子迈的不稳，急于求成，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生产指标过高，引进国外技术设备过急，超过了物力、财力的条件，对此必须加以调整，使国民经济纳入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轨道上来。

改革，即改革现行的不合理的经济管理体制。从农村到城市逐步实行全面改革。尤其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使企业的产、供、销密切结合，要改变“大而全”“小而全”的状

况，破除“大锅饭”，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

整顿，即对管理混乱的企业分批分期有计划地进行全面整顿，完善经济责任制，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提高经济效益。

提高，即大大提高生产水平、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要提高产品的质量、增加产品品种，提高劳动生产率，要提高组织和领导社会化大生产的能力。

从1979年起到1982年，进行了四年的调整工作，使农业与工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积累与消费、基本建设等方面的比例关系趋于协调，扭转了长期以来重工业发展过快、轻工业落后、农业停滞不前的局面。但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积累的问题不可能在四年中完全得到解决，所以党中央决定在1981年到1985年的“六五”期间要继续贯彻调整的八字方针。

〔纠正“左”倾错误平反冤假错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对党历史上的“左”倾错误和大量的冤假错案进行了纠正和平反工作。主要是：

为原地主、富农分子改定成分。明确规定，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富、反、坏分子，经群众评审，县一级政府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社员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子女，其本人成分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它社员一样的待遇。

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小业主及其它个体经营者从私营资本家的行列中区别出来。凡其本人在企业当中和工人一样从事劳动的，成分为“工人”，是干部的为“干部”，政治上与企业的工人、干部一视同仁，可以参加工会。从1979年至1980年春，全国有70万人从工商业资本家中区别出

来，基本上完成了这项工作。

对原工商业者落实政策。从1979年7月起，原工商业者在填写现在的成分时，是干部就填“干部”，和工人一起参加劳动就填“工人”，在政治上与工人、干部一视同仁；经过职工讨论同意，可以吸收参加工会，与其它职工一样，安排使用；从1980年1月起，原工商业者的病假、医疗、退休、退职、死亡以及其它生活福利待遇，分别按干部、工人办法办理。

改正错划右派分子的错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运动严重地估计了阶级斗争形势，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大量地错划了右派分子。党中央决定给尚未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同时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改正错划的，并对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上进行妥善安置。

平反冤假错案。由于党的“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夺权，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这个问题不解决，会严重阻碍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开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组织和动员了几十万干部，广泛深入地调查研究，对冤假错案坚决平反。据统计全国有290万人得到了平反昭雪，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其中全国闻名的“61个叛徒集团案件”、“习仲勋反党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中宣部阎王殿案件”、“旧文化部案件”、“三家村”、“杨、余、傅反革命事件”等案件均彻底平反，特别是1980年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表达了亿万人民的心声。

在大量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党中央又进一步落实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以及知识分子政策，使统一战线工作有了进

一步发展。这一切都极大地巩固了社会安定，调动了全党和各族人民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从建国以来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的农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在我国农业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尤其在指导方针上存在“左”的错误。在所有制上，片面强调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在经营管理上搞“一刀切”、“大呼隆”，否定必要的生产责任制；在劳动报酬上“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等。这些都脱离了我国的国情和农村的实际，违反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这一客观规律的要求。加上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更加严重地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越来越缓慢，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30年的经验教训使我们党深刻认识到，要调动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实行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底，党中央先后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制定推行了一系列正确发展农村经济的方针政策。在这一时期，国家主要采取了三项重大的改革政策：一是坚持土地等主要农业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实行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把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承包给农民家庭分散经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二是取消了原来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政社合一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恢复了乡村政权组织。原来的人民公社改为乡人民政府，大队改为村民委员会，

生产队改为村民小组。三是国家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1979年平均提高20.1%，1980年又提高了8.1%，以后平均每年都提高3%左右。这三项改革政策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八亿农民的积极性。到1984年底，全国已有1.8亿农户实行不同形式的家庭承包，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8%。198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4亿吨，全国人均占有粮食400公斤左右，接近世界人均占有粮食的水平，绝大部分农民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突破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三.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和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党中央全面纠正“左”倾错误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也是全党思想上统一认识的过程。为全面总结历史经验，进一步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集中力量进行四化建设，党中央在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召开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个“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三十二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科学地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又充分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前进的方向，确定了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奋斗目标。

“决议”的作出，对于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同心同德地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起了巨大的作用，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正确地解决历史问题，勇于纠正错误，不断奋进的崇高精神。因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和《决议》的发表，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

〔“决议”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评价〕“决议”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决议”回顾了建国前28年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光辉历史，指出在28年历史发展转折的重要关头，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起了扭转乾坤的作用，表现了杰出的领导才能和领导艺术。

“决议”在总结建国以来32年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分清了毛泽东的功和过。指出：“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但是就他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中国人民始

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决议”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指出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以它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主要内容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六个方面独创性的理论。而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三个基本方面，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也就是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

第二节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纲领

一、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国共产党在1982年9月1日至11日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在各条战线切实地纠正了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后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的使命，就是要通过对过去六年历史性胜利的总结，为进一步肃清十年内乱所遗留的消极后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确定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战略步骤和方针政策。

党的十二大宣布：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逐步实现这伟大任务，邓小平在大会的开幕词中明确地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应走的道路。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同时还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

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邓小平的重要论述是这次大会总的指导思想。

[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根据党的十二大的任务，胡耀邦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他说：“在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各项任务中，首要的任务是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推向前进。为此，党实事求是地确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一系列正确方针。”即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纲领。

这纲领是：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实现了这个目标，我国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将居于世界前列，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将取得重大进展，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将大为增强。

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是,在今后二十年内必须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抓住几个根本环节:解决好农业问题,加强国民经济的基础;加强能源开发,大力节约能源消耗;大力加强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的建设;加强和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

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党中央从我国实际出发,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分两步走的战略步骤,即:从1981年起的前10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振兴时期,最终达到我们的战略目标。

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新时期的总任务,以及领导人民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伟大纲领,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前进的方向和奋斗的伟大目标。它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上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开展整党, 加强党的建设**〕由于十年内乱的流毒还没有完全肃清,在新的历史时期。各种剥削阶级思想对党员的腐蚀作用有所增长,党内确实存在着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的问题,党风还没有根本好转。党中央决定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用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的整顿。1983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二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整党的决定》,确定从1983年冬季开始全面整党。

这次整党的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统一思想,就是进一步实现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纠正一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整顿作风,就

是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纠正各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反对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加强纪律，就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派性、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改变党组织的软弱涣散状况。纯洁组织，就是按照党章规定，把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清理出来，开除出党。

这次整党的步骤是：从中央到基层组织，自上而下，分期分批地整顿。每个单位的党组织的整顿，也要自上而下，先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后党员群众。

整党的基本方法是：在认真学习文件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是非，纠正错误，纯洁组织。在整党中，自始至终贯彻思想教育，着眼于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觉悟。

全国参加整党的有4000万党员，其中有900多万干部，近250万个基层和基层以上的党组织。至1986年，历时三年半的全党整党工作宣告基本结束。经过整党，认真清理了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等“三种人”，纯洁了党的组织。经过整党，恢复和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战斗力，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

二、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1983年6月6日至2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家决算，选举和决定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员，组成新的一届国家领导机构。

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对过去五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变化作了概括：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加强了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扭转了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所造成的不稳定状态，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摆脱了农业长期徘徊不前的困境，实现了持续的全面高涨；扭转了消费品工业长期落后的局面，重工业逐步端正服务方向，整个工业在调整中持续增长；城乡经济市场出现了建国以来少有的繁荣景象，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有了很大的发展，经济体制进行了初步的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和有益的经验；长期存在的轻视知识和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逐步得到了纠正，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城乡人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国防建设和国防力量有了新的加强，保卫了祖国的独立和安全；坚持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取得了外交工作的新成就。

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出了今后五年的主要任务，即：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制定和执行第七个五年计划，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实现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斗争中取得重大胜利。

根据这任务，大会对今后五年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教育科技文化建设、政法工作、外交工作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和部署。今后五年，首先要保证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生产相互协调地向前发展；必须大力加强能源、交通等方面的重点建设，积极推进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必须继续改

善城乡人民生活，坚决控制人口增长；为适应经济建设发展的要求，必须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六届人大以后，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决定对前几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作了充分的估计和总结，论述了改革是当前我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并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是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决定”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按照党历来要求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按照正确对待外国经验的原则，进一步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我们这次改革的基本任务。

“决定”指出，这场改革的性质，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因而，改革的进行，只应促进而绝不能损害社会的安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国家财力的增强。

“决定”指出，这场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为了建立合

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

“决定”指出，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要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要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要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要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要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决定”为我们设计了一幅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模式的基本蓝图。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试验探索阶段，是从1978年到1984年。这一阶段进行了两项大的改革试验和探索。一是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在四川省企业扩权试点的基础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陆续扩大了扩权试点范围，到1983年，全国各地的工商企业普遍进行了扩权。同时开始把一部分中央和省、自治区直属的企业下放给城市管理，逐步实行政企分开。二是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从1980年底开始，先后在湖北沙市、江苏常州和四川重庆3个大中城市进行了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到1984年底，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增加到58个。企业扩权和城市改革试点，为在面上推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探索了路子，积累了经验。

第二，全面改革阶段，从1984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主要进行了两项带全局性的改

革：一是初步改革了价格体系。针对过去我国价格形式单一、定价权力过分集中、价格体系极不合理的状况，国家采取了“放调结合、稳步前进、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的方针。在价格形式上，由过去单一的固定价格改为国家牌价（固定价）、国家指导价（浮动价）和市场调节价（自由价）三种价格形式；在价格管理权限上，给地方和企业下放了一部分定价权，由过去单一的国家定价改为国家定价、企业定价和自由作价三种作价方式，为搞活企业，活跃城乡市场创造了条件。二是初步改革了工资制度。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国家陆续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工资制度进行了初步改革。在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改变了过去的等级工资制，实行了以职务工资为主的新的结构工资制度，党政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工资由基本工资、工龄津贴、职务工资和奖金四个部分组成。在企业里，改变了过去的八级工资制，职工工资按新的工资类别和等级进行了套改。从1987年起，又普遍实行了国家核定企业的工资总额和增长幅度，企业内部分配由企业自主确定的办法，进一步打破了过去固定工资制度，企业普遍推行了百分计奖、浮动工资、定额工资、计件工资等多种灵活的分配方式，使职工的报酬与企业的经营成果及个人的劳动贡献紧密挂钩，以此来逐步体现按劳分配的配原则。

我国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收到显著成效，主要是：

（1）逐步建立了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突破了过去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在公有制基础上把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与

商品经济的创造力有机地结合起来，按照发展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逐步理顺各种经济关系，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2)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在改革中，破除了过去在所有制问题上求公求纯的“左”的指导思想，逐步放宽政策，鼓励城乡集体、个体和私人经济以及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和外商独资企业的发展，初步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格局。

(3)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深化企业改革，转变了企业经营机制。在企业与国家的关系上，经过企业扩权和两步利改税的探索，党中央和国务院确定普遍推行多种形式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在企业内部，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一是改革企业内部领导体制，普遍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二是层层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三是实行劳动用工合同制，并对合同制工人的待业保险金和部分省市职工的离退休养老金实行了社会统筹。四是改革企业内部分配制度。五是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公开招标投标、竞争答辩，使大批企业管理人才脱颖而出；实行优化劳动组合，内部职工择优上岗，进一步提高企业素质。

(4)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开放和拓展各种市场，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一是改革商品的流通体制，变独家经营为多渠道经营，搞活消费品市场。二是改革物资供应体制，发展生产资料市场。三是改革金融体制，建立中央银行，扩大资金市场。四是改革科技体制，发展技术市场。五是改革劳动就业制度，改劳动部门统一分配为统配与自由就业相结合，发展劳务市场。六是开发信息市

场，办起了一批经济信息咨询机构。七是逐步开放房地产市场，并在一些城市实行了城市住宅商品化。

(5)改革宏观经济管理体制，进行城市政府机构改革试点。几年来，国家对计划、财政、税收、物价、金融、物资、商业、外贸等管理体制进行一系列改革，使过去国家经济管理机构分投资、分物资、分项目和下指令性指标进行直接管理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并开始向间接管理过渡。

(6)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功能，改变条条块块互相分割的计划管理制度，大力发展各种横向经济联合，初步形成了以大中城市为依托的经济区，如上海经济区、东北经济区和西南经济协调组织等。这种横向开放型的网络状经济格局，使大中城市的经济辐射力、吸引力和综合服务能力大大加强，经济、技术、金融、人才和信息中心的作用开始得到发挥。同时，以大中型骨干企业和名优产品为“龙头”，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和跨所有制形式的企业横向经济联合组织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大大推进了企业技术进步。

(7)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形式，在经济发展中逐步改善了人民生活。与以公有制为主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结构相适应，在分配制度上也进行了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方式的改革。劳动者除了直接的工资、奖金和个体劳动所得以外，可凭国家、企业的债券、股票取得利息，银行储户可得利息，承包租赁企业经营者的收入中，可得到经营风险补偿等等。这些非直接按劳分配的收入，只要合法的，均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为了调节过高的个人收入，国家相继开征了个人所得税和个人收入调节税。改革以来，是人民生活改善最快、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年平

均工资由1978年的644元增加到1987年的1584元，增长1.2倍，扣除物价变动因素，增长53%。平均每个城市居民新建住宅5平方米，生活得到了显著改善。

〔**农村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4年底，农村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重点是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主要是解决农民与集体的关系。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从1985年春开始，农村的改革迈出了第二步，重点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主要是解决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在此期间国家采取了三项重大的改革政策：一是从1985年起取消了过去30多年来对农副产品实行统购和统派的办法，采取了充分尊重农民自主权的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初步把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建立在商品等价交换的基础上。二是从1985年起改变了过去千百年来国家沿习向农民征实物税的办法，将农业税由实物税改为现金税，使农村经济向商品经济的方向大大前进了一步。三是从1985年5月份开始陆续放开了城镇居民口粮、食油以外的农副产品的销售价格，促进了农副业的发展。

这些政策加快了农村城市化和农业工业化的步伐。在这个时期，包括工业、商业、运输业和建筑业在内的乡镇工业有了很大发展。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1987年乡镇企业的产值达4756亿元，第一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与此同时，农民的生活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由改革前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1987年的463元，农民的生活质量和居住环境也有了很大改善。

三、对外开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国策

〔对外开放的总原则〕 对外开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立的一项基本国策，它把我国长期来封闭型或半封闭型的经济转向开放型经济。党的十二大以后，加快了开放的步伐。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说：“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我国对外开放的总原则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正确实行对外开放的前提和根本保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这是顺利实行对外开放的立足点；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这是有效实行对外开放的出发点；坚持平等互利原则，这是持续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条件。在这些基本原则的指导下，我们采取了扩大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开展国际劳务合作、开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等多种开放形式，有效地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

〔扩大对外贸易〕 1979年以来，国家对外贸易体制进行了初步改革，扩大了地方和企业的对外贸易经营权，改变了外贸由国家独营的局面，到1986年底，由外贸部批准成立的经营进出口贸易的企业已达800多家，国家还进一步下放外贸企业审批等9个方面的权力，放宽政策，实行外汇留成等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同时还增加对外开放口岸，促进外贸经济发展，到1986年底，我国对外贸易口岸已由1978年的52个增加到114个。目前我国已与世界上将近18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往来关系。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逐年成倍增长。据统计，1978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355.1亿美元，1981年为440.2亿美元，1987年为827亿美元。其中我国的出

口规模逐年扩大，1978年为97.5亿美元，1986年为309.4亿美元。

〔建立经济特区〕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达文件，把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这是我国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作出的一项具有远见的战略性大决策。特区就是划出一定的地区作为经济开放区，利用它们的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对海外交通便利、历史上有对外开放传统等有利条件，实行比内地及其它沿海地区更加开放、对外资更加优惠的政策，以便集中地大量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截至1985年底，4个特区累计完成基本建设投资76.3亿元，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1.7亿美元，引进了一批较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新建工厂900多个。1985年，4个特区的工业总产值已达48.6亿元，比建立特区前的1979年增长了5倍以上。发展较快的深圳特区，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9倍。

随着特区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1984年春，决定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1986年以来又陆续开放山东和辽东半岛；1988年春，决定成立海南省，并将其作为最大的对外开放经济特区；还在沿海开放城市建立了13个经济技术开发区，执行某些类似特区的开放政策。经济特区的建设与发展，对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了解国际市场、传递经济信息和培养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窗口作用。

〔利用外资 发展技术合作〕 利用外资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内容。从1979年到1987年6月止，我国共签定利

用外资协议近8700多项，协议金额达536亿多美元，我国批准兴办的“三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企业达8500多个，同时，我国利用外资的领域日益广泛，投资结构日趋合理。投资领域已从轻工、纺织、旅游等行业发展到冶金、机械、电子、能源、交通、化工、邮电、建材等各行业。在利用外资兴办的“三资”企业中，生产性企业、出口型企业和先进技术型企业所占比重上升。并已涌现出一大批办得较好的企业和一些对经济建设有较大影响的项目。比如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山西平朔露天煤矿、北京吉普生产有限公司、上海贝尔电话设备公司等。广泛利用外资，缓解了我国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

近几年，我国为改造现有企业广泛开展对外技术合作，先后引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一万多项，包括专利技术、专有技术和软件技术。同时，我国的技术也开始进入国际市场。改变了只进不出的单一局面。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发展，国际劳务合作、对外承包工程和国际旅游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尤其是国际旅游事业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补充了大量的资金，增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增进了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的友谊。

四、新时期的统一战线与“一国两制”

〔新时期统一战线的范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统一战线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新时期的统一战线是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在内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工人、农民、知识分子

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是主体和基础，它的范围还包括民主党派，无党派知名人士、非党的知识分子、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官、原工商业者、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爱国的宗教领袖人物、去台湾人员留在大陆的家属和亲友、港澳朋友、归国华侨和侨胞。因此我国现阶段的统一战线达到了包括全中华民族一切有爱国心的人们在内的最宏大的规模。他们当中许多人与我们党长期合作，经过了战争关、土改关、社会主义关。如今他们为祖国四化建设报效出力的愿望更加强烈。他们在许多方面越来越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民主党派是我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党派工作在整个统一战线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我国有八个民主党派，它们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随着我国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我国的民主党派也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变化。我国各民主党派原来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现在，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方针〕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方针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是党在新时期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方针，也是坚持和发展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基本方针。我们党

的这个方针，是在国内阶级状况和民主党派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党同民主党派在根本利益上更加一致、党同民主党派的合作经过长期的考验变得更加亲密团结的基础上，适应新时期的总任务提出来的，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我们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经验的科学总结。贯彻这十六字方针，就要大胆、放心地让统战对象独立自主地工作，在宪法范围内实行政治自由、组织独立、法律上平等，同时又要通过协商和政治思想工作来加强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一国两制”是我国在新时期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制定的一项重大国策。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在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香港和台湾实行特殊政策（也包括澳门），即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两种制度并存。1983年7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杨力宇教授时，具体提出了实现中国大陆与台湾和平统一的“一国两制”的构想，提出“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的统一”，“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1984年2月邓小平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进一步明确提出：“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

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1984年5月在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宣布了祖国统一后可以实行“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设想。并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决议。

根据这一国策，我国政府同英国政府经过多次协商。于1984年12月签订了香港的主权和繁荣发展的问題。香港问题谈判的成功，为今后解决台湾、澳门问题，最终实现祖国统一奠定了基础，指明了前途。

“一国两制”的重大国策，是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产物。不但可以为我们争取一个更好的和平环境，集中精力物力，保证四化建设的顺利发展；也可以使我们在本国内利用局部的资本主义特别行政区，作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进行经济交流的通道和桥梁，直接和间接地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扩大对外贸易，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第三节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一、“七五”计划的制定及基本任务

〔“六五”计划超额完成〕经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批准的第六个五年计划，要求在1981年至1985年中，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进一步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取得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胜利，并且为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创造更好的条件。

五年中，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

下，圆满地完成了上述任务。“六五”期间规定的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技术改造、国内外贸易、教育科学文化、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的任务和指标，绝大部分都已提前完成或超额完成。在这五年中，我国工农业总产值每年增长11%。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2%，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1%。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0%。这速度高于其它几个五年计划时期，也高于世界许多国家同期的增长速度。尤其是农业，1984年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纪录，达8146亿斤，人均口粮达786斤，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基本上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大幅度增长，市场繁荣，消费品充足，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和提高。

“六五”计划的超额完成，为“七五”计划和九十年代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物质基础。

〔**“七五”计划的原则、方针和任务**〕1986年3月25日，六届人大四次会议提出了《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4月12日，经讨论通过决议，原则批准了国务院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从此，全国人民将为完成“七五”计划的基本任务而奋斗。

“七五”计划期间，即1986年～1990年的五年中，是全面改革我国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也是在物质技术和人才方面为九十年代经济的更好发展准备条件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将遵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遵循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总方针，继续推进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管理体制由旧模式向新模式的转变，大体上形成新的经济体制的框架，使经济的运行走上新体制的轨道。

“七五”计划实行的原则和方针是：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使改革和建设互相适应，互相促进；坚持社会主义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保持国家财政、信贷、物资和外汇的各自平衡和相互间的综合平衡；坚持把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提高产品质量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上，正确处理好效益和速度、质量和数量的关系；坚持适应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和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要求，进一步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坚持恰当地确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合理调整投资结构，加快能源、交通、通讯和原材料工业的建设；坚持把建设重点转到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上来，走内涵型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的路子；坚持把发展科学、教育事业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上，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加快智力开发；坚持进一步对外开放，更好地把国内经济建设同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结合起来；坚持在发展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坚持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在各项事业中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

“七五”计划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努力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使改革更加顺利地展开，力争在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前提下大力加强重点建设、技术改造和智力开发，在物质技术和人才方面为九十年代经济和社会的继续发展准备必要的后续能力；在发展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继续改善城乡人民生活。将在“七五”计划期间，全国工农业增长

8%，国民生产总值增长44%。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1990年工农业总产值为16770亿元，比1980年增长1.3倍；国民生产总值为11170亿元，比1980年增长1.6倍。

“七五”计划的工作部署是：大体分前两年和后三年两个阶段。前两年，要着重解决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猛的问题，使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实现基本平衡；要围绕稳定经济的要求，在进一步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活力、在大力发展横向经济联系的同时，从宏观上加强和改善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和控制。后三年在做好这些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体制改革和生产建设，全面完成“七五”计划的任务。

二、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随着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生产力获得了新的解放，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进展，国家的经济实力迅速增长，10亿人口绝大多数过上了温饱生活。整个改革已从经济体制改革推向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阶段。在此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于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召开了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作了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政治报告、作出了《关于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修正案的决议》等。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会上也作了工作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会议选举了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党的十三大正确认识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

提出了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路线，并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党的工作日程上，为我国的建设和改革规划了基本蓝图。大会号召，全党同志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团结，加强党与全国各族人民的密切联系，同心同德，振奋精神，埋头苦干，开拓创新，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党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党的十三大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回答：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这论断，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实践证明，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同时也证明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

目前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的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根据中国的历史条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也不同于社会主义的建成时期。在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中，发展生产力始终为主要任务。所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转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

党的十三大坚持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论证了我国社会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正确的论断，对于防止和纠正“左”的和右的干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具有重大的深远的历史意义。

〔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这条基本路线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采取了各项方针政策。但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没有中心，两个基本点就失去了根据；只有中心，没有两个基本点，中心也无法实现。所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互相配合、缺一不可的。这条基本路线的形成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继续和发展，也是建国以来逐步形成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

〔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开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越来越紧迫地要求把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提上日程。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一个崭新的课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作了一系列的精辟论述。他于1980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是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这篇文章全面揭示了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弊端，深刻论述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艰巨性和长期性，明确阐述了改革的目标、内容和步骤。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开始的标志。党的十三大确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对于长远目标来说，近期目标的要求是有限的。但从方向上说，近期目标又是同长远目标一致的。达到了近期目标，也就是向长远目标迈出了必要的一步，为长远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根据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党的十三大确定了近期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具体是：从党领导下的高度统一、高度集权型的政治体制向党领导下的统一的民主型的政治体制转变；从党的统一领导下的党政不分向党的统一领导下的党政分开转变；从管理产品经济的政治体制向管理商品经济的政治体制转变；

从“以党治国”向“以法治国”转变；从党统一领导和统一提升的人事干部制度向充满活力、效率、积极性的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转变。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试点的基础上展开的。1986年5月，国务院决定在丹东、潍坊、宝鸡、江门、天水、马鞍山、安阳、自贡、黄石、厦门、绍兴、常州、衡阳、苏州、无锡、洛阳等16个中等城市进行改革试点。一年后，有13个城市拿出试点方案，其中有8个城市进入实施阶段。以安阳市为例，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主要实现了六个转变：

第一，从产品经济的传统管理体制转向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管理体制。根据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原则，注重转变政府管理职能，由过去单纯的行政管理转变为运用经济的法律的手段进行管理，在此基础上，精简机构和人员；

第二，由过去的多层次、多环节管理转变为单层次、少环节的间接管理，撤销了工业系统的6个局和行政性公司，扩大经委职能，将财政、审计、劳动、物价、统计等综合部门直接面向企业，指导企业，为企业服务；

第三，由过去的政企职责不分转变为政企分开，撤消了4个一级行政公司，将20个工业公司组建成18个独立核算的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扩大了服务领域；

第四，由过去的党政职责不分转变为党政分开，分工基本合理。根据党委不设与政府对口的业务部门、政府部门不按行业设立党委的原则，把企业单位的党群工作放到所在的区党委统一管理；

第五，由过去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转变为实行市、区分级分权管理，逐步地将部分适合于城区管理的工业、商

业、城建、文教和综合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城区政府管理，充分发挥市、区两级作用；

第六，由过去的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干部体制转变为分层次管理。除一部分骨干企业的主要领导干部由市委直接管理外，其余的实行分级管理，做到用人与管人、管人与管事相统一。

党的十三大根据各地改革的试点和经验，理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头绪，找到了下手的地方，确定了目前所进行的工作。首先解决党政分开问题，然后进行进一步下放权力等问题。解决权力过分集中是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党的十三大后，全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围绕以上两个主题深入开展。

总之，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在实践中，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是紧密相联的，使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协调配套，并与科技、教育、文化等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互相衔接，互相促进，是加快和深化全面改革的重要途径。

三、治理经济环境 整顿经济秩序 全面深化改革

〔治理整顿的必要性〕1988年7、8月间，在全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几十个大中城市，都程度不等地发生了到银行提取存款抢购商品的风潮，9月底，抢购风基本平息。为什么人们会出现这种恐慌心理呢？反映出我们的工作中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集中的突出的表现是物价上涨过多，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加剧，是经济过热、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结果。全国在建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过多，规模过大，超过了国力承担的可能；消费需求过旺，社会购买力的增长超过了商品供应量的增长；国家财政支大于收，信贷规模过大，货币发行过多。在供求总量不平衡的同时，经济结构失调，农业发展滞缓后，有限资源过多地投入加工工业和非生产性建设，在工业生产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加剧了能源、原材料和运输能力的紧张程度。一些单位和个人为谋取私利，非法倒买倒卖，层层盘剥，制造和出售伪劣商品，更推动了物价上涨，加剧了经济秩序的混乱。

这种情况的产生，是与我们在对工作的指导上有缺点和失误有关。总的来看，在经济建设中，存在着急于求成的倾向。我们的国家是发展中国家，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往往忽视国家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短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对于盲目扩大建设规模、片面追求产值产量、攀比发展速度等现象注意防止不够，纠正不力。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总体上是成功的，但我们在指导上往往对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注意综合配套不够，在坚持放权搞活的过程中，未能及时加强管理监督和抓紧建立宏观调控体系。我们认识到了价格改革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地位，但在实际工作中对国家、企业和群众的承受能力考虑不够，在通货膨胀已经比较明显的情况下没有及时采取稳定金融、控制物价的有力措施，又放开、调整了一些商品价格，以致加剧了群众对物价上涨的恐慌心理，在许多地方诱发了抢购商品和储蓄下降。

1988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三届三中全会，会议正确地分析了我国的经济形势，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确定了今明两年要把建设和改革的重点放到治理整顿上来的部署。

〔治理整顿的目标和措施〕为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1989年3月20日召开了全国七届人大二次会议，李鹏代表国务院作了题为《坚决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的工作报告。报告中提出从今年起，我们要用两年或更长一些的时间，努力实现治理整顿所要达到的目标：（一）消除经济过热，把发展速度降到比较合理的水平。（二）遏制通货膨胀，使1989年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1988年，1990年以后的上涨幅度进一步下降。（三）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使它同国力承担的可能相适应；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使它同国民收入的增长相适应。（四）逐步缓解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矛盾，实现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的基本平衡。（五）认真调整经济结构，使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有较多增加，使能源、交通、原材料供应的紧张状况有所缓和。（六）建立健全必要的经济法规以及宏观调控体系和监督体系，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建设。

李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近年来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经济过热、需求过旺引发的。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当然需要从压缩社会需求和增加社会供给两个方面作出努力，但首先必须毫不动摇地把过大的社会总需求压缩下来。”主要措施是：（一）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这是对压缩社会总需求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重大措施，是抑制通货

膨胀、稳定经济全局的首要任务。国务院决定：198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要比上年压缩920亿元，减少21%。(二)坚决控制消费需求的过快增长。一是坚决压缩和控制社会集团消费，1989年要在1988年水平的基础上压缩20%。二是严格控制工资总额的增长，坚决制止滥发奖金、实物和擅自扩大津贴、补贴的发放范围。三是大力提倡和鼓励人民储蓄，并采取多种办法正确引导消费，吸收和推迟实现社会购买力。(三)努力改善和增加有效供给，以缓解市场供求矛盾，保障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需要。(四)同压缩社会总需求相适应，金融和财政实行紧缩的方针政策，继续抽紧银根，严格控制货币发行。(五)整顿经济秩序特别是流通秩序，首先清理整顿各类公司，重点是解决一些公司政企不分、官商不分、非法倒卖、牟取暴利的问题。(六)切实加强物价和市场监督管理，严格财经纪律。认真整顿和改进重要商品的流通方式。对重要的生产资料，国家实行专营。

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一年多的治理整顿已取得初步成效：过高的工业发展速度降了下来，农业获得较好收成，固定资产投资有所控制，物价上涨势头趋于缓和，货币回笼情况比较好，国民经济在继续发展，

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两者对立由来已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进行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干扰，其矛头始终指向四项基本原则，两者对立由来已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比较集中、攻势比较猛烈并造成严重危害的有四次。

第一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发生在我们党着手进行拨乱反正的过程中。1979年我们党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羁绊和禁锢，大力倡导思想解放，在思想理论界、文学艺术界，都出现了新的局面。可是热衷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却把党提出的解放思想的正确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打着反对“两个凡是”的幌子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在进行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制造新的思想混乱。当时，一批有严重错误倾向的理论文章以及文艺作品，连续在有关报刊上发表，与社会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思潮相呼应，制造思想混乱。当时，北京出现了“西单墙”，公开张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字报，在北京、上海等地都出现了一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1980年，有的高等院校则发生了不按法律规定程序进行的大学生竞选人民代表事件。这些问题，引起了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重视。继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之后，党中央于1980年12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要纠正思想战线上的软弱涣散的现象，对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行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一度有所收敛。

第二次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发生在完成了思想战线上的拨乱反正之后，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阶段，特别是1983年前后，出现了严重的精神污染。少数理论工作者不同意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所作出的结论，在人道主义、异化等问题上制造思想混乱，散布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怀疑动摇情绪。他们把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异化”概念，移植到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等领域，把一切问题说成是“异化”现象，产生异化的根源又在社会主义制度本身。

他们鼓吹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诬蔑社会主义“不人道”，共产党“不人道”。在文艺界出现了有严重错误倾向的作品，一些不健康的剧作充塞银幕、舞台，一些低级庸俗的书刊涌入书市。针对这些问题，党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要反对精神污染。由于当时的领导同志没有认真贯彻十二届二中全会精神，反对精神污染只搞了28天，未阻止住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使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更为嚣张。

第三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发生在1986年底到1987年初。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他们到处演讲，抓住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中的弊病大作文章，肆意夸大、歪曲和诽谤，把现行体制上存在的问题说成是社会主义制度带来的，说成是党的领导造成的。这些人宣称社会主义已经失败，应“全盘西化”，“党现在是黑的”，并号召青年学生加入共产党，然后去改造党。少数人借纪念“双百方针”三十周年为名，鼓吹资产阶级的民主与自由。《世界经济导报》1986年9月则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思想基本原则”：“离经不叛道，崇洋不媚外，犯上不作乱，自由不泛滥”。煽动人们的反社会主义情绪。由于这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酿成了1986年底、1987年初全国性的学潮。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这次学潮。

第四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在1988年下半年到1989年的上半年，这是危害最大的一次。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提出，在政治制度上用多党制代替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在经济制度上，用私有制代替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在文化传统上全面否定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主张“全盘西化”。他们与国际反动势力相勾结，利用胡耀

邦逝世之机，挑起学潮，制造动乱，直至发生反革命暴乱。

〔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 1989年春夏之交，从4月中旬到6月上旬，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首都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4月15日胡耀邦逝世，使酝酿已久的学潮和动乱提前爆发。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表达了深切的哀思，各高校也为学生的悼念活动提供了条件。但是，极少数人却利用这个时机，以悼念为借口，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学潮从一开始就被极少数人所操纵和利用，具有了政治动乱的性质。这场动乱中，出现了大量的大小字报、标语、口号、传单和挽联，对党和政府进行了肆意的攻击和诋毁，公然号召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现政权。在极少数人的策动下，不经批准连日不断地举行大游行；他们在4月18日和19日深夜接连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并且呼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他们违反天安门广场的管理规定，多次强行占据广场；他们不经登记就成立“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等非法组织；他们不顾校纪、法纪抢占办公室、广播站，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在校园里造成严重的无政府状态。他们还大量制造谣言，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激化青年学生同政府的对立情绪，并利用这种情绪，提出了“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的口号，造成北京6万高校学生罢课的局面。他们还把动乱势头向全社会和全国扩散，提出了“南下北上，东来西走”的口号，企图发动全国性的大串联，南京、武汉、西安、长沙、

上海、哈尔滨等地的高校都发现从北京去的学生，天津、河北、安徽、浙江等地的学生也到北京参加游行。在长沙、西安等地，发生了严重打、砸、抢、烧的违法犯罪活动。

党中央及时洞察极少数人的阴谋，4月26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指出了这场动乱的性质，明确地把极少数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同广大青年学生区别开来。“4、26”社论发表后，全国和北京的局势趋向平稳。在动乱接近平息的时候，作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赵紫阳，却采取了出尔反尔、反复无常、支持动乱的态度。他在5月4日接见亚洲银行年会代表时，发表了同社论精神完全对立的意见。在赵紫阳的鼓动和少数人的策划下，罢课、游行示威的浪潮又重新掀起。

5月13日，极少数人发动了一场历时7天、前后有3000多人参加的大绝食，长期占据天安门广场，他们把绝食学生当“人质”，以学生的生命为赌注，采取极其恶劣的手段要挟政府，使动乱更加严重。赵紫阳不仅不做工作，反而煽动新闻界，进行错误的舆论导向，从5月15日起，上街游行声援学生的群众一天比一天多，声势一天比一天大，从几万人发展到几十万人，全国各地还有20多万学生起来声援。在事态一天比一天严重的情况下，赵紫阳利用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机会，有意识地把斗争矛头引向邓小平，使局势进一步恶化。

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国务院断然决定于5月20日上午10时起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制止动乱。戒严之后，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作为他们动乱的基地和中枢。他们还纠集本地

的流氓地痞，外地的流窜犯及未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网罗仇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拼凑“敢死队”“飞虎队”“义勇军”等恐怖组织，他们设置路障、拦截军车、抢夺军用物资、围攻殴打解放军。至6月3日、4日，动乱已发展到反革命暴乱。反革命暴徒冲击党和政府的重要部门，焚烧军车、警车、公共电汽车，惨杀解放军并暴尸街头。几天的暴乱中，被暴徒砸毁、烧毁、损坏的军车、警车和公共电汽车等车辆达1280多辆，一批武器、弹药被抢。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000多人，死亡数10人。在万分紧急的关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下定决心，命令驻守在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强行开进，进行反击，平息了反革命暴乱。

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动因。正如邓小平说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国际大气候是指西方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策略，中国的小气候是指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和思潮，这场风波就是二者的结合。这场斗争的性质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尖锐对立和斗争。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全会分析了近两个月来全国的政治形势，指出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在北京和一些地方掀起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全会高度评价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场斗争中发挥的重大作用，高度评价在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中中国人

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作出的巨大贡献。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会议认为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虽然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失误。特别是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鉴于赵紫阳的上述严重错误，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

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全会提出，在当前要特别注意抓好四件大事：一是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二是继续搞好治理整顿，更好地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三是认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教育，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是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大力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坚决惩治腐败，切实做好几件人民普遍关心的事情，决不辜负人民对党的期望。

〔对建国40年来历史经验的总结〕在庆祝新中国诞生40周年的时候江泽民发表了长篇讲话。这篇讲话回顾了建国40年的历史，得出了四个方面的基本结论：第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如果今后不坚持社会主义，而是像有人主张的那样退回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是原始的、买办式的资本主义，只能意味着中国各族人民再度沦为外国资本和本国剥削阶级的双重奴隶。总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第二，社会主义制度是在自身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制度。根据社会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和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调整上层建筑中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改革。如果不进行这样的改革，就会窒息社会主义内在的活力和生机，就会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巨大成绩证明，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第三，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中国革命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一条根本经验。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统一的。中国人民从来没有、今后也决不会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决不会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和民族独立来换取别人的施舍。第四，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核心，是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做出的正确选择。党是在战胜困难、克服失误、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步成熟起来的。党的状况如何，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必须严肃地毫不留情地剖析和纠正工作中的失误，

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不辜负人民的期望。

这篇讲话是指导全党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它阐明了当前党和国家工作中需要特别注意统一认识的10个重要问题：（一）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相统一的问题。（二）关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和治理整顿问题。（三）关于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问题。（四）关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问题。（五）关于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防止和纠正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六）关于加强农业等基础产业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问题。（七）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问题。（八）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九）关于加强工人阶级领导、巩固工农联盟和增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问题。（十）关于加强党的建设问题。

这篇讲话，对于进一步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振奋精神，团结一致，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的更大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召开〕1989年11月6日至9日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全会之前，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认真讨论和研究了我国当前的经济问题。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全会认为，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治理整顿是正确的。经过一年来的努力，治理整顿已取得初步成效，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是克服当前经济困难，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全会决定，包括今年在内，用三年或

更长一点的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治理整顿的主要目标是：逐步降低通货膨胀率，使全国零售物价上涨幅度逐步下降到10%以下；扭转货币超经济发行的状况，逐步做到当年货币发行量与经济增长的合理需求相适应；努力实现财政收支平衡，逐步消灭财政赤字；在着力提高经济效益、经济素质和科技水平的基础上，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率，争取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5%至6%；改善产业结构不合理状况，力争主要农产品生产逐步增长，能源、原材料供应紧张和运力不足的矛盾逐步缓解；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各项改革措施，逐步建立符合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原则的，经济、行政、法律手段综合运用的宏观调控体系。全会要求，治理整顿必须抓住四个重要环节。一是，继续压缩社会总需求，坚持执行紧缩财政和信贷的方针，解决好国民收入超额分配的问题，下决心过几年紧日子。二是，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有效供给，增强经济发展后劲。三是，认真整顿经济秩序，继续下大力量清理整顿各种公司特别是流通领域的公司，克服生产、建设、流通、分配领域的严重混乱现象。四是，深入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下功夫改进企业的经营管理，挖掘内部潜力，提高科技水平，走投入少、产出多、质量高、效益好的经济发展路子。

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全会认为，邓小平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在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他多年来一再提出的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夙愿，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与会全体同志对他身体力行地为废除干部

领导职务终身制作出的表率，表示崇高的敬意。

全会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杨尚昆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刘华清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杨白冰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决定增补杨白冰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会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满怀信心，齐心协力，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同甘共苦的光荣传统，为克服经济的暂时困难，为实现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为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思考题

- 1、为什么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
- 2、为什么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标志着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
- 3、党的十二大确定的奋斗纲领和伟大意义是什么？
- 4、为什么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5、为什么说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

阅读书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5、26条，第32至38条)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八部分)

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在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

责任编辑：钱莲慧

封面设计：郭春林

ISBN 7—81013—书号 定价：3.90元